

《雁栖塞北》寄语

刘德有

高见邦雄先生的《雁栖塞北——来自黄土高原的报告》在中国问世了，可喜可庆。

一口气读完《雁栖塞北》，不禁感慨万千。这是一部动人的故事，也是一部感人的真人真事。她记录了迄今 13 年来高见先生和 NGO（非营利民间组织）“绿色地球网络”的日本朋友们为绿化中国的塞北——黄土高原所做出的无私奉献，也记录了他们和当地村民是怎样从素不相识到相互理解、进而达到如今的密切合作的过程。在中日关系处于一波三折的今天，这种方式的民间交流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在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抓西部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今天，本书中文版的付梓问世，非常切合时宜并引人注目。

中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经济的突飞猛进又使中国有些地区陷入了环境遭受破坏的危机，资源也遭到不应有的掠夺性开发，形成了环境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在高见先生活动的大同地区，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年只有 430 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人口行动标准的 1700 立方米，甚至低于“严重缺水”标准的 500 立方米，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然而更让人震惊的是，在海河、滦河水系中，大同的人均水资源量还算多的，因为整个海河、滦河水系的人均水资源量却只有 343 立方米！想到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京津塘渤海湾大经济圈都处于此水域，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绝非仅仅是和大同有关的问题。

在大同阳高县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靠着山呀，没柴烧，十个年头，九年旱，一年涝”。大同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沙尘暴频起，水土流失极其严重，这些情况从本书中可管窥一斑。然而，高见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就是在环境如此恶劣的地域开始了他们黄土高原的绿化事业。开始时由于资金不足受到困扰，加之当地一些部门的误解和村民由于战争的伤痕所导致感情的隔膜，使他们的活动曾一度陷入困境。但是，高见先生们并不气馁，他们用诚意和实际行动换得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理解和信任，并且得到了许多日本团体和人士在道义上、财力上以及和行动上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了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的援助。通过 13 个寒来暑往坚持不懈的努力，如今已和当地村民一起绿化了 4500 公顷的黄土地，种植树木达 1600 万株，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业绩，可谓功德无量。但不言而喻，在这背后，不知又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心血和艰辛。他们不仅深知种树的重要性，狠抓科学栽培、技术改良，同时也懂得育人的道理，在培养技术人才的同时，在思想的沟通和理解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他们的业绩受到关注，高见先生也因此当之无愧地受到诸多表彰：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保卫母亲河行动国际合作奖”，大同

市政府“环境绿化奖”，朝日新闻社“走向明天环境奖”等等。

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塞北的干部和群众对高见先生他们的行动给予了深切的理解和莫大的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淳朴、忘我、有奉献精神的人和可歌可泣的事迹。没有他们，高见等人的事业也不会取得今天这样斐然的成绩。

目前，中日两国关系正处于关键时期，从这个角度来看，NGO“绿色地球网络”提出的“种植于大地，种植于人心”的宗旨极其重要。因此《雁栖塞北》的出版意义已经超越了反映绿化塞北这一行动的本身，她更是一部促使人们去认真思考怎样通过具体实践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不可多得的启示录。

感谢译者李建华、王黎杰的辛勤努力，使我们得以读到这本好书；我衷心希望我国广大读者有机会能够通过本书感受到和我一样的震撼和启迪。

2005年元月

中文版序言

高见邦雄

我第一次访华是在 1971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一年。其后，中国发生了巨变。当年在北京街头看到的景象，现已不复存在。在清晨的大街上看到马车拉着一车砖，好像是拆掉城墙去修环路。早晚上下班时间还是潮水般的自行车，而现在已经被汽车堵得水泄不通。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的变化堪称“世界奇迹”。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历经几代人实现的现代化，中国仅一代人就实现，如日中天，势不可挡。

有光必有影。光越强，影越重。最明显的影，即贫富差别的扩大。城市和农村，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其间的差距已经远远超过以自由竞争为原理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另一个影，即环境破坏。中国疆域辽阔，面积是日本的 26 倍，但是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上并非得天独厚。用 13 亿人口作基数计算，甚至是脆弱的。在此基础上继续奇迹般地经济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环境后果呢？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邻国日本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民间团体（NGO）“绿色地球网络”在山西省大同市黄土高原的农村开展绿化合作事业始于 1992 年 1 月，迄今已经过去整整 13 年。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与当地人的交流。这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这一点只要指出大同曾在日中战争中遭受了沉重的灾难，就不难理解了。这些在序文中无法概括，只有以本书方可历述。

如果东部沿海大城市堪称光或者顶峰，内陆的黄土丘陵和山区农村就是影，是在发展中被遗弃的地方，是谷底。如果把经济发展视为时代的拉动力，环境问题就是它的副作用，就是底层。

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社会，它的真实姿态从谷底看得最清楚。站在山顶无法看到整个山容。要想看山容，只能下到山脚下。我在大同开展绿化合作事业的过程中，渐渐开始审视北京。大同是观察北京的最佳地点。如果说从日本、从海外看到的北京是正脸的话，从大同看的北京就是它的背影。

2003年夏天，中方11家主要媒体和日本3家媒体来大同采访。他们都深感惊讶的是：大同早得直冒烟，北京的水源桑干河也断流了。连新闻记者都大惊小怪，普通百姓就更缺乏这方面的认识了。所以，这本书——我们和大同的伙伴在这里艰苦奋斗十余年的体验，应该是值得一读的。

日文版问世已经一年有余，如果从执笔算起，已经过去两年了。这项事业现在仍在继续，所以也有想根据其后的进展重写的地方。其中中方合作对口单位从青年联合会过渡到总工会，这件事不是轻易就说得清楚的。另外还要考虑到我的性格，动一处，就可能导致全篇改写，因此不去自找麻烦了。但是，鉴于水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第11章增加了一节。

我要交待一下本书的译者。我是在1974年3月认识了李建华、王黎杰的。当时他们还是学生，我刚20多岁。

为了构思绿化事业，探讨它的可行性，1991年秋我走访了北京几个有关部门，结果没人理我。这也难怪，既无组织又无资金，此等遭遇是自然的。我约李建华边喝酒边道苦衷。他给我出主意，说：“既然如此，何不去地方上试试，像这样的绿化项目，在地方上会受欢迎的。”如果没有他的建议，也就没有这个绿化合作事业，我也不会吃苦受累了。

我在大同的农村语言不通、无法沟通、受到阻碍、苦苦经营的时候，从北京赶来助阵的是王黎杰。没有她的支援，恐怕这个事业就会夭折。即使工作繁忙的现在，她每年也要抽出时间来大同几次，这是

因为她把这项事业也视为自己的孩子。

他们是本书的最合适的译者。

在此，感谢刘德有先生为中文版撰写序文；感谢对出版给予大力支持的中方有关人士。

对日本三得利文化财团对翻译出版的赞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近日本出版社和我联系，说韩国也准备出版此书。东北亚各国因黄沙的到来而知道春天，证明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环境。环境没有国界。愿我们微不足道的环境合作，能为加强本地区的相互理解和合作贡献出一份力量。

2005 年元月

前言

“绿色地球网络”(GEN)在中国山西省大同市的农村开展绿化合作活动始于1992年1月。从那时开始,已经过去整整11年了。

其年6月,地球高峰会议预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地球环境问题正值极受瞩目时期。

我们之所以选择中国,也是由于开创期的成员大多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在此10年前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与此同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而且日趋严重。但是当时,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对中国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我们想通过具体的合作项目来探讨、改善两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方式,在加强相互理解方面发挥作用。

筹备工作其实很简单,只要召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便可开始运作。但是,如何持之以恒继续下去,却非易事。

开始之前,犹如站在360度的大地上,无论哪个方向都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当你一旦决定了其中的一个方向后,就必须舍弃其他的道路。在无限的可能性中,只能选择有限的、而且起点很低的项目。结果,创始人中有的认为定位不合己意,先后有人退出去了。

在中国的现场,也是苦劳不断。虽说都是中国,但是像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和内陆地区的农村,情况却有着天壤之别。走马观花和实际运作又是相差甚远。面对一贫如洗的状况和诸多诱发贫困的现实,只有向前,毫无退路。

最初,一位相处二十多年并且了解日本情况的中国好友对我提出了忠告:“作为一个日本人,如果要在中国的农村开展你的事业,那么请你切记五个‘不’字。‘不急躁,不着慌,不指望,不傲慢,不气馁。’”。

去过几次大同之后，当我把自己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告诉那位好友时，他说：“此话出自你口，那我相信。但是，这些话如果出自别的日本人之口，我只能认为日本人还在说中国的坏话。”也许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在暗示我，到处说这些话是不友好的，不合时宜的。沿海城市和内陆农村相差之大，由此可知。

从北京站乘坐夜班火车，翌日一早天还未亮便抵大同。乘车前，我警告自己：“要注意，前方是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宇宙。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控制住自己”。如果不注意提醒自己，很难说在哪个当口就会爆发出来。食不果腹的农村和飞速发展的北京相比，差别实在太大了。

在经过几次往返中国与日本后，我明白了：中国是大陆，日本是岛国。因为是大陆，所以无论什么事，都会超过岛国的想像。

特别在人的大气上，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的绿化合作项目尽管在初期遇到了诸多困难，但是以后逐步走上了正轨。国际合作组织和绿化方面的专家视察了我们的项目，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的领导干部也来到这里，赞扬我们的项目是国际合作宝贵的成功范例。

我们在当地的事业能够发展到今天，都是由于当地中方合作伙伴努力的结果。我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时，时常这样想。在日本这样的岛国，已经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人物了。但在中国，却有这样的人，尽管人数不很多。

我觉得，对自己的人生来说，和中国人交上了朋友是莫大的收获。如果没有与他（她）们相识的机会，我的人生会变得更贫乏、更平凡、更平庸。

这样的人物、大人物，为数不多。而在大陆中国，却有很多软硬不吃的人，且这种人无处不在，真可谓“遍天下”。

在这一点上，岛国日本没有什么大人物，大家都半斤八两，没有

太大差别。

和中国人打交道，有许多日本人之所以受到耍弄，正是由于他们对于人良莠不齐的这种分布缺乏认识。

大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也超出了我们的理解程度。例如缺水。包括农村在内的大同，人均每年水资源量为 430 立方米，市区是 221 立方米，列为中国“十大缺水城市”之一。国际人口行动标准规定，1700 立方米为“水紧张”；1000 立方米为“缺水”；500 立方米为“严重缺水”，而大同的标准远远超过了“严重缺水”的警戒线。

可是，如此的大同，竟然还是北京、天津等城市和华北粮仓地带的水源地。从日本看北京，是中国发展的象征，而从大同看北京的背影，却是“沙中楼阁”。

从“前言”开始，我就好像在唱低调。不过最后的判断还是交给读者，因此从现在开始，我想和大家一起去“另外一个中国”。

书中主要人物

（按出场顺序）

温增玉

浑源县林业局长。他和妻子郭玉香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带着我走访了各地村落，是给我介绍农村、绿化情况的恩人。

刘天文

造林合作项目启动时的浑源县西留乡林站负责人，经常一起去现场，我常住在他家里。

王黎杰

30 年来的朋友，现任北京东方之星综合企划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从造林项目初期开始合作，其后也作为翻译经常来访大同。

李子明

造林项目试点大同市大同县徐疃乡党委书记。精明能干，对事业满怀热情。造林项目在其任职期间进展顺利，但是被调走以后，项目全线崩溃。

祁学峰

中方绿化植树造林活动的主体——“绿色地球网络”大同事务所的首任所长。在担任大同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期间参与策划合作项目，8 年间作为中方负责人一直倾力支撑着绿化项目。

张 德

“绿色地球网络”大同事务所司机，与祁学峰是小学同学。喜欢恶作剧的调皮鬼，但人很机灵，不知不觉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

徐尚红

共青团南郊区委书记，对创建环境林中心给予了大力支持，是一位在地方上少见的女干部。后任城区副区长。

郜向华

祁学峰的前任大同市青联主席。对绿化合作项目的意义非常理解，并给予全面支持。后历任矿区区长、党委书记，在人们心目中颇有威望。

王 萍

大同市传染病医院护士。作为志愿者从事翻译工作，一起走访农村。对现场情况非常熟悉，对植物的了解甚至高于一般技术员。

邢雁俐

合作项目据点——环境林中心的首任经理，是位女性。人际关系甚广，建立了与当地各村的合作关系。以后调任云冈宾馆副经理。

武春珍

“绿色地球网络”大同事务所的第二任所长。心直口快，述说己见时不给对方任何喘息之机。对合作项目的执著投入，有目共睹。

立花吉茂

著名植物学家，负责大阪市立大学理学部附属植物园的建设。在大阪举行“国际花与绿博览会”时的植物总监。1995年开始作为“绿色

地球网络”的代表，从战略上指导合作项目。

郭有权

环境林中心的年轻技术员。喜欢植物，工作热心，但有时顽固，轻易不肯接受新技术，有时使日方很头疼。

远田 宏

原日本东北大学理学部附属植物园长。每年有七八十天逗留大同调查和研究植被情况。中方人员亲切地称他“Sen sei”（老师）。

小川 真

日本关西综合环境中心生物环境研究所所长。开拓了菌根菌的研究领域，还亲自在大同指导了菌根菌的接种技术。

桥本紘二

专门拍摄农村题材的日本摄影家。拍摄的黄土高原作品得到了中方的好评。为人耿直，不耍心眼，深得大家信赖。在走访农村过程中，发现了严重缺水等问题。

相马昭男

日本林野厅退休干部。近 70 岁时到北京林业大学等留学，经常走访大同给予帮助。他评价绿化合作是“植树于人心”的项目。

李向东

灵丘县农民，果树技术员。经立花吉茂代表推荐，任灵丘植物园负责人。由于他们发现了天然林，使绿化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侯 喜

在大同市林业局等单位工作四十余年的优秀技术员。退休后在“绿色地球网络”大同事务所任技术顾问，支撑着合作项目，是当地绿化方面的活字典。

第 1 章 怎么来到了这么个鬼地方！

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选择了大同？”

可这并不是我们自己定的，而是中方选的。1991 年 11 月，我来到北京拜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时，请求他们：“我们想协助中国进行绿化，请给我们介绍个合适的地方。”过后不久就通知我们选择了隶属大同市的浑源县。

1992 年 1 月，我们 5 个成员来到浑源县调查。最初在拜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时，青年农民部长对我们说，“浑源县不仅对绿化项目非常热心，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出美女之地，而且有好酒”。有人会觉得这后面的话很诱人。当然，人家那么认为也未尝不可，因为我本人对此就很感兴趣。

乘坐夜里 11 点从北京站出发的列车，翌日清晨 7 点以前抵达大同站。在市内的饭店吃完早餐，便坐汽车赶赴浑源。1 月是这里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月份，月平均气温是零下 11 摄氏度。出发前在北京日本大使馆附近的自由市场买了往德国批发出口的羽绒服和毛裤，尽管全副武装，但还感觉冷飕飕的。夜晚气温降到将近零下 30 摄氏度，白天也达不到零度，如果光手去摸铁栏杆，马上就被粘住，冷不丁吓人一跳。

抵达浑源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来到了这么个鬼地方！除了冰天冻地，还有煤烟呛得眼睛睁不开。冬季出现逆温层，由于接近地表的气温低于上空，煤烟扩散不出去，空气特别糟糕。滞留在低空，感觉就好像憋在烟囱或火炕里。

晴天却看不到蓝色。大地一片黄土色，土坯房也是黄土色。无论看哪里，满眼都是黄土色。哪怕能看到雪的白色也行，可是这里几乎

不下雪。路上的行人大多穿着灰土土的人民装服或者差不多颜色的棉大衣。

街头上摆卖的食品尽是“天然冷冻食品”。直径和深度有70厘米的筐里装满了鸡蛋。鸡蛋冻透了，所以才不会破碎吧。手推车上摆放着一劈两半的猪肉，内脏冻在里面，邦邦硬。

在我们住宿的招待所旁边有一个长途汽车站，站前的广场上有许多摊点，摊主在大白天就一口口地喝着50度以上的白酒。这白酒是御寒的好东西。摊床上铺着棉被，夜晚就睡在上面。有时还看到有小小孩儿，真让人吃惊。

尽管户外活动条件很糟，但我们还是视察了3处造林点。

最先去的是西留乡龙首山的造林项目点。这里是黄土丘陵地带，种有松树和杏树，直到前年这里还是一片田地。可是，我们什么也没看到。陪同前来的县林业局长温增玉把土扒开，里面露出了一棵小小的松树苗。为了抵御冬天的寒风，用土把树苗埋了起来。

然后我们来到乡政府谈话，在场的男人们个个儿面部表情严肃，脸子拉得很长，一副顽石不化的样子。我们围坐在会议室的煤炉旁，忍受着对面射来的目光。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开口说话了。

“村里的庄稼产量提高了不少，所以有余地可以考虑环境问题了。盖新房少不了用木材，所以想种树。”

又说：“现在种上树，50年后，100年后肯定长得特别好。”

他们这么说也不足为怪。日本也好，中国的城市也好，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谁也说不清50年、10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即使说5年、10年后的事情，也会遭到周围的白眼。但是像这种地方的农村，即使和50年前相比，也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对方即使说50年、100年，也很自然地能够让人接受。我听了这话，莫名其妙地一阵感动。



图：最高气温零下 10 摄氏度，最低气温接近零下 30 摄氏度。推车上的鱼和肉冻得邦邦硬。（浑源县，1992 年 1 月）

第二个项目点在北岳恒山的南面。恒山是中国的五岳之一，道教的圣山。不仅国内游客，来自海外如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也到此参拜，人数年均达几十万之众。参拜道路附近种有大株的松树。陪同我们的人说：“尽管山南面比北面难度大，但是这里游客多，所以有必要绿化。”

第三个项目点南邻灵丘县，是一座叫银洞梁的山，离县界很近。1989 年栽种的落叶松已经三年，长有一米高了。

这三个造林点好像都不错，但最终还是决定对前两个项目点给予合作。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两个点的项目结果彻底失败，而没看好的落叶松反而茁壮成长。

在摸索中起步

1992年1月，在调查团出发去当地之前，成立了绿化合作项目的筹备会。深尾叶子（现任大阪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女士说：“今后是网络时代。”具有理事资格的佐野茂树说：“名称最好不要太死板，比如说叫‘绿色地球’什么的。”于是我们把两者合一，决定叫“绿色地球网络”。

说开始倒是容易，可是既无资金，也无组织，也没有绿化、植物方面的专业人才，有的只是对环境问题的关心和对绿化的热情。况且我是一个什么事都做不到位的人。

在浑源县参观三个造林项目点时，看见树苗基本都扎了根，也没有枯死的，心想：应该问题不大，就从这里开始吧。中方也不会给我们看糟糕的项目点，再说我们也希望马到成功，所以也就没抱任何怀疑。

那么，起步时确定什么样的内容、多大的规模为好呢？这也是让人头痛的事情。财团法人“绿色地球防卫基金”在此前不久开始了在陕西省韩城市的绿化合作。时任事务局长的柳田耕一是我以前的酒友，他曾对我说过“合作搞绿化在中国颇受欢迎”。我想到搞绿化项目，也是受他的启发。他们的项目经费每年为10万元人民币，签约提供10年。

我把此事介绍给大家，向调查团成员提出了10万元人民币的暂定标准。按当时的汇率折合260万日元。如果真想干，筹集到这个数目基本没有问题，但是连续提供10年，把握可就不大了。因此，决定先设定为一年。我们采用了最简单的方式，作为购买树苗的经费提供给西留乡的龙首山和恒山南面的造林项目。

在浑源县最后的那天夜晚，我们和中方人员在恒山饭店的一个房

间开始了磋商。当时只觉得很紧张，心想：匆忙上马的项目，基础又薄弱，如果起步就马失前蹄，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从来没和国外有过什么合作的经验，中方也很紧张。中方由共青团浑源县委书记李启军宣布中方的决定，也可能是紧张的缘故，只见他一个劲儿地直舔嘴唇。正当这时停电了，会议室里顿时一片漆黑。点上蜡烛以后，会议在烛光下继续进行。

“我们对日本的援助表示感谢。”

当李启军书记念完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以后，我们又赶赴省会太原，走访了林业厅、绿化委员会、外事办公室等有关政府机构。在太原，我们和山西省青联之间发生了争执。他们对在浑源县达成协议的部分内容横加指责。当时全程陪同我们一起活动的人转达了此事。

我们问：“签协议时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到现在才说。不行！”

可是她竟说什么：“那时你们也没征求我的意见呀。”

她没当场提出来自知理亏，因此也没再说什么就回去了。可是她并不罢休，一来还是那一套，反反复复几次。她还满不在乎地说：“只要按我们的意见修改，下边的事我们会摆平。”对我们来说，这是最不能容忍的。我想，这可能不是她个人的意见，而是上面的意思吧。

为了不给当地造林点添麻烦，我们出钱做出适当的让步，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后在做好的协议书上签了字。交换文本，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此以后，在大同，除了实质性的文本以外，诸如合同之类，一概不做。此类文本一出，有责任感的一方反而被套得牢牢的。既然如此，还是没有为好。

在初期阶段，所谓互相信赖关系，可以说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认为互相坚持各自的主张有什么不好。但是，过后的结果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打那以后，山西省青年联合会再三要求我们在去当地农村之前一定先去太原。也许他们觉得项目如果选在自己够不着的地方不好控制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考虑。我们不了解当地的情况，而太原的干部又不了解农村，我们双方在一起高谈阔论，你想想，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以石原忠一顾问为团长的第一次绿化合作团在 1992 年 5 月黄金周期间访问了当地。该团迫不得已选择了太原→五台山→大同的路线。前来陪同的山西省青年联合会的干部一个劲儿地向石原团长灌输着“黄河流域的绿化最重要”的观点。山西省青年联合会的重点课题是黄河沿岸的绿化，而我们选择合作项目所在地的浑源县不属于黄河水系。



图 这是我种下的第一棵树，没过多久就枯死了。左边是顾问石原忠一（浑源县，1992年5月）

“日本鬼子”

从1992年9月开始，我在大同的农村逗留了70天左右。本来我应该让青年联合会发邀请，但我没有这样做，而是乘坐神户开往天津的“燕京”轮，在船上申请办理了签证。对山西省和大同的共青团，只告诉了我的到达时间。

大同的农村几乎都是未对外开放地区，所以我的活动除了签证以外，还需要外国人通行证。可是当地只给我准备了一星期的有效证件。过后，有关人员告诉我：“怀疑你在农村待那么长时间，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像我这样傻呆呆的人，能当间谍就好了！总之，双方还是互不信任。10年后的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话数不胜数。

一个人出行最让人头疼的是诸如排长队买火车票的时候。放下行李也许就会被顺手牵羊调包儿。但是，装着好几个月的生活用品的行囊老背在身上，非常难受。到了大同，住大同宾馆的多人房，虽然没有什值钱的贵重物品，可是摄像机要是不翼而飞，那就就麻烦大了。所以，哪怕是稍微离开一下房间，都觉得心里不踏实。

一个人出行另一个让人头疼的事是吃饭。越便宜的饭馆给的菜量越大。一盘菜都吃不掉，而只点一个菜又觉得有点单调。吃得最舒服的是小摊儿做的面条。

“今天晚上改善一下吧，给我放两个鸡蛋！”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较劲儿，看能不能创下一天花钱最少的记录。

我的中国话只能讲几句寒暄话。如果跟中国的老朋友打招呼，会有人陪我去的，但是在我开创新事业的时候，还是想靠自己解决。

一路上摸爬滚打，终于来到了最初项目合作点的浑源县西留乡，住在了乡林业站负责人刘天文的家里。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共青团副书记王有全陪同了我。

那段时间过得很是悠闲。有时帮助老乡下地收割玉米、葵花子，有时用摄像机拍摄宰羊开膛的情景，有时悄悄地去看人家结婚，和工作忙得焦头烂额的现在大不相同。

过晌时分，我在西留村正溜达，听到了一声叫喊“日本鬼子！”这里所说的“鬼”，并非日本人概念上的那种骇人勇猛的鬼，而是凄惨可叹的“死鬼”。循着声音看去，可能是从中午就一直喝着白酒的缘故，几个喝得满脸通红的老乡正靠着土墙在地上坐着。

干脆装作没听见溜走吧，我心想。没有上杆子自讨苦吃的。可是转念一想，开始就逃跑，以后自己就会养成逃跑的毛病，那样的话，在这里开始的工作就会半途而废。浑源县在日中战争中是中方的战略据点，许多村庄都有牺牲者。

我毫不犹豫地走到他们身旁，拿出香烟，递到他们眼前。坐在中间的一人伸手接过。我用一次性打火机给他点上火，心里踏实下来。我坐到他们旁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帮助你们村搞绿化，你们反对吗？”

“是吗。原来这事儿不是瞎说的呀。刚才我还骂了你，不好意思。你不是鬼子，是日本人。”说完，又说：“不到我家去坐坐？”

我又鼓起勇气，跟在他的后面走去。钻过土墙门，走进一栋破窑洞，然后上炕。

怀里抱着一岁大点儿的孩子、脸色苍白的妻子拿来白酒和粗糙的饭菜直接放到了炕上。可能是昨晚的剩菜吧。我也没客气，端起酒来。对方的汉子也喝起来。

汉子开腔了：“这村的干部都不怎么地，腐败透了！”

我接着话茬，问：“今天我住刘天文家，他怎么样？”

“刘天文……他可是不错，和我的关系没得说。”

语言不通，又喝得懵懵懂懂的两个醉鬼，翻来覆去说着车轱辘话。

也许有人觉得奇怪：你说你完全不懂中国话，怎么能说到这个份儿上？其实，只要有时间垫底，对方的意思基本能揣摩出个大概。再说对方老是缠着你不放，直到认为你听懂了，才肯罢休。

天擦黑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刘天文家赶。他家门口聚集着一堆人，只见刘天文从人群里蹿出来，冲我大叫：“你跑哪里去了！”午饭以后，我跟谁都没打招呼就出去了，寻不见我，大家正着急呢。

“我呀，到你好朋友那儿喝酒去了，结果喝高了。”

“什么？我的好朋友？谁呀！”

“就是他，那边那家。”

话音一落，刘天文往常那副温厚的表情顿时阴沉下来。好像我说的“好朋友”那句话惹他生了气。想来也是，日本人再怎么可恨，也不至于当面就骂人家“日本鬼子”呀。还是有点不正常。再说，哪有跟刚认识的外国人一见面就说“村里的干部都腐败透了”，确实有点儿过分。

可是他（我连他的名字也没记住……）对我来说可是个“好老师”。如果没有那次应战，也就没有现在的高见了。那次经历壮了我的胆儿，我在农村再也知道什么是害怕了。

从这件事中我还体会到了应该如何去判断别人说的话，它关系到怎样去了解情况和做调查。对方说的话有多少可信的成分，不动脑子经过验证，了解的东西就往往大打折扣了。

温增玉夫妇

在造林项目活动初期，有几个人让我难忘。首先就是温增玉。当时他担任浑源县的林业局长。1992年1月，当第一次调查团在西留乡问他“最希望我们这些日本人做些什么”时，他只简单地答了一句“希望坚持友好”。关于绿化，他说：“那是我们的工作。”话里话外，好像在说：你们日本人能干什么呀！

从北京和太原来的翻译都很喜欢他。他们知道交涉幕后的情况，跟我说“真正认真考虑绿化事业的只有咱们这位林业局长。在中国，这样的人被称为人民公仆。现在像他这样的人可不多了。”

在中国，作为对年长者的尊称，往往在姓的前面冠上“老”字，而在前面加一“小”字，则是对年轻人的爱称。我和“老温”开始亲近是在1992年秋天单独一人在大同农村长期蹲点的时候。起初，县里的团干部一直陪着我。可是，年轻人没长性，没过多久就烦了。我又不会说中国话。即使跑农村也就是看看造林点和村子里的情况，照照相，拍拍录像。整天陪着我这么个中年人转来转去，不烦才怪呢。结果，以后只要一进村，他们就马上钻进哪家，不是忙着搓麻，就是敲三家，哪还顾得上我呢。再到后来，干脆连跟也不跟来了。

一天，我和共青团的干部在县城里遛弯，碰巧遇上了温增玉，只见他推着一辆自行车。原来车子放炮了。老温冲着团干部不客气地说：“日本人来，你们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因为是共青团接待的，和林业局没关系。”

“可他是我的朋友，你们当然要告诉我。”老温气得满脸通红。

我得知，老温的家就在我住宿的招待所附近。那以后，我每天早晨去他家里。有的县局长级别的干部配有专车，住的房子也很豪华。可是他家住的是极简陋的民房，生活也很简朴。早饭基本上是小米土豆粥和腌白菜。每天都是如此。

我每天去他家，而他家每天早晨都有客人来访。一大清早就登门来商量各种事情，看来他很受人信赖。

“老温，今天你有什么日程？”我问。他要说“开会”，我立马就打道回府，设定自己的计划，或者骑上从招待所借来的自行车到附近的村里转悠，或者干点儿其他什么事。这个“会”呀，实在是多。听说过去中国农民有两怕：“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可见共产党的会议之多。可最近也有人说：税也不低！

只要他不开会，我总和他漂在一块儿。车子是军用吉普车，全身红色，车身上漆着“森林消防”几个大白字。只要车子一进村儿，很多人便聚集过来，亲热地冲着老温笑脸相迎。我也跟着沾光，心里很舒服。听说老温年轻的时候当过中国人民银行的会计员，又曾先后担任过4个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后调到县林业局，最后当上了林业局长。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以后被恢复的乡镇一级的基层政府取而代之。老温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干部，农民对他都很亲热。

浑源县有28个乡镇，我跟随老温走过的乡镇起码有一半以上。他领我走访各处的森林和果树园，告诉我树木的中文名称。当他说出树名时，我就问是哪种树，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告诉我。

一个村子，哪怕只去过一次，也会留下深刻印象。至今我对浑源县也能在脑海里画出大概的地图。树木和植物的名称也记了不少，其中不乏好多是先知道中文名而后才知道日文名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了解到山沟里的好多村子在战争期间因为顽强抵抗日军而遭受了巨大的牺牲。因为游击队一直以贫困的山村为据点与盘踞在县城里的日军展开拉锯战。

老温和我都爱喝酒，老温的司机更是了不得。吃午饭时，花两块块钱买来散装的一斤白酒。酒有53度。老温把酒一分为三。我说不行，太多了，老温就把酒倒给司机一些。司机毫不在乎，下午照常开车，路再不好走也不耽误。

“汽车喝油，司机喝酒。”听着我这蹩脚的中文，三人开怀大笑。到了11月，山里开始下起雪来。雪花落在我的膝盖上，可是车

门是关着的呀。原来吉普车门关不严，嘎嗒嘎嗒直响。

如果回招待所晚了，经常不去林业局，直接回到老温家。每到这时，老温就拿出烟和白酒，犒劳司机。老温的老伴儿叫郭玉香，她在路旁一间土坯房开了个小铺，经营着烟酒和油盐酱醋。依我看，卖出去的远不如老温随意拿来犒劳大家的東西多。

过了一阵子再来的时候，小铺已经不见踪影，被一家电器修理店取而代了。温夫人高兴地说：“租给别人，一个月还可以赚 80 块钱的房租。”

“这么说，以前连 80 块钱都没赚到？”我问。

回答更是令人拍案叫绝。“赚钱？打开始就没想。老温的朋友多，我们也高兴，老温又一直愿意犒劳大家，所以干脆开个铺，这样，成批进货比买零售的便宜。”



图 浑源县林业局长温增玉夫妇。我每天到他们家里吃早饭——小米饭和土豆。

她有时在店铺的里屋和小伙子们一起打麻将，钱数倒不大。要是没有这个胆量，也不会接受我这样的人来家。

老温的地方口音很重，听起来很费劲儿。温夫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我们处的关系如此亲密，可是语言上的交流却无能为力。

温增玉夫妇给我的印象极深，零碎的记忆尽管很多很多，但是要用语言把它们组织起来却是难事，让人干着急。

我最遗憾的是，老温在退休前得了胆囊炎，不能喝酒了。

“来，这是咱们最后一次干杯。”没想到这话也反复说了二十多次，不过在他退休以后，每天有许多朋友跟他在一起，过得蛮不错。温夫人在 2001 年春天患了脑溢血，不知道那以后过得怎样。

我们受到了监视

2002 年 12 月，我去看望了老温。好久没见面，很想听听他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和我相处的。

因为事先打过招呼，温夫人正在房前等候。虽然左半身行动有点儿不利索，但是不用拐杖也能自己走。有些发福，可是说起话来和从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至于说的什么，还是一点儿没听懂。

对我的提问，老温答道：

“你高见，好人一个！有一次，我们只带了干粮和水，一起到山里去。因为途中耽搁，回到县城的时候，食堂已经关门了。没办法，只好把你领到家里。见你高兴地把饭菜一扫而光，打那以后，我就让你每天早上到我家里吃早饭了。

“走访农村时，了解到有很多村子曾经遭到日军的烧杀掳掠。每到这时，你脸上都会现出十分惭愧的表情。虽然你没有直接的责任，

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你作为一个日本人在承受着这些。看得出来，你想为死难者的后代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你做事很投入。每转一座山，你都要看看土质，详细询问那里的海拔有多少？降雨量多少？长的是什么树？夜里回来还要研究，做记录。发现漏掉的问题，第二天再补问。不仅特别认真，而且抱着科学的态度对待工作。”

这些话虽然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但因为是老温的看法，所以只好照原话转录于此。

可是突然，老温话锋一转：“有件事我必须得跟你道歉。”

什么事呢？

“当初你们5个人从日本来大同，在恒山饭店举行了座谈会。当时出席会议的县长指示我们说话时要做到内外有别，来的是日本人，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以后的责任就落到我头上了。因为以前没和日本人打过交道，所以很谨慎。心想，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难道真是为了植树吗？还是有其他什么目的？他们不会趁机调查地形，调查道路，探问军事情报吧。总之，心里直犯嘀咕。

“所以，开始那段时间只领着你去和项目有关的地方。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明白了你们确实是为绿化的目的而来，所以领你们去的地方也逐步扩大了范围。”

噢，原来如此。也真难为他了。想来会议多的原因，并非只是个托词，实际上是不方便带我去各处吧。

“经过两年时间一起工作，最后我得出结论。日本人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绿化。中国的环境变坏了，日本也得受牵连，你们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想法，我终于理解了。”

受到如此监视，感觉迟钝的我竟然毫无察觉。只认为他是个好人，所以我老缠着他寸步不离。而且我是个酒鬼，一喝醉酒就把不住嘴巴，

什么秘密也保不住，马上就在脸上显现出来，就这样哪还当得了什么间谍！不过自己的天真无邪，却帮了我的大忙。

“你们想要地图，我说没有，其实既有一万分之一的地图，也有航拍图像，但是我没有给你们看，心里过意不去，但是现场我基本都带你们转过了。

“你们干得确实不错。一切从零开始，不仅合作项目扩展到如此规模，而且理解你们的人也越来越多。我呀，打心眼儿里高兴。”

让老温这么一说，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如果起步阶段无缘与老温相遇，恐怕我也难以坚持下来了。可是，我竟然被严严实实地监视了两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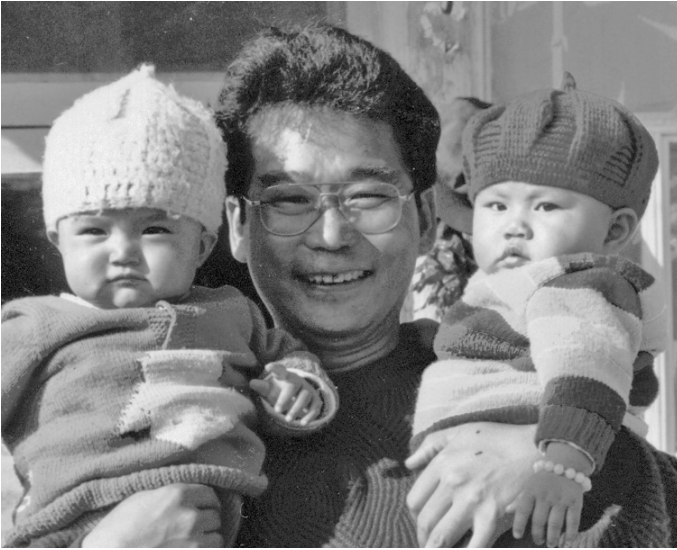
黄土高原上的娜乌西卡^①们

在我家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只不大的塑料镜框，照片上，我左手一边抱着一个一岁半左右的女孩儿，犹如“双喜临门”，我笑得合不拢嘴。记不得是谁给照的了。我夫人很喜欢这张照片，于是就摆到了桌子上。最早那几年我也照过不少小孩的照片，但现在即使见了面，恐怕也根本认不出来了。

那时，中方的合作伙伴并不能完全依靠。我语言不通，怎样才能深入农村呢？只能靠自己动脑筋，想办法。自己是能琢磨出办法的。我采取的战术是把孩子作为突破口，和孩子交朋友。尽管我知道用“战术”这个词表达不太恰当。总之，先和小孩子们搞好关系，好事会随之而来。

最重要的是和孩子说话的时候，不要居高临下俯视他们，而是要

^① 日本宫崎骏编剧导演的故事片和动画片《风之谷》。风之谷为一国名，娜乌西卡是风之谷国酋长的女儿。风之谷有着良好的生存环境，可附近的地区都被沙化或遭到邪恶孢子侵袭，于是娜乌西卡肩负起拯救风之谷和保护村人的重任。——译注



把视线和他们的视线高度拉平，或低于平视高度。不能吓唬他们。在孩子们做游戏时，我就蹲在旁边，注意距离不能太靠近，四五十分钟一动不动。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既能让他们注意到你，又不至于影响他们做游戏，这是非常重要的。等他们习惯了，你不妨再往前凑一凑。

乡下的孩子腼腆，习惯陌生人需要时间。操之过急，孩子们就会一溜烟儿跑掉。有时也可以借用小道具的手段。但是，给他们照当场成像的照片，显然是邪门歪道。因为一旦形成介助物质的关系，那么就很难更深入进去了。

总结了经验以后，我决定从小学校开始入手。我访问老师，并做自我介绍。诸如握手、拥抱互拍后背之类，即使稍有夸张也无所谓，为的是让孩子们看到自己和他们的老师关系是多么的亲近，这样就可以缩短你蹲在孩子们旁边的时间。因为孩子们和老师的距离很近，所以这层关系很管用。

孩子开始拉你手了，就等于“鱼上钩”了，这意味着你可以通行



无阻了。

“这是小学校。”

“那家有条狗很凶，注意离它远点儿。”

“这家的老爷子很固执。”

“你吃饭了吗？没吃的話，到我家去吃。”

家长看到孩子亲热地领着人来家，自然也就不会慢怠客人了。这样，我就时而蹭上不错的一顿饭，甚至有人家为我宰了一只羊。

不是有很多拍摄的贫困农村看着觉得可怜的小孩照片吗？我并不否认在现实中存在，但是我总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根据摄影的角度不同，照片给人的印象也会发生变化。从上面往下俯拍，就好像感到小孩在翻着眼珠偷着往上看，惨兮兮的、好像跟人要东西似的。因此，如果心怀歹意，是完全可以拍成这种情形的照片的。

我也跑过不少处贫困乡村，但所看到孩子都很活泼，有生气。他们没有觉得自己贫困。这很自然，因为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别看

他们小，但很有自尊，第一次见面给糖果，他们不会伸出手来。相反，他们好奇心很强，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你。

父母们总是自己舍不得吃，而尽量让孩子们多吃。越是贫困的地方，家庭的亲情意识就越强，给人的感觉也很纯洁。

我和乡下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弯下腰，或者坐到地上，那是因为喜欢观看孩子们可爱的表情。作为生在贫苦百姓家庭的次子，我这样做，也是在重新审视着自己。

问我为什么给本节小标题起这样的小标题？早期参加绿化合作活动的成员上田信(立教大学教授)和深尾叶子经常说黄土高原和“风之谷娜乌西卡”的世界一模一样。昌盛的文明破坏了环境，千年后变成了娜乌西卡的世界。黄土高原也是如此，是大文明繁荣过去一千年、两千年以后的世界。

“高见”我的中文名字

在大同，大家叫我“Gao Jian”，直呼其名，因为当地中国人之间也这么叫。我以为叫我的名字是“高见”，可是到村里访问时见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着“热烈欢迎！高健先生”。他们把“高”当作我的姓，把“健”当作我的名了。“高”姓人家在这里非常多，“见”和“健”在中文里同音。

不仅村里人这么认为，在四五年前当地报纸刊登有关我的报道时，上面也是写着“高健”，撰稿人竟是中方绿化合作项目的成员杨元胜。最近收到老朋友温增玉的来信，收信人名写着“高建”。

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日本演员是高仓健。但是“高仓”是姓，“健”是名。但在中国“高”被当成姓，“仓健”当成名了。这么一来，我们就变成一家了。

“Gao Jian”是我中文名字的发音。1971 年以来，虽然多次访

问过中国，可是中文一窍不通。因为每次都有翻译陪同，所以没有必要讲汉语。

1992年9月开始，我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在大同的农村逗留了70多天。那时我的中文水平也就是会说“你好”“谢谢”“再见”“厕所在哪里？”之类的程度。

不过，反而更好。不懂中文，我就得争取多去现场实地考察，了解真实。一起去过现场以后再听人谈情况，就可以判断出此人的可信程度。拿植树成活率为例，比如自己过目的树已有一半以上枯死，乡长却介绍有90%成活。那么这个人的话只能打对折。长此以往形成习惯，总是先去现场。

更方便的是，不懂语言，就不会为谎言所骗了，对方也不会去骗你了。总之大家在一起，你好我好。让你高兴，哪怕仅在这个场合，拣你爱听的话说。有的人亲切过分，甚至连他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也教给我。我此番讽刺话结果遭到了朋友王黎杰的反唇相讥：“日本人不是那样吗？在大阪问路时曾经挨耍了。”

看来无论哪个国家，对外国人都很热心吧。

语言不通，使得其他感官敏锐起来。和乡干部在一起走路，碰上村里人，从农民刹那间的表情可以判断出，“噢，这个干部在村里的人缘不怎么样”。这瞬间的印象，往往八九不离十。

我为不懂中国话大言不惭列出这么多条好处，中文自然也就不会有长进了。

即便如此，在只讲汉语的生活环境下，我还但是不知不觉地就能听懂了，让人不可思议。自己记得好像是从1993年开始的，那年秋天，我在大同逗留了50多天。一天，我们去大同一直往西的芦芽山考察天然林。途中碰上当地老乡问话，对方说的基本都懂，而且我回答也用了汉语。

从大同跟来的团干部都感到有些奇怪。

“高见，那老头儿的话连我们都听着费劲儿，你怎么能听懂呢？”

当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对方的话语先输送到大脑形成印象，回答自然而然也就出来了。

抛弃半生不熟的中国话

虽然我已经掌握了一些中文的日常生活用语，但是我决定抛弃它了。为什么？当然事出有因。随着大同合作项目的迅速发展，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已经根本不够用了。

我是通过一件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无论你有过什么样辉煌过去，上了岁数身体出现故障时，都要住院，或到疗养院养病。此时就会受到年轻的护士或者医生像哄小孩儿似地对待。“老大爷，你这是怎么啦？”结果越发不愿意回答，形成恶性循环。

不幸的是，我的合作对象是共青团。虽然他们都很精明强干，但缺乏基于实践经验的想像力。我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对付，不知不觉就被当成小孩子了。我想表达自己的意图，罗列几个残缺不全的单词，结果反遭取笑。

“高见，这是一豆一腐一”

“豆腐谁还不知道！”我不客气地回了一句。我心想，这样下去可不行！如此下去，不仅建立的正常关系受到影响，而且不知何时，我自己就会火山爆发。

1994年春天，我请王黎杰做翻译从北京一起去大同。我和王黎杰认识已经20多年了，因此互相知根知底，不必客气，感觉真是轻松。除翻译以外，好多时候我还请她帮着出主意。

我向王黎杰诉说被共青团的人当孩子耍的事，她说：“何必为这事苦恼，以后有需要，尽管说好了。”从此以后，王黎杰每年都去几次大同。大同方面也都叫她“王老师”，开始依靠她了。

“绿色地球网络”的顾问小川房人是驻外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听说他是著名生态学者吉良龙夫小组的干将。他说：“外语这东西，要么就干脆一点儿也不会，要么能达到和人家吵架的水平，除此之外，其他都没用！”

不错，不愧是高手！

他有一次要和所在国的政府去交涉，对方说“不行”。他马上装傻：“是吗，今天不行，那我就明天去。”“明天不行。”“那我就后天去。”小川说：“不管什么棘手的问题，基本上去 8 次就会解决。”我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 1995 年春天开始，祁学峰开始尝试在大同培养翻译，选定了 1990 年期间曾在日本的埼玉医科大学研修过一年的护士王萍。从此，她开始一直跟随我做翻译。她的日语进步得很快，相反，我的中文却是节节败退，每况愈下。

第 2 章 黄沙肆虐大地

2000 年春天，漫天的风沙天气持续了好多天。进入 4 月份以后，在大同三天中有一天是风沙天。遇上如此肆虐的风沙天气，我从 1992 年开始在大同的 9 个春天的经历中还是头一次。

看见风沙席卷而来，不由本能地马上转过身去，闭上眼睛。可是，类似这种程度的风沙还算好的，碰上厉害的，无论你怎么转身，都躲不过扑面而来的沙尘，两眼什么都看不见，只能蹲在地上告饶了。这种状态能持续两三分钟。坐车移动过程中，能见度几乎为零，前面的车仅离 10 米远就看不见了。沙尘打在挡风玻璃上，让人疼得慌。司机慌忙急踩刹车。

风沙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前面讲过的，风沙横扫地表，卷土而上。旋风亦属此类，它基本上发生在春天气温骤升的下午，大风激烈地打着旋涡，把土卷上天空。在育苗和栽培的实验设施、环境林中心，并排三栋塑料大棚的中间一栋，塑料顶棚被卷上了天。那气势令人叹为观止。钢筋骨架也被吹得变了形，即使用脚使劲踩也恢复不到原位。

另外一种类型是弥漫高空的黄沙。即使晴天，天空也被染成黄灰色，好像傍晚降临。太阳时而露出白脸，时而消失。接近地表的风并不大，不影响户外活动。从遥远西部的沙漠地带由风蚀颳起卷入高空的沙尘一直向东飘移。

对强烈的风沙现象，中文称之为“沙尘暴”。虽然日文没有恰当的词汇对译，但望文可知其意。几年前无论在大同还是北京，人们都说：“以前的沙尘暴更厉害，经常被困在家里出不了门。因为种了不少树，沙尘暴才消停了许多。”

我这个人好抬杠，每当这时都回上一句：“你在说什么呢！种这么几棵树，就马上有这么大变化！”

2002年，沙尘暴更是横施淫威。3月20日早晨，我打开大同宾馆客房的窗帘不禁大吃一惊。窗外一片黄色，能见度极低，隐隐约约地看见宾馆前院不到100米处的红旗被吹得好像要撕裂。

沙尘暴第二天刮到了北京，据说22日袭击了日本各地。从大同吹到日本，经过了两天时间。即使在日本，黄沙也成为了人们的经常话题。2002年11月黄沙又一次抵达了日本，这种情况实为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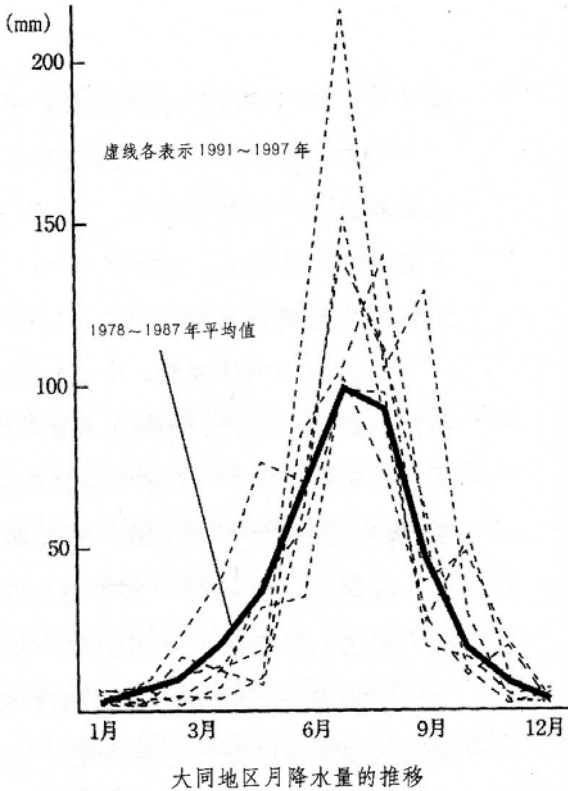
春天，黄土高原不下雨。虽然大同的年均降水量400毫米，但几乎都集中在7~8月份，而春天少雨。农民盼着老天爷下雨，准备播种。但“春雨贵如油”，雨老是不肯下来。

在调查当地降水量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90年代以后，每年本来少雨的3月~5月的降水量，比80年代平均降低了一半。相反，7~10月的降水量却比以前增多。一年合计的数字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这种微妙的变化却给农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参见资料“《大同地区月降水量的推移》”）。

同时，降水量的变化也许对发生沙尘暴也带来了影响。春天变得更加干旱已是不争的事实。地球变暖导致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气象异常现象。大同的年均气温在此30年间上升了一度。如果降水方式的变化与地球变暖有关，就会带来更加棘手的问题。

越下越让人头疼的雨

在大同北部的阳高县，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靠着山呀没柴烧，十个年头，九年旱，一年涝。”仅仅16个字，把这块土地的环境和生活状态的严酷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山，尽是秃山，草木皆无，而且几乎每年发生旱灾。我从 1992 年开始往返大同，其中 1993 年、1995 年、1997 年、1999 年、2001 年的旱情比较严重，1992 年和 2002 年的旱情比较轻，稍好的年份是 1994 年、1996 年和 1998 年。但这只是从大同自身的角度相比的好坏程度，如果用一般标准衡量，每年都属干旱。十个年头九年旱，绝非夸张。

那么，什么是涝灾呢？其典型是 1995 年。这一年，从春到夏，旱情十分严峻，可是到了 7 月中旬开始下雨。往年 8 月中旬以后几乎不下雨，可这一年从 8 月末到 9 月下旬，三个星期雨下个不停。

地处黄土丘陵的村落，大多农家都是土坯窑洞。他们把和好的黄土用坯模做出砖坯，晴天时把它晒干，然后盖房。房顶和山墙很厚，隔热效果很好，冬暖夏凉。因为干旱少雨，不会受湿气影响。当然，也没有什么花费。

因为少雨，所以房屋能持久不塌，甚至有些建于明代的房屋已经熬过三、五百个年头，在这次淫雨中却没能躲过。房顶和山墙被雨水沤透，房屋接二连三地倒塌。仅大同就有 6 万多家 24 万人失去了住房。

如此规模的“十个年头一年涝”，当然受不了。即使没到这个程度，受雨侵害的事情也屡屡不断。



图：往年 8 月下旬几乎不下雨，可这一年淫雨不断，造成土窑洞倒塌。
(阳高县，1995 年 10 月)

2000年从春天开始就不下雨，可是到了7月上旬连续下了三天雨。我们在灵丘县建立的自然植物园，雨量达到了220毫米。据说雨大时两小时就达到了76毫米。此地年均降水量为400毫米，220毫米则相当于一半以上。如果用2001年那年只有250毫米的降水量作比，那么这三天就把这一年的雨量给下出来了。

这时，从附近的南庄村到植物园的道路被冲垮多处，通行受阻。当初如果道路修建得档次高一些就好了，可惜我们的资金先天不足，所以规划时只能凑合着修建档次低些的道路，到时只把多次被冲垮的地方修补结实点儿就行了，别无他法。事到如今，这时也只能采取应急措施。

我也经历过一小时70毫米的降雨。惊心动魄！你先会看到云层越积越厚，天空变得漆黑。风速加强，树枝激烈摇动。当地人特别注意此时的风向，曰：若吹东风则雨，乌云若由东向西移动则雨。这与日本不同，大同的西边只有沙漠，西边不会有云把雨带过来吧。

然后，开始打雷。闪电撕裂长空，雷声隆隆轰鸣。但是也有不少时候正像中国人所说的“光打雷不下雨”。用日本过去关西地方的歇后语说就是：“澡堂子的大锅只有热水。”^①在中国经常用“光打雷不下雨”来讽刺只耍嘴皮子不干实事的干部。

闲话休题。受这次大雨的影响，我们环境林中心的大院变成水塘。苗圃也灌进水了。管理处的房屋也漏雨不止，走廊到处积水，等雨小了，才用扫帚把水扫出去。天棚板洩得厉害，只好拆下来晾干。

这种下法的雨，越下越让人头疼。然而，最本质的问题确由此而生！

严重的“水土流失”

^① 此处日文“热水”与“说”为谐音，意思相当于北京的歇后语：“天桥的把式，干说不练。”——译注

从大同去往浑源的途中，经过三岭村。三岭村坐落在山口，从高处眺望周围，景致甚是壮观。远方群山，不见树木。山腰、丘陵，到处是一片片的耕田。层层梯田的田埂，仿佛地图上的等高线，美不胜收。在这里，还能看到被夏雨冲刷的沟谷。

村民住在土窑洞里。因为村头有烽火台，所以我们的伙伴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烽火台村”。凭高远眺，有人甚至说：“只看此处，我到黄土高原也就不虚此行了。”更有甚者，久保朋子在日本广播协会（NHK）的广播节目中说：“这是一个现在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梦幻之国。”其实，诸如此类的村落还有很多。

三岭村和前头的二岭村之间的沟谷颇为壮观。在道路两旁，沟谷深度有近 100 米。有人说：“好像是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微缩景观。”怎么会出这样的景观呢，当初我一无所知。摄影家桥本紘二对沟谷情有独钟，甚至想把出版的摄影集取名为《沟谷大地》。我想，无论是谁，见此光景，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吧。日本人恐怕是怎么也想像不出来的。

虽然这么说，但是有的日本人对沟谷很了解。我们从曾经从军来过山西的日本人那里听说，当时把沟谷叫“地缝”。卢沟桥事变引发日中战争后不久就开始了“山西扫荡”。在这里展开了中国叫做“三光政策”、日本叫“灭绝作战”的激战。当然，中国方面的牺牲巨大。对日军来说，最让他们难对付的就是从这些地缝里神出鬼没地冒出来进攻、又钻进去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游击队。

有人说，战争说不好谁是谁非；也有人说，感谢为国捐躯的人理所应当。最近这种论调好像有增无减。但是，劝君不妨好好想一想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那场战争是在哪里进行的！是在中国的农村（当然也包括城市）进行的，它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害。日本如果不来这里，也就不会出现这种事了。我认为，弄清这个逻辑关系，对今后

的日本本身也是至关重要的。

言归正传。沟谷是夏雨的作品，是雨水冲刷的结果。400 毫米的年降水量，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在 7~8 月，而且降雨的方式很糟糕，范围集中，大雨如注。这些情况，我已在前面做过一些介绍。

据前不久的数据，通过三门峡水库流入黄河的泥沙量为一年 16 亿吨。1 立方米的水中含 38 公斤泥沙，其中 80%是来自黄土高原的土。16 亿吨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用这些土修筑一道 1 米宽、1 米高的堤坝，可以围着 4 万公里的赤道转 27 圈。

这么多的土，以往一直都是黄河把它们带到海里的。可是，黄河越来越老态龙钟，最近连水都流不到河口了。中国称之为“断流”。流入黄河里的泥沙量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改变。泥沙走到半路就滞留河底。虽然每年都在加高堤坝，但终究不能无止境地加高下去。如果大片地区普降大雨，结果会怎样呢？为“断流”所困惑的中国之所以警惕黄河的大泛滥，原因就在于此。

回顾历史，黄河大约每隔百年会有一次改变河道的大泛滥。前一次是在 1855 年。现在的情况已经近似当年。

木
水
土

理光公司一直对我们的项目给予支援。在理光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听到一个话题，说最近在日本，市民踊跃参加植树造林活动，有人在一块宣传板上写“森”字时，本来由三个“木”字重叠的“森”字变成了上边是“木”字，左下方是“水”字，右下方是“土”字。有道理！我不禁为之感叹。树木有水有土才能生存，有树，水土才能得到保持，相辅相成。黄土高原因为失去了森林，所以造成了水土流失。

水与土是万物生命之源。水土丧失，农作物和植物将不复存在。这就是黄土高原的沙化。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这里，集中在夏季的雨水，加速着土地沙化的进程。

水枯！

理解黄土高原农村的关键词是“水”。1992年秋天我走访农村时，更加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但是与此相比，现在的状态已经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饮水难的问题已经波及许多村庄。

广灵县平城乡的苑西庄村，迄今已经打了二十多口井，可是这些井水接二连三地干涸，最后只剩下4口井有水了。其中一口井一天只能打两桶水，4口井合计也就打100桶水。一百五十多个村民和牲畜仅靠这点儿水过活。

1997年夏天，我们和朝日电视台的采访组一起在农家生活了几天。早晨要洗脸水，只有盆底一点点儿水，少得可怜。4个人轮流洗脸。我最后一个洗，完后正要把水泼到当院，房东慌忙过来把我止住。其实房东不阻止我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羊儿和鸡见我拿着脸盆走出来，马上就奔过来了。

在日本邮政省（当时）的国际志愿者储蓄基金和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的支援下，我们为两个村庄打了水井。在苑西庄村176米的地下，找到了一小时出水15吨的水脉，是这个县最深的水井。通水仪式结束后，一位老人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不放，对我说：“这下可好了，俺村再也不用出去讨水喝了。没想到今生在世能遇上这么天大的好事。这么清、这么甜的水，别说喝，就连看也没有看到过。”说着说着哭起来了，结果把我也给弄哭了。

过后村长对我说，本来水泵傍晚才从镇上运来，可村里人得知要

出水了，早早就赶来围着不肯离去，结果没办法，我们只好连夜安装好水泵。出水时已经是早晨5点钟了，大家也一直陪到了那时候。

第二口井打在灵丘县史庄乡石瓮村。该村有一口井是清朝光绪六年（1880年）打的，井深约40米，听说是当年一个村里人在外事业有成，出钱打的。在立的石碑上，刻有这样的内容，说打井十分艰难，一斗土石一碗钱。

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这口井的水位开始下降了。村民慌了，赶紧深挖，但是毫不见效，几年过后，水井终于枯了。

村民只好到山下4公里以外的北水泉村去打水。他们把用大油桶改造成的装水桶放在马车上运水，来回基本花费一整天。北水泉村靠山下的泉水过活。出水口用石头砌好，通过铁管导水。如村名所示，村里以前有好多泉眼，现在就剩下这一处了。3年前打一桶水需要一分钟，现在需要8分钟。也就是说，出水量只有原来的八分之一。



图：村民只好到 4 公里外的地方打水。泉水的出水量只有 3 年前的八分之一，仅打水就得花费半天或一天的工夫（灵丘县，1999 年 4 月）

装满一桶水并非易事。因为是外来讨水的，遇上本村人来打水，就得让人家先打。就连本村的羊儿来喝水，你都得让它先喝。我经常走访的那家农户，一次运来 200 升的水够 5 天到一个星期用。6 口人家，包括生活用水，一人每天大约用 6 升水。按照成人每天摄取量为 3 升的最低标准计算，可以说是临界点。基本不洗东西，洗东西后的水要给牲畜喝。村里的规矩是：“借油可以不还，但是借水不还不行。”

在石瓮村打的井深度达 183 米，出水量达到了预期的 1 小时 40 吨。因此，不仅石瓮村够用，包括北水泉村在内的 6 个村庄 1000 人的生活用水都得到了解决。

在打井过程中，打井队的头头跟我说：“井水和泉水干涸的村子越来越多，特别是地处临近县界的山区和丘陵地带的村庄更严重。我们这些人最了解生活缺水的难处，即使赚不到钱也想给他们打井。可是，缺水的村子大都穷得叮当响，哪有钱来打井！没有打井订单，我们的工资又被一拖再拖，自顾不暇，只能干着急。”

摄影家桥本在走访农村时发现了缺水的村子。他领我们走访了浑源县南水头乡的几个村落。这时遇上了马车队，正急着赶往谷底有井的地方，说是好多天没水，今天有水了。

井里确实有水。在井旁有一条小水流儿，水通过沙层流到水井里。硫磺味儿很冲。沿着水流往沟谷里面走，原因知道了。那里有煤矿的废坑，是用水泵抽出的滞留废水。

“高见，应该认真调查一下。”桥本说。

确实，这种水喝了肯定对身体不好。可是没有水怎么办呢？

“桥本，你以后不要再去发现新问题了。我现在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我回答道。



图：听说谷底的水井今天有水，马车赶来了。但是，这水是煤矿的废水，硫磺味儿很冲（浑源县，2000年4月）

我深知当地最需要的是水。解决水的问题，农民当然高兴。但是自那以后，我们没有再给村子打井。即使应急是需要的，但这不是能够从长远上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地方的缺水难，已经大大超出打几口井就能解决问题的范畴了。

我们通过打这两口井，认识到了中国所面临的水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仅是走马观花而不是自己实际亲身参与，得到的认识会很不一样。

农家孩子多

绿化团成员在走访农村时都很吃惊，特别是熟悉最近日本农村的人更吃惊：农村孩子特别多！我们走访的农村自不待言，有时在路上临时停车，就会围过来好多孩子（和大人），用充满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

日本人见此很高兴。上岁数的人不免想与他的交谈，说“自己小时候就是这样，眼睛很亮，现在日本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情景了。”

对中国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问：“有这么多的孩子，这么说农村不实行计划生育了吗？”

中国的计划生育当然也包括农村。在公路两旁、公共建筑和农家的房墙上，到处都写着有关计划生育的口号，例如“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少生优育”“要想快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计划生育，丈夫有责”“女孩也是继承人”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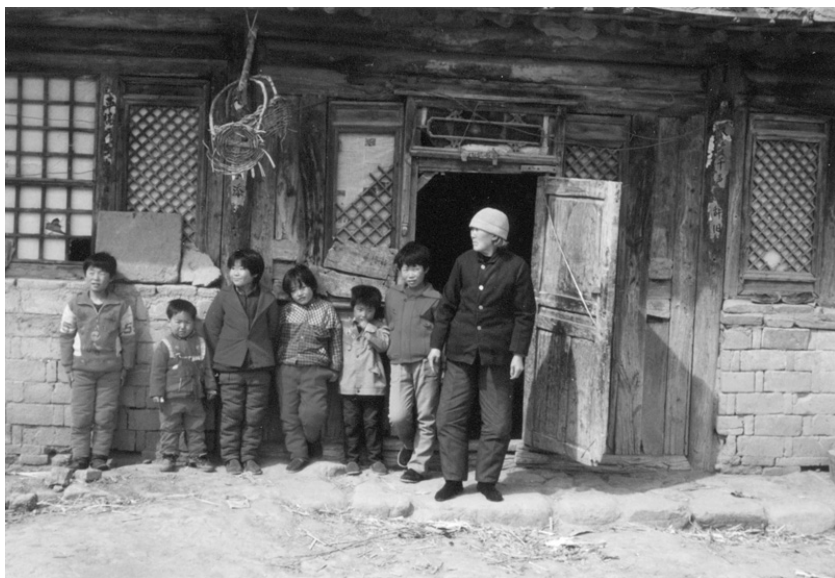
大体说来，农村实行两个孩子的政策。但实际上有三四个孩子也不稀奇，有些家庭甚至有五六个孩子。我所接触的家庭中最多的有8个孩子。有一次我去天镇县的一个村子时，和在外面玩耍的八九个小女孩儿手牵着手在村子里转悠。也许因为有翻译王萍在场，所以孩子们对我也没怀戒心，拉着我的手。这些女孩儿也就是小学低年级。

其中有几个女孩长得特别像。

“你们是亲姊妹吗？”

“是。”

“几个姊妹呀？”



P57 图： 农家孩子多。贫穷的村子缺男孩子不行。直到生了男孩儿才就此打住。（天镇县，1996年4月）

“6个，最小的是弟弟，所以爸爸和妈妈说不再要了。”孩子回答，“可是那家有8个孩子全是女孩儿，有两个已经送给别人了，所以还想要第九个呢。”

这可是小学低年级女孩儿说的话。孩子对这件事到底理解到什么程度权且另当别论，计划生育在农村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继承家业的是男孩子。标语口号中特意强调“女孩也是继承人”，可见与此相反的观念根深蒂固。女孩子虽不能继承家业，但移动自由，天南海北哪儿都能去（虽不一定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不能简单地说男孩子就好。

在穷乡僻壤，人们认为传宗接代祭先祖，是人生之大事。没有结婚，没有子孙，不仅自己不幸，对先祖也是不孝。有农民对我说：“因为有了男孩儿，我也能踏踏实实地做庄稼了。”

这一带的农村，大多土地贫瘠，条件恶劣，但每户的平均耕地比较多。因为有很多耕地不能使用机械，甚至连牲畜都用不上，所以必须通过人力来耕作一块块的田地。特别是挑水，更是苦差使。远离水井的人家要挑着沉重的水桶往返走上3个小时。这些活基本上都是男人干。这些靠力气才能胜任的重体力劳动，如果没有男人，一家的生活难以维系。

由于没有公共的社会保障，为了家业，为了老后能有依靠，所以一家最少也要有一个男孩子。直到生出男孩儿才打住，是有着它的道理的。要使口号变成现实，彻底地实行计划生育，首先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环境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

黄土高原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人口问题。许许多多的人在这块水土不堪重负的土地上生活繁衍。这种超负荷状态在破坏着环境。通过对大同市几个县的对比，就可了解这种情况（参见下图）。

紧邻大同市区的大同县地势平坦，土地条件也很不错，而且人口少，人口密度为1平方公里130人左右。出外打工，从事农业以外工作的人也不少。这样，每户农家平均耕地比较多。这地方有杨树林，因为水不充足，使得杨树先天不足，长不高，当地人称它“小老树”。该县小老树特别多，说明土地还很充裕。

南邻的浑源县和大同县形成了鲜明对照。土地不足2000平方公里，而人口却超过了35万。听说没有户口的“黑孩子”占十分之一以上。土地条件恶劣，与大同县无法相比。县北部是黄土丘陵，中部

植被和生态系统一旦遭受破坏，便会加重水土流失。耕地越来越受到破坏，地力下降，农作物和植物长势欠佳。水分涵养力降低，耐旱能力丧失，大片地区发生地下水干涸现象。

山地人口少，但平地很少，耕地也不多。很早以前好像长有树木，由于长期砍伐，现在消失殆尽，这样水土就难以保持。陡坡上虽然也种上了庄稼，但因土层薄，很难改造成梯田。田地表面倾斜，坡度陡的地方超过 30 度。我总在琢磨：在这种没着没落的陡坡地上，他们是怎么种地的呢？

所谓“三跑田”即指这种地。一下雨，水跑了，土跑了，肥也跑了，收获所余无几，这样一来又得开垦条件更加恶劣的林地和草地，扩大耕地。

家畜饲料和燃料也很短缺。人们把农作物的秸秆当做饲料和燃料使用。由于有机质不能回田，使得土壤肥力下降，结果只好再去扩大耕地。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以前有“穷家孩子多”的说法。这里也是如此。关于它的结构，我已经讲过了。虽然孩子多了要罚款，可是对贫困户却不奏效——农家满不在乎：“想拿什么尽管拿好了！”

环境破坏和贫困形成恶性循环。森林消失，不能再生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为了阻止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绿化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绿化不以阻止这种恶性循环为目的，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我近来常说，在沙漠上植树，沙漠就不再是沙漠了吗？沙漠化就会停止吗？沙漠之所以成为沙漠事出有因，防止沙化，只有从根本上治理，减轻其沙化程度，别无它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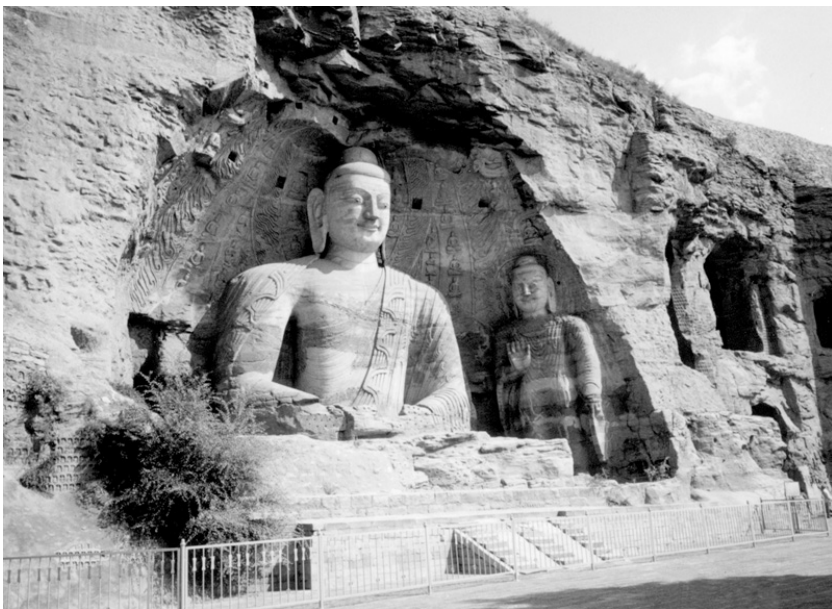
文明之后剩下的是沙漠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以为大同是一个多么落后的地方。那可是个

误解。

黄土高原是中国最早的文明发达地区。其中山西省南部的河东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尧、舜、禹都在这里留下了活动的印记。可以说，山西省是中国由古延绵至今的文明故乡。

大同地处黄土高原的边缘，也是山西北部的边缘，是“塞北”。大同也有过她的辉煌时代。从4世纪末开始大约一个世纪，大同是北魏的首都——平城。北魏是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建立的王朝，据说为了统治包括人口众多的汉族在内的许多不同民族，实行了强有力



图：云冈石窟。大同是北魏的首都，是公元5世纪人口超过百万的北方佛教中心地。2001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的移民政策，移民数量超过百万。加之原有人口，最多时曾经达到

120 万至 130 万。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是世界最大的都市。

在与南朝宋抗衡的过程中，北魏统治了中国的北部，势力发展到了长江沿线。以平城为中心，畿辅辖地筑起城墙，统治着西至连接黄河的偏关，东至今北京市延庆的广大地域。

你可能不会马上相信，但不妨提供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在离大同市区往西约 16 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冈石窟。在武周山的東西 1 公里的岩壁上，凿有 50 多个石窟，大到 17 米高的释迦牟尼坐像，小的仅 2 厘米的佛造像，共有 5.1 万尊佛造像，是从公元 460 年开始花费 64 年的岁月建造起来的。据当地研究人员介绍，每天凿窟工匠达 4 万人左右。2001 年末，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冈仓天心^①曾经参观了洛阳的龙门石窟，对其佛造像与日本的飞鸟时代^②、奈良时代^③初期的佛造像的酷似感到震惊。日本那些佛造像冠称“北魏模式”可能由此而来。龙门石窟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继云冈石窟营造而成。据说奈良时代的首都起名“平城京”也是源于大同的古称。大同和日本渊源久远。

北魏时期重视佛教，好像是为了安抚人口占数的汉民族，便于稳定统治。作为北方佛教的中心，现存的主要文物有云冈石窟，古时平城京还有一百多座寺院鳞次栉比，在永宁寺有高达百米的木塔。据说僧尼有三千之众。

鲜卑族的故乡在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地处大兴安岭的北部，从大同直线距离有 1500 公里。他们从遥远的地方南迁至大

^① 冈仓天心（1862—1913 年）：日本明治时代美术行政家、思想家。著述有《东洋之理想》《日本之觉醒》等。——译注

^② 飞鸟时代：自圣德太子摄政（593 年）至大化革新（645 年）间以奈良南部飞鸟地方为都时代。——译注

^③ 奈良时代：自平城迁都（710 年）至长冈迁都（784 年）间以奈良为都的时代。中国唐代文化的传入形成日本古代文化的繁荣时期，古代文化史上亦称天平时代。——译注

同建立都城，可能是因为这里环境好吧。据古文献《魏书》记载，这里山川秀丽，水木清华。确实，如果没有森林覆盖，也不会诞生如此灿烂的文明。

辽金时代，大同成为副都。上下华严寺和善化寺就是在那个时代建造的。应县の木塔（佛宮寺釋迦塔）是辽代的产物，高 67 米，是世界最大规模の木结构建筑。木塔大量使用落叶松等大口径木材，不用一根铁钉，斗拱采用木构件组合，构建极为结实。在它不远处，森林茂密，说明了深深扎根于树木和森林的文化。



图：应县木塔，高 67 米，为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建筑。（朔州市应县）

在浑源县北岳恒山山麓有悬空寺。建于悬崖峭壁的悬空寺营造于北魏末期，集佛教、道教、儒教三大宗教于一身，实为罕见。由于在附近浑河上游建设了水库，峡谷变浅，据说原先高出地面 90 多米。悬空寺，顾名思义，确有实感。悬空寺也是木结构建筑。

很久以前，这里确实有森林。关于山西省的森林覆盖率的变化有以下的推测数据（《山西通志》第九卷《林业志》）。秦代以前为 50%；唐宋代为 40%；辽元代为 30%；清代不到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为 2.4%。

森林为何如此迅速消失，该书认为是由于人类无视自然规律，一味地发展生产力所致。为了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人类进行过度的开垦。为了建设城市，不惜消耗大量木材。冶炼金属器具和烧陶瓷、烧砖也用掉许多木材，加之战火也烧掉不少木材——人类的文明消灭了森林。

文明之前有森林，文明之后剩下的是沙漠。大同可以说是个典型。

第3章 好事多磨

在大同开展绿化合作项目不久，我写了一篇短文，由我的朋友李建华翻译后，登在了大同的报纸上。文章题为《小老树》，内容大致如下：

从大同县到怀仁县，道路两旁有很大面积的树林。矮的有一人高，树根处长有好多蘖^①，呈灌木状。最高的也就3~4米，长得无精打采地七扭八歪。刚开始看到这些树林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对日本人来说，对有树木的风景已经司空见惯，反而像黄土高原没有树的风景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以为这些树是自然生长的。

可是，实际并非如此。这些树是50年代初期人们一棵一棵地种出来的小叶杨。从中可以领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人们怀着建设祖国的热情，在绿化方面也做出了努力。

遗憾的是，这些树木没能茁壮成长。因为苦于缺水，结果长成了这副模样儿。当地的人把它称作“小老树”。虽然中国人在称呼“小”或“老”时往往表示亲切，但看着这些树，我们却感觉不到这层意思。这些树辜负了种树人的期望是确实确实的。

我安静地走进树林，不久对脚下松软有弹性的感觉惊讶了。拿来铁锹挖了挖树根周围的土。一直到很深的土层都是肥沃的黑土。这样的黑土在黄土高原很少看到。

40年间在这里生长，成为树林实在不易。这些树虽然自己没有长大，可是她每年用自己的落叶和枯枝肥沃了土地。当然，在这里也形成了微生物的小世界。

看到这些小老树，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我们的绿化合作事业

^① 蘖：泛指植物由茎的基部长出的分枝。——译注



P67 图： 小老树。从 50 年代开始种植的小叶杨虽然由于缺水长不高，但是落叶肥沃了土地。

如果像改良品种的杨树那样茁壮生长，当然再好不过，但是即使长成像小老树那样，哪怕是肥沃一下土地，不也可以吗？在历史的长河中，把被破坏了的自然恢复起来，也许要反复经历这样的过程。

在我讲述和撰写小老树的过程中，大同的合作伙伴们开始说我是“小老树主义”。

我说：“我可不想死在这里。如果死了，就在那儿给我挖个坑埋了，然后捡块小石头，写上‘小老树化作一抔黄土’几个字就行了。”

“别说这种丧气话！”他们赶紧把话打住。

我最初是想围绕小老树写篇调查报告，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信仰

自白”。但是，我的那种想法在以后逐渐有了转变。

全国模范试点的悲剧

由于这里是北京的水源地和沙尘袭击北京的风口，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不久，桑干河流域掀起了大面积的绿化运动，以前只说是“大面积”，实际几乎包括整个桑干河流域县面积的 25%，各有 3 万到 6 万公顷。据说由于育苗跟不上，就剪小叶杨的树枝直接插到土里。尽管中国采取惯用的人海战术，这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树在开始阶段还长得不错。在 60 年代被誉为“南有湛江，北有雁北”，成为了全国的模范试点。所谓雁北，是指长城雁门关以北、大同周边地区。湛江是海南岛对岸广东省最南部的县（现在改为市）。

绿化是不划算的工作。不好的结果马上就显现出来，而得出让人放心的好结果，则需要等待好长时间。小老树就是典型的例子。

树小的时候用水量不大，因此成长顺利。等树长大了，胃口也大了，就把根伸到邻居那里，开始争水喝了。在这种状态下如遇到旱灾，树干的顶端就会枯死。但因为下面还活着，所以树枝就会变成新树干继续长。这种情况在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树木出现畸形，变得七扭八歪。体弱多病时，天牛会乘虚而入，弄得树木满身疮痍。

种植过小老树的人，最年轻的现在也五十多岁了。在小老树林里，经常为我们开车的司机马瑞告诉我们，他刚满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参加过种树。“开始时树长得很好，我们别提多高兴了，比现在的树又高又壮。结果以后越来越萎缩了。”

“绿色地球网络”的顾问远田宏先生是日本东北大学的植物园长，每年在大同逗留 80 多天，一直继续着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他伐下几棵小老树，剖析了年轮。显示的结果和老马说的一致，最初十几年长得很好，但以后就停止了。可是直径略有增加，并没有萎缩，

只不过植树人感觉好像萎缩了而已。

如果对后世有用，即使成为小老树也未尝不可。我想得很简单，可是当事人会感到失望，心理受到创伤。既然要干，就必须成功。在日本，对国际合作活动做评价时，往往说是“非常艰苦的工作”，因此在业界之间基本形成了一个不言的共识：对成功的案例多少添油加醋，失败的案例则为无功有苦。

但是，大同当地的合作伙伴则会受到责难：“人家大老远地从日本赶来支援，你们怎么一个也搞不好呢！”

我开始对自己的天真想法进行反思了。

“我要上学！”

1993年的秋天，我第二次访问了灵丘县。陪我同行的是共青团大同市委副书记刘怀光。他说：“因为希望工程的工作关系，我要去贫困地区的小学校视察。”我当然不愿错过这个大好机会。

前往的对象是上寨镇下寨北村。这是一座100户人家、不到400人的小村庄。这一带地处太行山脉腹地，水的条件虽然比较好，但是耕地很少。听说每人年均收入230元。

访问小学校时，不禁让我大为震惊。校舍破极了。也许是房椽子寿数已尽，房顶像波浪一样上下起伏。房瓦到处豁牙漏齿，纸糊的窗户已经褪色，千疮百孔。这里冬天很冷，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

走进教室，房顶上只吊着一只灯泡，光线昏暗。前面的墙壁上涂着黑墨，算是黑板。一年级到三年级，有40人左右的学生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只有一个老师。隔壁是“学前班”，有十几个儿童坐在小椅子上。

我从1992年开始往来这块土地，那年秋天在大同逗留了两个多月。浑源县林业局长温增玉领我坐着红色的森林消防车转过好多村

落。虽然走访了好多贫困村，但还没有见到如此贫穷的村落。

这时候我还很单纯，遇事怯场，怎么也不好意思把镜头对准教室里的孩子。最后掖着藏着，总算拍了两张学校的外景。我把穷看成是丢人的这种心态在这里体现了出来。其实我也没资格说大话。

我们走进村子。本来是上课时间，可是见到了小孩儿，其中也有背着妹妹、领着弟弟的女孩儿。

“你为什么不去上学？是不想上学吗？”我问。

孩子望着我，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了。



图：村里的小学校。气温达到零下 20 多摄氏度，可是纸糊的窗户破烂不堪。（灵丘县，1993 年 10 月）

“想去。”有的孩子只说了这一句，就一溜烟儿地跑走了。本来

不问也知道原因，我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每个村庄基本都有低年级的小学校，而接收高年级的小学校大多只有规模较大的村庄才有。低年级的教师一般由村里只有高中学历的人担任（这种情况比较多），但是高年级就比较难了，主要原因是师资得不到保证。

到其他村的学校上学也行，距离远的可以在校寄宿。如果这样，衣服必须要穿像样的，还要准备吃的，加上学费的负担，开销不小。

在日本，孩子过了 25 岁还依靠父母抚养的例子屡见不鲜，而这里到了 10 岁就成了劳动力。家人说：“上什么学，给我在家待着干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村，能上完小学六年级，已经很难了。

失学儿童中，女孩儿居多。从村里的土墙上写着“不要娶文盲”的宣传口号，这一事实也可以得到证实。这种现象剥夺了农村女性的自立机会，甚至成为了孩子多的原因。这也是恶性循环。

常常陪我喝酒的刘怀光，惟有那天晚上对我说：“对不起，今天我没心思喝酒。”

那天晚上，我也滴酒未沾。

为小学校建果树园

创建“绿色地球网络”的成员说来大多都是理想主义者，认为“虽然人类在 21 世纪面临最大课题是地球环境问题和南北问题，但是地球环境问题是变相的南北问题，因此这两个问题只能同时解决”。我也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尽管如此，在面对在下寨北村目睹的远远超出想像的贫穷时，我吓得连照相机的镜头都不敢正对。我们成立组织的宗旨虽然是改善环境、恢复森林，但对贫穷所带来的问题难道不能有点作为吗？那天晚上，我躺在招待所的硬板床上翻来覆去，苦思冥想。

我想到了通过为小学校建设果树园得到收益来支援教育的主意，这样一来可以长期提供资金。第二天早晨，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刘怀光和县共青团的干部，马上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说：“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好主意呢？”绿化归绿化，教育归教育，这种条条领导模式不仅反映在行政机构的组织方面，而且也影响到了思维方式。我决心一定要实现这个计划。

这个时期，我们“绿色地球网络”正处于资金拮据状态。第一年勉强支撑过去了，但是第二年（1993年）集资未能如愿。有的人打退堂鼓了。由此我愈加意识到，做一项事业开始往往很容易，但维持下去可就困难了。

当我们向刚成立的环境事业团的地球环境基金申请赞助时，对方提出了疑问：“建果树园种杏树和保护环境有什么关系呢？”我整理了1992年和1993年在农村的体验和感受，答道：“该地区的问题在于环境的破坏和贫困有着恶性循环的关系，农村不能自立，环境也不会得到改善。”正是他们提出的这个疑问，给了我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机会。

那以后不久，地球环境基金部的加藤久和部长来到当地视察，不仅对我们的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还决定追加赞助资金。我们用这笔钱购置了汽车，保证了我们在当地活动的交通工具。在东京举行的研讨会结束后，我和加藤部长在一起时又提起了这个这话题。

“你们以前问我种杏树和环保有什么关系。”

“经过那次视察，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毕业了。”

真让人高兴。

在当地却发生了问题。“刘怀光副书记受到了批评，说为什么领外国人高见去看那么穷的村子。”这个小道消息也传到了我的耳朵。

另外，尽管市和县的共青团都积极地支援这个计划，可是遭到了村里长老们的反对。

“我们再怎么穷，再怎么苦，也犯不上要日本人的施舍。”

日本军队曾经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灾难。对于这些人来说，惟有对日本的仇恨和把日本赶走的骄傲，是他们有生之年的精神支柱。我的提案实在过于天真了。

1994年春天，我们绿色网络植树团抵达大同后，马上接到通知，希望我们去参加下寨北村小学校果树园的开工仪式。我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临时变更的日程让人感到高兴，但是害得大家在逗留的10天里没冲上一次淋浴，就直接回北京了。



图：建设第一个小学校果树园。全村男女老少都来种树，好像过节一样热闹。（灵丘县，1994年4月）

那次种树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了。学生中井美和子加入锣鼓队，张着大嘴一边笑，一边敲鼓。做事一本正经的岛田光雄看到树坑里有石块，就下意识地伸手把它捡出来。还有富泽兄弟。刚刚认识的竹中隆尽管是初次来中国，但东奔西跑到处张罗。他们大多数在以后成为了绿色地球网络的骨干会员。

村里的孩子们无论是分树苗，还是给种好的树苗浇水，都干得非常认真。大点儿的孩子用桶和脸盆运水，连走路还不稳的小不点儿都拿着小水杯打水给树浇水。从北京赶来的翻译王黎杰一边用扁担挑水，一边不无得意地说：“这活儿我在干校干过。”

留着胡子的老人们坐在周围有说有笑地观看着。多好啊！后来知道，果树园开工是县里青年们努力的结果。听说为说服村里人，他们在此驻扎了两个多星期。

村里最后得出结论：“时代变了，作为和平与友好的象征，接受果树园。”并说：“很难有机会一次得到这么多钱，如果分给各家吃掉喝掉，这钱就糟蹋了。我们要把钱用在有利于将来的事情上。”村里把我们准备的劳务费统一管理起来，计划用它翻盖小学校舍。9月，贴着瓷砖的漂亮校舍盖好了。速度真快！孩子们再也不会挨冻了。另外，上寨南村的供水设备也做好了。

一份资金一旦在村里盘活，就会带来一系列的效应。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合作活动的原型诞生了。

建造防护林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和风沙，是以长期利益为目的的项目，等待结果出来最低需要 20 年的时间。而种植果树，对农民来说是中期利益的项目，如果顺利，四五年就会看到成果。至于小学校和供水设备的建设是短期利益项目。我开始认识到：把长期、中期、短期的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十分重要。

用购物袋装钱捆

“绿色地球网络”的事业在初期之所以得以迅速扩大，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汇率的变化。合作活动开始时期的 1992 年的汇率为 1 元人民币=26 日元。那以后，日元汇率开始迅速升高。

中国的通货单位是“元”，发音为“yuan”，用原来的繁体字是“圓”，但现在都用同音的“元”字来表示。日本原来也使用“圓”字，但现在使用“円”。在中国汉字里没有“円”字。如果将刚才 1 元=26 日元的汇率换成繁体字表示，就变成了“1 圓=26 圓”，让人不知所措。但是在日本，日元用“円”、人民币用“元”来表示是可以通行的。

还有更让人容易产生混乱的事情。那时中国的货币实行可和外汇兑换的“外汇兑换券”和通常的人民币（RMB）的双轨制。因为用人民币不能兑换外币，所以搞项目和想去外国旅行需要外汇的中国人便想方设法弄到外汇兑换券。用外汇兑换券还有可以在友谊商店和其他商店购买进口商品的好处。

因此，黑市也随之出现。在大城市，外汇黑市很是红火，看见外国人就尾追过来，压低嗓音说：“换钱，change money。”高的时候甚至可以换到正规价的一倍。也就是说，正规价 26 日元换 1 元人民币，而黑市价 13 日元就可以换到 1 元。

但是，黑市是违法的，而且伴有风险。听说有的钱捆只有上面一张是真钱，其他都用旧报纸假冒的。我的朋友在街头换钱时被公安抓住，钱也被没收了。虽然个人换点儿零用钱还无所谓，但拿公款却不能冒此风险。

由于外汇紧缺，国家出于想从国民手中筹集外汇的目的，实行了只对中国人的特别汇率，在银行的窗口而不是黑市用美元可以兑换人民币。但是，此法在大同却不通用。

我从日本带来的这些钱是人们善意捐赠的，所以还是想方设法更有效地利用它。在农村种树是不需要什么外汇兑换券的，所以我把美

元的旅行支票交给中国的朋友换成美元现金，再换成人民币，虽然麻烦，但到手的人民币基本多出一倍。换钱打的是“擦边球”，不算违法。

可是，用购物袋装满的百元面额钱捆怎么才能运到大同呢？这让我犯难了。我给日本大使馆打电话咨询，大使馆回答说：“通过银行汇款，手续费很贵，而且容易发生纠纷，自己带钱走又有风险，所以你就得权衡利弊，自己决定哪种方式吧。”

既然如此，那我就决定自己带钱走了。

我把此事一说，在北京经常关照我的一位女士就说：“那太危险了。特别是软卧，更危险。如果你主意已定，就把这家伙儿带上。”说着，拿出一把刀来。刀很漂亮，是她在少数民族地区买的。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可不愿意为钱把命都搭进去。”我拒绝了。

最后还是通过关系，让某大学的会计帮助从他们的账户划到大同的账户上去了。我施了小恩小惠，给了那个会计一点儿感谢费。第二年废止了外汇兑换券制度，一律变成了1元=13日元左右的汇率。经过两年汇率就高出了一倍。那以后日元汇率继续攀升，甚至到了1元=10日元，1美元=80日元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项目就好操作多了。

相反，遇上日元贬值时日子很不好过。本来计划的资金觉得已经筹集到位，可是一经换算，损耗了不少。一年中贬值到30%的时候，我们的日子真是难熬。

我们也尝试了从日本给大同的银行汇款。可是通过大同市青年联合会的银行账户，银行限制只能一天取1000元。这就派不上用场了。我又试着在中国的银行开设了自己的账户，让人把钱从日本汇过来。因为汇款需要银行的英文名称，我一问银行柜台，回答说：“不知道，你自己翻译好了。”好在银行的胶皮戳上有英文标记，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过了 10 天左右，我去了银行。营业员说：“钱倒是汇来了，可是日本的银行把密码弄错了，现在正在确认，几天内不能提现金。”

“那好，请你把事情经过给我写个证明，回国后要让日本银行赔我损失。”我给对方来了个下马威。

“不不，弄错密码的是中国的银行。”营业员改口了。结果，那天还是没能提出汇款。

过了几天，我又去了银行。这回说提现金要收手续费。本来在开设账户的时候告诉我不收手续费，现在取钱了，怎么又说要手续费了呢？

同行的青年联合会的常健民大喝一声：“不行！”常健民在体育大学学过武术，块儿很大，体重有 120 多公斤。银行方面马上转变态度，又改口说不要手续费了。

“怎么样，有我在，你没亏吧。”常健民很是得意。可是这种吃软怕硬说变就变的银行也叫人不放心。看来这条路也难行通。

以后那几年，我都采用旅行支票方式。因为听说用美元兑换合算，所以就采用美元。因为有时金额将近 1000 万日元，即使面额 100 美元的支票，也要在银行窗口签上几百张自己的名字，一签就是整整半天。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了，银行汇款开始让人放心了。现在有时候第二天汇款就能到。回过头来看，中国变化确实很大。我们初期遇到的种种困难，对现在的新人来说好像是天方夜谭。

搞试点

凡是走访过大同县徐疃乡的人，几乎都会感受到它的吸引力。第一个吸引力是地理位置重要。该乡地处朝北的斜坡地，有 12 个村庄。背后是东西走向的龙首山，南邻浑源县境。北侧是拦住桑干河的册田



图：12 公里之间有 48 条大小沟谷，最里边是相当于北京水源的册田水库。（大同县徐疇乡，1993 年 10 月）

水库。连接水库的东西长约 12 公里，龙首山和册田水库之间相距有 3~4 公里。

土壤受到侵蚀的情况很严重。每当下雨，龙首山下来的泥石流就要流进册田水库。听说册田水库建成后仅 3 年，贮水量就减到了计划的一半，因为被泥石流淤填了不少，其中包括来自上游的泥沙。据说桑干河的水 1 立方米含 44 公斤的泥沙，想起来也在情理之中。

登上后山远眺册田水库，被侵蚀的沟谷，好像两手十指交叉纵横重叠在一起。当地人把沟谷叫做“沟”。仅大的沟谷就有 48 条。

桑干河向东流，经河北省入官厅水库。从官厅水库开始，下游改称为永定河。永定河流向北京西南郊外，在那里有驰名中外的卢沟桥。这座被马可波罗誉为世界最美丽的桥，成为了日中战争的发源地。

永定河在天津附近与海河交汇流入渤海。所以说，桑干河是北京和天津的水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这个乡搞绿化的意义当然不言而喻。从日本来的绿化植树团对活动的意义也应该十分理解。

第二个有吸引力的因素是这个乡的干部。第一把手党委书记李子明是个豁达开朗、精明能干的男子汉。1989年和1991年，这里发生了地震（因横跨大同和阳高两县，故称“太阳地震”），土窑洞全部倒塌。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为了重建村庄，李子明被选派到了这里。

1992年和1993年的秋天，我在这个乡里逗留了半个多月，其他季节也走访过这里。如此集中走访村庄，在以后也没有过。在那期间，几乎每天和李子明在一起。当然有机会对他进行仔细观察。

我在担心，这个人实在太有能力了。像他这样的干部在农村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速度，农民能跟得上吗？我心中有一丝不安。他在家在大同市内，周一到周五他到这里单身赴任，住在乡政府里，因为不习惯火炕，把床架在火炕上睡觉。对这事我也是有些担心。

这种担心没过多久就云消雾散了。因为乡里的变化非常明显。最初的感觉是变得清洁了，变得明亮了。乡政府的厕所大都粪便起楼子（一想就直犯恶心），可是这个乡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道路也在逐步改观。

乡里人对李子明的表情也都变得亲切了。我和他走访各村，受到款待的机会也多起来了。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有人见到他，说：“明天我家杀狗，你一定得来呀。”我厚着脸皮跟着他真到了那家，对方忙说：“哟，你看我把日子给记差了。今天先吃这个，等明天再来。”给我们的是柴火上烤毛豆，我们一边吹气一边吃。

我考虑把这个乡做成试点。大同市青年联合会的干部也有此意。

我们决定从并不充裕的现有资金中拿出大部分资金集中投入该乡。这个乡很整洁，人口约有 5000。这也可以说是我考虑的第三个理由。虽然现在还很贫困，如果用活这笔钱，即使规模不大，也可以在短期内奏效。



图：在徐疃乡种植了 6 万棵杏树。绿化植树团在纪念碑前合影。这片果园在两年后全军覆没。（大同县，1994 年 4 月）

1994 年春天，我们在 1200 亩地上种了 6 万棵杏树。我们绿化植树团也参加了这项活动。打头的是李子明。他那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些害羞的笑脸，至今难忘。他挖好有些过大的树坑，填上堆肥，种上树苗，然后浇满水。在根茎部往上留出 1 米左右剪掉树苗顶端，然后在断面上涂上防腐剂。为防止干燥，再用塑料薄膜把根包上。如此细致

地种树，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种细致的作风自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破灭的梦

1994 年是一个少见的好年头。从春天开始雨水就多，农作物长势喜人。在徐疃乡种植的杏树也长势良好，成活率接近 90%。在一排排杏树之间还种了谷子、黍子、黄豆，杏树好像不服输似地冒出新枝。1995 年春天，我们又扩大了杏树的种植面积，对枯死的树苗进行了补种。

1995 年夏天访问该乡时，杏树的长势超过了我们的预想。大部分有一人多高。杏树地里到处竖立着纪念碑。党委书记李子明的笑声很有个性，他说：“有的杏树春天都开花了。尽管让杏树早结果会造成树苗发育不良，但我还是想让一些杏树明年就结果，这样会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好让他们有个盼头儿。”

他说这话有它的意义。这个乡的农民几乎没有栽培果树的经验。政府虽然号召种植杏树，但是能不能成功没有把握。同时，因为种植杏树，必然造成耕地的减少。如果让他们看到杏树真的结果了，农民们就会信心倍增。李子明的这种心情，我也深有同感。

1995 年春天，我们在大同市南郊区平旺乡开始建设环境林中心。由于 1996 年春天开始了育苗工作，因此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环境林中心。1996 年夏天，我时隔很久来到了徐疃乡。远田先生和摄影家桥本先生也与我同行，同时随行的还有翻译王萍、司机张德。

在去乡政府的路上，我就感觉出有些不对劲儿。我让车停下，走进杏树地里，一下子全懵了。用“全军覆没”形容也不为过。远田和桥本说：“这也太过分了，几乎都没活。必须得找出原因来。”桥本因为前年夏天第一次来大同时访问过徐疃乡，亲眼目睹杏树发育良好，

所以更感震惊。

听了徐瞳乡干部的介绍，不免更为震惊。头一次见面的新任党委书记说什么“杏树长势很好，准备在明年继续扩大种植面积。”看着远田和桥本瞪着我的目光，好像斥责“你都干了些什么！”让人感到钻心地疼痛。我以前尽量避免和中方发生冲突，可是这次，我实在忍不住了。

“杏树的成活率有多少，你们掌握吗？”我问。

“1995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因此出现了一些杏树枯死现象。即使如此，成活率也保证有70%。”党委书记答道。看到我们脸色不对，乡长又补充说：“即使达不到70%，起码也有60%。”这位乡长在去年担任县共青团委书记，是绿化合作活动的负责人。

我终于忍不住了，一脚把椅子踹翻。“跟你们说这些废话没用。我们走！”

脾气是发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此时此刻，我全然没有考虑。

可是，翻译王萍一边笑着一边翻译着我的气话。过后我对王萍也非常气恼。乡干部虽然见我气势汹汹，但听了王萍的翻译可能也就放心了。

“既然你们这么说，不妨咱们到现场去看看怎样？”

见到党委书记如此信誓旦旦，不禁使我更加震惊。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成活率有百分之六七十，而我看走眼了，那可真该烧高香了。

我们选择了看上去长得最好的一块地来检查，把成活的和枯死的树苗一棵一棵地数出来。我一说“这棵不行”，“这棵也不行”，他们就说“这棵没问题，你看，叶子还绿着呢，说明还活着”。远田来到我们中间，说：“别看有叶，但因为没有形成明春的新芽，和枯死没什么两样儿。”听远田这么一说，他们也就不吭声了。结果，成活率不足10%。

我感觉自己的脚没有踩在地上，软绵绵的。乡干部强调的那些理

由，好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回响着。几年来的努力就这样地泡汤了。梦，我的梦，破灭了。也许是不应该有的梦。我强忍着，说：“把活着的树苗集中到一块地种上，其他的地就退给农民吧。”

6万棵的杏树转眼之间就全军覆没了，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是野兔。从冬天到开春之间，树苗的树皮被野兔啃了。特别是在开春之前，灾害更为严重。到了冬天，树木落叶，草地干枯，能保持绿色的树种仅有针叶树的松树和桧树。开春时节，动物干脆没什么可吃的东西了。

在日本，受害的树木基本上是直径1厘米左右的小树苗。好像被刀切似的，断得很干脆。再大一点儿的树基本上就能保住了。可是在大同，直径7~8厘米的树照样儿受害。树皮一旦被转圈啃掉，树苗就只有等死了。在徐疃乡，树木半数以上遭到野兔侵食。因为面积大、树苗多，马上难以找到有效措施。

我在1992年访问这个乡的时候，党委书记李子明就找我商量：“这个地方的野兔、野鼠很厉害，有没有什么办法对付。”我看到长成1米高的松树苗被野鼠连根啃掉枯死。

这个乡面临水库，还有放牧的羊，因此不好投用毒药，下套的方法又不切实际。在日本也探讨了对策，可是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无可奈何，只好回答他：“没办法，只好把野兔的那份儿种出来，把野鼠的那份儿也种出来吧。”

这是没有认识到灾情严重性的不负责任的说辞。

到了夏天，这里发生了蚜虫害。由于暖冬和持续干旱，虫害很严重。到底是大陆的蚜虫，比日本的个儿大许多。一沾上这家伙，就会影响嫩苗形成冬芽。

乡干部说：“撒了农药也不见效。”我半信半疑，但也许是真的。有人亲身体会撒后无效的农药，我也曾看到报纸报道“农妇欲喝农药自杀，结果平安无事”。因为农药是假的。

尽管如此，把一切都归罪于野兔和蚜虫未免对它们有些冤枉。最重要的还是人。对工作那么热中投入的李子明在 1995 年被调到了其他乡工作，新书记走马上任。如果李子明还在这里，他会想方设法采取防护措施（前年就是这样）。可是，新书记没有采取什么对策。如果树苗生长无恙，新书记也可能会积极地采取对策，结果见到树苗经过一冬有一半被野兔啃掉，所以泄气了，加之此时又发生了蚜虫灾害。



图：李子明说，已经长成 1 米多的松树苗根被野鼠侵食后干枯了。（大同县，1993 年 10 月）

假树苗掺杂进来使问题愈发复杂化。在苗圃，是先播种培育砧木^①，

^① 砧木：嫁接植物时把接穗接在另一个植物体上的植物体。——译注

然后把优良品种嫁接上去培育成果树苗。根系在遗传基因上可以多种多样，而地上部分是克隆出来的。可是，嫁接树木的成活率顶多70%到80%。有人在失败后，偷偷把砧木上长出来的芽卖掉。农民称之为假苗。在长出叶之前，没有经验的农民是很难分辨真假的。我连有假苗这回事都不知道。假苗即使以后长大，果实也很小，而且又苦又涩，毫无价值。农民舍弃它实属无奈。

对农家来说，栽培果树，首先意味着减少了粮食生产。具有出类拔萃领导能力的李子明虽然接过了项目，但是后任却没有继承的能力。其他村子有的农民甚至拔掉了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杏树。

责任在于推进这个项目的我和合作伙伴。当时的祁学峰所长因为也是长在城市里，对农村的情况不甚了解。人的因素很关键，乡里的主要干部任期两三年就要换岗。而培育树木却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时间跨度长的绿化事业怎么能搞成功呢？

“官僚主义和绿化就好像往树上嫁接竹子，格格不入。”

听我这么一说，便有人反唇相讥：“频繁的人事调动是从日本的公务员制度学来的。”真是那么回事儿吗？

1999年秋天，祁学峰应经团联“日中植树造林合作研讨会”的邀请来到日本，会议结束后到我家小住一晚。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李子明即使留在徐疃乡不动窝儿，你就能保证项目一定会成功吗？”看得出来，祁学峰也一直惦记着此事。

“我想一定会成功的。”我回答。因为南邻的浑源县吴城乡的杏树项目非常成功，徐疃乡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的因素，都比他们更好。

正视失败

从初期的各种失败中，我们学到了很多。比如说，超过当地农民管理能力的项目肯定要失败。开始时从小规模起步，这样好有余力集中管理，待农民积累了经验有了自信心以后，再循序渐进。

但是，当地的干部可不这样认为，他们大都认为规模越大越好，资金越多越好。他们只想大干一场，动员农民齐上阵平整土地和种树。实际上最难的课题反而是种树以后的管理。规模搞得过大，一旦出现问题时就容易陷入被动，管理瘫痪。

从中央来的干部也是同样的思维方式。参观完我们的项目后，就说：干吗把地弄得那么分散，应该把它们集中在整块地上，这样既容易管理，成果也显得突出。当然也不无道理，所以他们要是那样去做，我也不会横加反对。

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经验。这个地方并不具备可行的自然条件。旱灾几乎每年都要发生，然而又不是单一的旱灾，就像马背，一侧是干旱成灾，另一侧是暴雨成患。土质条件复杂，就像花猫身上的花斑，加之人的因素也很复杂。

把每个项目做小，数量做多，也是考虑为了分散风险。在艰苦创业时，如果只死守着一两个项目，绿化事业肯定早就崩溃了。

同时，我们一个一个着手的项目也包含着实验的意义。几个项目上马，其中有成功的，也会有失败的。经过比较，会从中掌握很多学问。

另外，种植果树尽量避免使用耕地，而应利用废弃的耕地、荒山野岭、沟壑谷底等不用的土地。农民对侵害自己利益的事情非常敏感，即使将来有可能带来利益，但是对侵害眼前利益的事情也非常抵触。如果利用荒山种树，即使失败也不吃亏，一旦成功还捡了便宜，所以农民的积极性很高。这种经验也是从各种失败教训中学来的。

话题再回到徐疃乡上来。1999年，日本广播协会（NHK）卫视2频道在我们的配合下，作为系列节目《神秘的地球》之一开始制作《黄

土高原——寻找失去的森林文化》。节目编导柴田昌平说也想采访失败的教训。我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心想，那只有采访徐疇乡了。打上次以后，我一直没再去过徐疇乡。

汽车越走近徐疇乡，我的心情也越不平静。到了乡政府，我非常后悔不该领他们到这里来。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啊，连车也不好下。走在村子里，碰见的都是熟人，面对他们，说什么好呢？

上次和乡干部分手的时候，他们说：“非常希望继续绿化合作项目。失败的部分我们一定用自己的资金把它补回来。”我对他们话已经不再相信了，早有此意，当初也不会把事情搞糟到如此地步。

要使病入膏肓的项目起死回生，谈何容易！其难度远远超过顺利项目的维持，要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要想恢复农民的积极性，也要花费很长时间。我判断，如果照此继续下去，创伤只能越来越大。

但是，这只是和乡干部之间的事，与一般农民没有关系。当时我没做任何解释就走了。今天我到这里来，也不准备做任何解释。

我在现场的地头，对着镜头，述说着失败的经验。看到残留在地里没做田间管理而苦苦挣扎的杏树，不禁一阵悲伤。说着说着，悔恨交加，悲凉之情涌上心头，我失声大哭。摄影师一之濑正史把镜头无情地对准我的脸，紧追不舍。

有的人操作植树项目说是“为了日中友好”，当然无可非议。但即使有好的动机，如果结果不好，又怎么对得起和你朝夕和睦相处过来的村民呢？

日本在世界上也是特别多雨的国家。无论是温度还是其它条件，都是得天独厚。然而，大同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所以，必须要抛弃日本人那种“树只要种上就能活”的常有观念。

尽管回忆徐疇乡的失败对我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经历了那次失败以后，成熟了许多，开始正视困难，从根本上考虑如何

运作了。如果在那里一帆风顺的话，也许会把徐疇乡作为样板，现在还在做着同一件事情。我在后面将谈到，植树项目在条件更加恶劣的浑源县吴城乡取得了圆满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出现挫折。

通过徐疇乡的失败教训，我们多少变得聪明了。那以后的成果都是在那次失败以后产生的。这么一想，我觉得正视失败是非常重要的。

第4章 “出了问题，我负责！”

无论在哪个领域，国际合作成功与否，相处的活动对象，即对合作伙伴的因素至关重要。

我们的合作项目起步时在大同市周边农村地带，呈面包圈形状，有10个县，被称为“雁北地区”。1993年7月，也就是在绿化合作项目开始后的第二年，其中的7个县合并到大同市管辖，变成了现在超大的“大同市”。

大同市青年联合会的人事变动频繁，每次去的时候负责人都发生变化，没有从头到尾一直顶下来的人。从1994年春天开始，负责人由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祁学峰担任。他在城市长大，对农村情况不甚了解。我和他一起走访农村，住在农家。

我看好祁学峰，是因为有过这么一桩事。1994年3月，我们一起去了广灵县平城乡。对祁学峰来讲，那是第一次到农村。我们走访的农村是很普通的一个村庄，我听说在乡北部黄土丘陵有一个环境极其恶劣的贫困村庄。降水量少，干旱至极。我很想亲眼目睹这个村子的现状。

可是，当地的干部不想让一个老外去看那个村子。为了打消我的念头，摆出各种理由，什么路坏了去不了呀，走着去得要半天呀，等等。可能是祁学峰也想去看看，他就说服干部们，结果直到傍晚才算说通。

村里的农家尽是破房子。夜幕降临，天空下着小雪，更觉寒气逼人。从瘦骨嶙嶙的羊儿也可以看出刚刚熬过了饲料匮乏的严冬。

我们走访了一家农户。一对老夫妇和小孙子正在吃晚饭。年轻夫妇在外打工，不在村里。直接放在火炕上的脸盆儿盛着少得可怜的小米粥，还有一个辣酱瓶。

所谓家具，一件没有。在火炕的角落里，堆放着棉絮外露的破棉被。外屋地上水缸旁边堆放着两个麻布袋，里面装着玉米。自家打下来的粮食已经荡然无存，麻包里的玉米是政府发下的救济口粮，必须省吃俭用坚持到今年秋收。



图：这是和祁学峰走访的苑西庄村农户。连续三年的旱灾使家里的粮食荡然无存，只能依靠政府发下的救济口粮。（广灵县，1994年3月）

见到这个情形，我拿起了照相机和摄像机。当地干部马上开始围

攻祁学峰。

“你领外国人到这么穷的村子来，难道还让他照相吗！”

话音一落，祁学峰毫不犹豫地回答：“出了问题，我负责！”

结果，在场的干部也应声附和道：“既然你那么说，那我也负责。”因此，我照相得到了允许。我和不少中国人打过交道，像他这样敢作敢为的人还真少见。

我们走访的这个村子是广灵县平城乡苑西庄村，就是我们以后帮助打了一口水井的村庄。那以后我对祁学峰讲起这段往事时，他说：“那时自己什么都不懂，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并引用了“出生牛犊不怕虎”的谚语。

成立绿色地球网络大同事务所

在合作活动初期，我们曾经说：“要把这项合作活动持续 20 年。”说这话的是石原忠一顾问。我也认为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种植的松树培育到可以间伐带来效益需要 20 年。结果后开始自然更新也需要 20 年。

我要挟祁学峰：“我们已下决心坚持 20 年，你也要负责这个项目 20 年。”我认为，没有一种长期持续下去的思想准备，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机构，最后还是有始无终。我看好祁学峰，为了把他留下，所以提议成立专门的事务所，由他出任所长。

青年联合会的母体是共产主义共青团，是党和政府的预备梯队。大同市青年联合会的主席是大同市团委书记，过了 35 岁就要毕业离任，就任下属县的县长等职务。我也知道要想长期留住祁学峰这样的人才，并不现实。

我讲了下面的那些话来说服祁学峰。大多中国人对历史感兴趣，只要稍微了解历史的中国人恐怕都会知道灵丘县的平型关。卢沟桥事

变爆发以后，日军开始扫荡山西，占领了大同，然后南下进攻。林彪率领八路军在这个平型关伏击日军，歼灭了板垣师团。这场战役是开战以来中方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图：在苑西庄村打井后，我和祁学峰在纪念碑前合影。我们俩像兄弟一样从事着绿化事业。（广灵县，1998年6月）

60年代初，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在平型关建立了十分漂亮的纪念馆。可是随着林彪的倒台，纪念馆也遭到了破坏。在我1993年访问这里的时候，陈列的文物都已被撤走，窗户玻璃千疮百孔，成为废墟。纪念馆不允许我拍照，也不让我在日本发表所见所闻。在1995年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纪念馆重新得到修缮，可是我还没有

看到。

当初为了配合纪念馆的建设，在纪念馆周围的山上栽种了松树。30年过去，已是绿树成荫，种子飞散，开始自然更新。

“至于你，今后无论朝着哪个方向发展，都会步步登高。可是，尽管那个纪念馆已经成为废墟，但是周围的松树依然绿色满山。绿化的工作枯燥乏味，年轻人不会对它感兴趣，但是你要深知它的意义。”

那以后不久，“绿色地球网络大同事务所”成立了。名称是中方根据我们的名称起的，祁学峰就任了所长。

我的那番话肯定会留在他的印象里。几年过后，我想让另外一位女士接任此项工作时，祁学峰笑着说：“怎么，又想来次平型关教育吧。”

可惜，福无双至，无奈胳膊扭不过大腿。据祁学峰讲：“庙太小了，招不来和尚。”那位女士不久就被调到城区任副区长去了。但是至今，她也是最理解绿化事业的人之一。

女干部

我的年龄已到50多岁，迄今和女性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却很长，在中国活动期间亦是如此。这些女性大多非常优秀，而且能力出类拔萃。对女性没有偏见，是我的至福。

我时常感到中国的女性在社会的舞台上比日本的女性活跃。可是，这只是在城市，而农村的情况就大相径庭了。

首先，女干部数量很少。虽然副县长级和乡镇的干部也不是没有，但为数不多。而且一把手都是男性，女性一般担任副职。共青团的县委，在常任的干部中，女性比例很小。

绿化活动开始时，好多事情弄不懂。经过两三年后多少有些明白过来了。在共青团的干部中，有的人毫无能力，热衷的只是拉关系，

找门路。具体说是打扑克，搓麻将，对领导阿谀奉承。

我觉得这种活法也未尝不可。可是，这样的人担任干部可就难办了。还有的人是因为父母是干部。虽然干部子弟不是不可以当干部，但是让毫无能力的人担任干部，是他本人的不幸，对普通百姓更是不幸。

女干部虽然很少，但是干事让人放心。

我的看法也许不全面，但实际情况并不离谱。

那是 1994 年夏天的事。我们召集各区、县的共青团干部在浑源县开会，我在会上也做了发言，开头泛泛地谈了一下总体情况，然后切入了所谓正题。

“世界无论哪个国家的女性，对环境问题都抱有更大的热情。我们这项绿化事业如果没有女性参加，就不会有发展。可是在大同，共青团里女干部却很少，如此下去，工作不可能顺利进行。我给大家留出两年时间，到期还没有女干部的区县，我们就想断绝和他们的合作关系。这并不是干涉内政，我们也应该有选择朋友的权利。怎么样？”

话音刚落，就听有人在会场中央大叫：“同意！”她是南郊区的徐尚红，是今天与会的 4 个区 7 个县中惟一的一位女团委书记。这并不是我们事先预谋好的。我趁热打铁：“因为有人积极赞成，那么就把它作为本次会议的决议。”

徐尚红现在是城区的副区长。我的说服工作没有成功，就是指她。

几乎所有县的共青团在一年内都任用了女干部。但这并不是因为我的提议，而是势在必行。总之，感觉挺爽。

但是，浑源县进展不顺。浑源县是合作活动起步时期设立的点。1992 年秋天，我走访农村时同行的王有全在那以后担任了共青团书记。他真是个好人，好像一尊弥勒佛，总是笑脸相迎，没有丝毫邪念。我跟他说事，他老是满口答应“没问题！”可又总不兑现。当再见到他时，他又会说：“高见，下次一定办到。”

“我不想和老朋友分手再见，女干部的事你可得想想办法。”

我对他这么一说，他一改往常“没问题”的口头禅，现出一副沉重的表情。

“唉，没人才啊。”

“那你就回家看孩子，让你老婆来当共青团书记，保证比你干得强。”我半开玩笑地说。

当王有全兴奋地对我说“浑源县的共青团有女干部了”的时候，已是两年多以后的事情了。

1996年，我们在已经初具规模的环境林中心会议室，召开了各区、县共青团的代表联席会议。我尝到了上次会议的甜头，便开玩笑说：“今后凡是没有女性担任副书记以上职务的县，我们准备和它断绝关系。”

一听这话，共青团大同市委书记郜国华说：“虽然高见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大同市团委没有女副书记。那么我想，把祁学峰撤下来，找位女同志担任副书记，你意如何？”

这个时期没有祁学峰，合作项目还真搞不下去。我一下哑口无言，让郜书记钻了个空子。

中国有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在我们的绿化合作活动中，妇女的作用何止“半边”！为建立环境林中心功不可没的邢雁俐经理、现任大同事务所所长的武春珍、从事护理工作并为我们做翻译的王萍、从北京多次往返大同为合作事业铺路的王黎杰。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大同培养的翻译

1995年春天到大同时，祁学峰领来一个翻译作为候补。如果当地有翻译，工作起来会很方便，但找了一圈也没有理想的翻译。至于

原因，一是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论，再者城里人不愿意去农村。

新来的翻译是位女士，叫王萍。四五年前曾经到日本的埼玉医科大学研修过一年护理业务，现在日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她能行吗？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

初次见面时，她还有些紧张，但是以后经常咯咯咯地笑，一笑，脸蛋儿更圆了。无论看到什么，无论听到什么，总是笑个不停。我一般不喜欢这种人，但她例外。

走访农村是我的工作，因此她也跟我一起下农村。她在大同长大，迄今没有下过农村。

“高见，真没想到，这小姑娘比我女儿大，可是怎么长得这么小呢？农村和城市比，好像能差两三岁。什么原因呢？”

她不问村里的小朋友，却来问我。

山镇县李二烟村是我们绿化项目中自然条件最差的村子之一。尽管如此，村民们无不得意，说：“这个村的泉水无论怎么天旱，从来没有枯过。”不知情者会以为这里是多么好的地方，实际上所说的泉水是沟底涌出来的水。看到像抹布拧出来的脏水的颜色，王萍问我：“这、这水能喝吗？”

每当此时，我总说：“这种事以后别问我！你的工作是干什么的？”

王萍的本职工作是传染病医院的护士。现在提升了，担任管理150人的护士长。

王萍说她回到医院讲起这些农村见闻时，医生和护士们全然不信。距大同市区仅离10公里的地方，这样的农村比比皆是，清楚地显示了城市和农村的距离和关系。

就是这个王萍，当1996年夏天，我到面对徐疃乡6万株的杏树全军覆没！而与乡里的干部发火时，我气得一脚把椅子踹翻：“跟你说这些废话没用。我们走！”王萍却一边笑着，一边翻译，因此对王萍很气恼。

“你这么个翻法，根本传递不了我的意图。”

“可是我把你的话忠实地转达给他们了呀。”

“可我在这里生气，你在那里却笑呵呵地翻译……”

“你说你生气，可看你那样子特逗。我头一次见你这样。”说着说着，又笑起来了

你说，这架还能打得起来？



图：翻译王萍。她回到医院讲起农村见闻，谁都不信。右边是远田宏顾问。（大同县，1996年8月 桥本紘二摄影）

也许这样的效果反而不错。有王萍做翻译，我无论说什么，最后都不会动真格打起架来。在这样反复过程中，王萍的翻译水平提高了。当我们现任代表立花吉茂、远田宏走访各处现场时，她都陪同做翻译。

她非常投入，掌握了许多有关植物的词汇，翻译也大有长进。

当然，她也有犯糊涂的地方。我们在一起活动都过了两年了，有一次看见我签字，她说“你的名字原来这么写呀！”她原来以为的是哪两个字呢？也难怪，“高见”在中文里是“见解高明”的意思，无论如何和我联系不到一块儿，倒也不是她的责任。

有一次，我们正在闲聊中央领导的话题，她也参加进来。一起聊天倒也无所谓，可她突然问道：“胡耀邦现在干什么呢？”整个一个犯糊涂。原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早在 1989 年就逝世了。不过，对政治感觉迟钝，也正是她的善良所在。

慰问张家口地震受灾地



图：合作重建张家口附近的小学校。捐建仪式结束后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合影。（张家口市张北县，1998年3月）

我们合作项目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展，是因为有合作伙伴的努力配合。如果认为我去了就会解决问题，我不在办不了事，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所做的事情，我根本代替不了。在中国，人际关系应该如何处理，有着深奥的学问，和他们相比，我等之辈还只是个小学生。

这一点，从“绿色地球网络”大同事务所现任所长武春珍那里就可以感受到。叫她“武所长”，总觉得别扭，不妨还是像平时那样，叫她“小武”好了。和小武在一起工作是从1998年1月开始的。当时的大同事务所所长祁学峰把她调来担任副所长，来前她是共青团的研究室副主任。

大同每当这个季节，即使白天温度也低于零度，不适于在户外活动。趁着人们猫冬时候，我就去做农村调查，这样持续了多年。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刚到天镇县的招待所，房子就开始摇晃起来。地震！而且震源离这里不远！

看了电视报道，知道了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张北县、尚义县之间的县境是震源地。察看地图，离这里只有80公里。我立即决定去受灾地看看，经过转达后，大同事务所答复我：就按高见的想法办！

我真高兴。

翌日清早，他们就给张家口市政府打电话联系，问领外国人去可不可以。

“过后给你们回话，你们在那儿等消息。”

我很着急，通过电话不可能得到许可。如果答复不行，反而被动。我决定干脆先上车，赶往受灾地。

在张北县的路口设有军方检查站。同行的一个人对我说：“高见，你千万不要吱声！”我马上把抱在怀里的录像机藏在座位底下。车子一停，小武就跑了出去，开始和检查站的负责人交涉。跑到外面可能是为了分散对车里的注意力吧。没费什么劲儿，就让我们车通行，而一些外交官和记者们以及其他外国人被从这里撵了回去。

到了县政府，小武又去交涉，半天也没回来。祁学峰为什么不去呢？我感到奇怪。祁学峰漫不经心地回答：“这种事我可是甘拜下风。”

小武终于回来了。她报告说：“最开始见到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说明了事由之后，他说开始就没有设想外国人来的问题，他定不了。又找到县长去说，也说定不了。见到副市长秘书了，结果也说不敢定。最后见到了市长本人，说明情况后终于同意了，但前提条件是不许照相，不许录像。我寻思，虽然高见可能不满意，可是没有当地人带领进不去现场呀。”

她说：“我在说服市长时说，我知道规定不允许外国人靠近现场。但是，高见已经持续6年往来大同，对农村的情况非常了解。同时，高见又是日本阪神大地震的亲历者，一直参加救灾活动。现在他得知这里发生了地震，马不停蹄地赶到这里，所以请你们考虑一下这种特殊情况。市长听到这种情况，对高见的精神很感动，所以破例同意了。”

我们一起走访了地震受灾地。关于这些情况，因为脱离话题，所以在此不做详述，只想强调一点，解放军为主的抗震救灾人员工作做得紧张有序，而且训练有素。

回到县政府，我把带来的钱拿出一半，6万日元作为赈灾捐款交给了县长，并举行了非常简单的捐款仪式。在此期间，小武找到新华社的记者，并安排了采访。

“我找《人民日报》的记者，但没有找到。”小武说。但我觉得找到新华社更好。

当天，“日本人来到救灾现场慰问，并捐赠了赈灾款”的消息发往世界各国，诸如我说我是NGO（非政府组织）成员，“受害情况并不十分严重，救灾活动组织得力，非常顺利”的谈话也被报道出去。据说有些欧洲国家见到这篇报道后解除了待命状态。过后，我更加意识到了NGO信息的责任之重。

我也因此放心了。不仅得到了市长的许可，而且躲过了军队的哨

卡。虽然对我无所谓，可是他们也许会因此而受到责怪。新华社在地方很有权威性，有了新华社报道的尚方宝剑，地方政府也就不会因此被问责了。

在回大同的路上，小武开口说：“今天见到的那些干部都生怕树叶掉下来打破脑袋。”用日文来表达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暗自窃喜：这人挺有意思。

“高见遇事果断，让人吃惊。”小武说。

我们的这次经历实在难得。前辈樱井尚武读了我那天的日记，说：“这简直可以拍一部电影。”比起风平浪静，在惊涛骇浪中同舟共济，能更加深相互的理解和彼此信赖。

能言善辩的干将

武春珍所长的交涉能力令人叹服。她坚持自己的主张，对对手寸步不让，能言善辩，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最后，交涉的对方大都告饶。

如果是男的，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大功告成后，她莞尔一笑，说声“谢谢！”只有这两个字说得甜甜的。

知道她的伎俩以后，我说：“我现在才算知道，你那时说什么张家口的市长同意去地震受灾地是因为被高见的精神感动了，肯定不是这么回事。人家市长在第一线指挥抗震救灾，正忙得晕头转向，你可倒好，在那儿缠住人家不放，市长无可奈何，只好说‘你这小丫头，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得得，就按你说的，少废话，赶快给我走人！’”

小武一听，说：“绝对没那么回事儿！市长真的是被高见的精神感动了。”

我想，我的推断十有八九是对的。

像小武这样的人，为解决难题时而顶撞上级，很有胆量。可是，面对农民或者部下，用这种方式就容易惹出问题。

这是“富士施乐端数俱乐部”^①的绿化植树团访问浑源县吴城乡时发生的事。植树团分为几个小组在农家吃午饭。可能是吃得高兴了，到了集合时间，一个组都没回来。这时她大发雷霆，冲我发火倒也无所谓，可是她把村干部给损了一顿，说：“毫无时间观念！”

“你不了解农村，农村和城市的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你用城市的标准要求农村是行不通的，而且这样做不好。”

听我这么一说，她矛头马上就冲着我了：“问题不在于是农村还是城市，而是正确不正确。高见袒护错误，这样不好。我是中国人，对农村的事自然了解。”

在祁学峰担任所长期间，即使发生这样的事也不必担心。他对小武很了解，用她时尽量发挥她的长处。祁学峰问我：“怎么样？你觉得武春珍还可以用吧？”我当着她的面，回答：“还不行。小武现在还没有自己的话，尽说面上的套话。”祁学峰接过我的话，说：“你说的我不反对。她还没有自己的经验。”小武听了这话，一句也没有反驳，默不做声。

1998年夏天，一直担任青联副主席的祁学峰开始担任主席职务。在他担任副主席期间还能够专心致志地领导合作项目，但当了主席以后，由于领导范围扩大了许多，所以事务所里的日常工作必须找其他人担任。就这样，原来担任副所长的武春珍接任了所长职务。说心里话，我对她还不上心，而且有这样的想法的不只我一个。有的人甚至说：“要是武春珍当所长，我就不想再干了。”他们并不是直接找我说的这些话，而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我的耳朵。我虽然说不通中国话，但是听力不差，甚至大同的方言也能听懂许多，有时他们之间的谈话

^① 端数：即零头。富士施乐工会会员将工资零头部分作为绿化项目的捐款。——译注

内容我也能听懂。

在同一时期，为创立环境林中心并使中心走上正轨的邢雁俐经理荣升为云冈宾馆的副经理。经过多年的努力好不容易创建的架子面临风雨飘摇的困境。需要多少年才能恢复正常呢？不稳定的状态使我陷入窘境。

只要负起责任，人就能成长

2000年夏天，我和远田先生在房间里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反复说着同一件事。

“小武真让人出乎意料，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进步这么快。”

远田先生好像对此也没有异议。两年前，小武就任所长时，我还有些顾虑。到底什么发生了变化了呢？

1998年1月，我在走访了张家口市张北县的地震受灾地以后回到日本，开始了呼吁救灾活动。当接到会员荣永赖子筹集来的赈灾款时，受其鼓舞，决定重建一所遭受地震而倒塌的小学校。广播和报纸报道了相关内容，在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所需资金。因为国外对这次地震也做了报道，而且阪神大地震过后的时间也不长，所以比较引起人们的关注。

小武负责同当地的联系工作。尽管最后建成了很漂亮的小学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怨言不断，一个劲儿地说“麻烦”，说张北县太保守，动作太迟钝。

“我说小武呀，我们绿化合作当初，大同还不如现在的张北呢。有时甚至不讲道理地通告我们‘再往前禁止拍照，照相机全由我们保管’。”

小武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

但是，像小武这样有话全倒出来，对我们来说很难得，这样我们

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加深相互沟通。小武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正说明她对工作有责任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光说不做的人不是大有人在吗？

我下了决心，要全力以赴支持以武春珍为中心的班子。对大同的绿化活动来说，最重要的是中方的合作人员要踏实可靠。要想使整个机器运转起来，必须要稳定轴心。目前这个轴心只有武春珍，不能出现任何动摇她的因素。

但是，武春珍通过自己的努力打开了局面。她对任何工作都积极肯干，毫不退缩。她的性格决定了在工作中会发生碰撞，一发生碰撞就会注意到出现的问题。如果工作只满足于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那么这个人既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得到成长。

就像以前拽上祁学峰那样，我也带上武春珍到处走。既让她住过贫困农户，也让她登过山，爬过坡。没有去过农村的人，一般来讲都会吃不消的。比她年轻的共青团干部有不少人打了退堂鼓。遇上比较棘手的村庄，项目就让小武出面负责。小武有时虽有牢骚，但从来没有退却过。

时间长了，周围的中方人员对小武的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在小武就任所长时，有人曾说：“当上个芝麻官，有什么可张狂的……”可是现在也都刮目相看了。这从小武工作越来越忙也可见一斑。

虽然中国的变化很大，但是大同一带比较滞后。无论做什么，几乎都要依靠个人关系。工作会都压在有能力的人身上，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人的能力也随之越来越强。能力欠缺的人只完成交给的任务就万事大吉了。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老师经常对我们说：“人一旦意识到整个担子压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会成长。”看到这段时间小武的变化，觉得确实如此。小武以往的那些套话也越来越少了。

大同市委副书记会见时问我：“他们工作得怎么样啊？”我回答：

“还可以。”小武在旁边插嘴道：“人家拼死拼活地干，只说个‘还可以’就完了。在领导面前，你得表扬表扬我们才是。”

“那好，说‘好极了！’行吧。”

小武马上答道：“什么？‘好极了！’你这么说，人家反而不信了。”听了这话，大家哄堂大笑。



P115 图：在环境林中心和中方职员在一起合影。后排右四是祁学峰，其左是魏生学，侯喜。前排中央是武春珍。

祁学峰之后

2001 年，祁学峰离开了共青团的工作，新任职务是南郊区党委

副书记。从 1994 年开始，8 年时间他一直参与绿化事业工作。虽然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项目，但是双方具体负责人之间如果缺乏默契，工作不可能顺利开展。可以说，我和他是非常好的搭档。

1996 年，他在给绿化植树团讲话时说：“自己在刚开始阶段只是作为任务接受下来参加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所以自己开始主动思考怎样去开展这项活动了。现在我把它当作实现自我的事业来对待。”

我也对大家说：“我和他好像亲兄弟。当然我是哥哥，他是弟弟。可是叫人窝心的是，和大多数家庭一样，弟弟都是又聪明、又能干。”

祁学峰生长在大同市，1994 年和我去农村是第一次。那时还没有环境林中心，他和我从这个县跑到那个县，从这个村跑到那个村，每天东奔西走，在农家过了好几天。在城市长大的祁学峰应该比我更感辛苦。过后，他好长时间腰痛缠身。

在四处奔波现场探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越来越接近了。两个人很少废话，大多问题都会当场拍板决定。有时碰到问题同时讲出意见时，翻译王萍说：“你们二位讲的意见完全一样。”我说：“你这翻译当得可够舒服的了。”

为了留住祁学峰，我做了许多工作，背后也使了不少劲儿。团中央的干部说：“听说高见连共青团的人事安排都要插手。”我说：“没有办法呀，我这边儿也是火上房了。”

团中央的干部多次对我说：“高见，你运气真不错，像祁学峰这样的干部，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2001 年末，我见到了祁学峰，此时他已经就任新职务，看样子很忙。据说刚走马上任南郊区副书记，就发生了小煤窑人身伤亡事故。山西省在 9 天内发生了 5 起煤矿事故，一百多人丧生。祁学峰刚赴任就被推上了负责的岗位。

“来此上任前，我认为南郊区是很富有的地方。但是，没想到有

很多难题摆在面前。小煤窑矿工没有土地，全部收入都靠小煤窑，小煤窑一关闭，这些人的生活毫无出路。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我采取当年和高见一起走访农村时一样的办法。刚开始，农民不会对你说真心话。当你坐上农家的炕头，和他们同吃一锅饭、一起喝酒时，他们就会掏出心窝儿里的话。不是这样吗？”

“和那时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了点儿权了。农民的要求并不高。许多问题当场就可以解决。只要打个电话，或者指示秘书就能解决。当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就向他们解释，过后一定研究解决。因此，农民理解我，相信我。在干部队伍中，有的人不去现场，动不动就发号施令，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们无非害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我自己做的事，决不逃避责任。”

“和高见一起走访农村时，现场的问题尽量在现场解决。那时掌握的工作方式，对我来说是财富。”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真高兴。

第 5 章 黄土高原的套盘结构

从黄土高原的名称，你也可以想像，这里是高地，但并不是一马平川。你可以想像这样一幅图景：大盘子里套着中盘子，中盘子里套着小盘子的套盘结构。大同市面积达 14000 平方公里的大盘底是大同盆地，那里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

稍离大同市大盘子中心的地方套有 7 个中盘子，7 个中盘子就是、7 个县。盘底也是盆地，雨都集中在这里，地下水比较丰富。被雨冲下来的泥土集中在这里，土壤肥沃。雨水汇成河流，穿过山脉，向东面的河北省流去。

在黄土高原，水和土决定着人类活动的可能性和限度。盘底的盆地因为水土充足，人口集中，所以经济活动频繁，政治和文化也随之活跃。这类地方就是县城，即县政府的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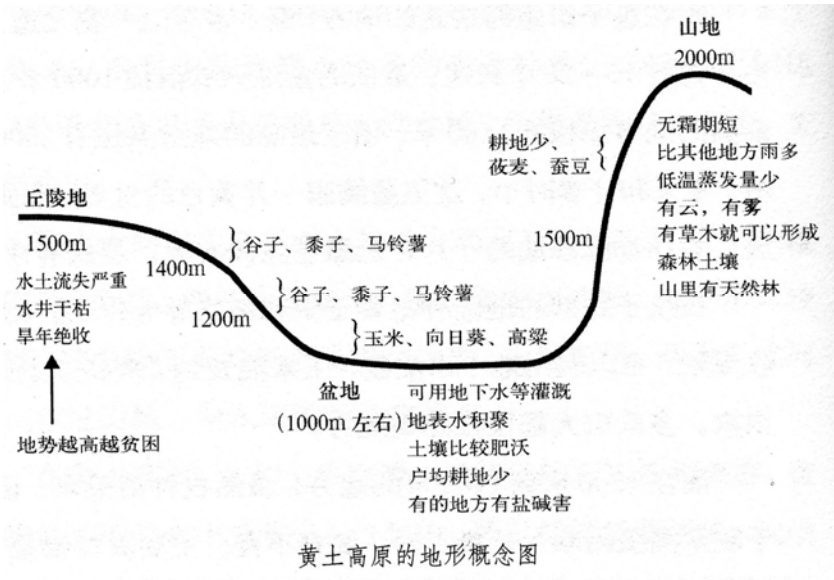
县里还有一套盘子构造。一个县里有下属 15 个至 25 个左右的乡或镇的行政单位，每个乡镇就是一个盘子。一般来讲，只有农业的地方为乡，而人口密度较高，多少有些工商业的地方为镇。镇是盘底，毫无疑问。

处在盘子底部的地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而处于盘子边缘的地方，具体地形就是处于山区和丘陵地带的地方，自然条件较为恶劣。在盘子边缘地区，降下的雨水存不住，瞬间流失，土地也受到侵蚀。盘子边缘海拔高的地区形成乡与乡、县与县的边界。

站在盘子边缘海拔高的地方，整个乡可以一览无余。每个乡下边有 10~20 个村庄。最低的盆地只有海拔 1000 米，丘陵最高的地方海拔有 1500 米，山区最高的地方海拔有 2000 米左右。冬天和开春时节，

这里是满眼一片黄色的世界；而到了夏天，农作物绿油油的一片，那绿色深浅有致，层次有序。

在盘子底部的地区种植着玉米和高粱等农作物，长得高，收成好。可以利用地下水灌溉，玉米能长到2米以上，绿色很浓。乡政府大都设在此类地方。



而在1200米到1400米的地方，虽然也种植玉米，但是由于缺水灌溉困难，长势不好，发育不良。主要农作物是谷子、黍子、马铃薯、黄豆等，个头儿很低，从远处看，绿色浅淡。

到了1400米到1500米的地方，农作物的种类虽然也是谷子、黍子、马铃薯、黄豆等，但长势很糟，绿色极淡。离近看，庄稼的表土很薄。经常由于开春无雨，只好放弃继续耕作。最近因为井水和泉水干涸，很多村子连饮水都很困难。

超过1500米的山地，无霜期不足100天，农作物的种类只限于

攸麦和蚕豆。有书籍记载，这一带以攸麦为主食，实际并非如此，能生长其他农作物的地方就不再种植攸麦了，因为攸麦产量太低。从种植的农作物种类来看，可以反向推算那里的土、水和气象的条件。

我们在天镇县孙家店乡调查过村子的生产状况。该乡共有 11 个村子，粮食产量前三位的村子都是位于盘子底部的村子，是水浇地，1 亩地的产量可以达到 187~345 公斤。人均粮食拥有量为 375~528 公斤。因为成人口粮最低限度平均每人 200 公斤，所以剩余的粮食可以卖掉用来购买副食品和衣物以及住房用品等。

而 1 亩地产量只有 11 公斤到 16 公斤的贫困村有 5 个，遇到干旱之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人均 39 公斤到 79 公斤，远远低于生存所需量的 200 公斤。这个差额需要通过养羊和从事其他副业或外出打工来弥补。有时不得不依靠政府提供的救济粮。

大同市天镇县孙家店乡的基本状况 (1993 年)

村	人口结构				耕地面积			粮食生产			
	户数 (户)	人口 (人)	劳动力 (人)	女劳力 (人) %	整体 (ha)	灌溉 (ha)	10a 户	面积 (ha)	产量 (t)	kg 10a	kg 人
A	423	1749	536	150[28]	367	367	8.7	267	855	320	489
B	545	2186	723	287[40]	396	361	7.3	293	820	280	375
C	122	460	153	39[25]	57	57	4.7	47	243	517	528
D	11	369	107	23[21]	126	58	12.5	100	108	108	293
E	146	512	200	50[25]	173		11.8	157	37	24	72
F	43	158	70	13[19]	77		17.9	63	11	17	70
G	255	953	330	97[29]	260	58	10.2	227	127	56	133
H	202	729	221	57[26]	195	195	9.7	153	137	90	188
I	40	140	55	20[36]	69	7	17.3	61	11	18	79
J	146	624	212	50[24]	240	7	16.4	213	41	19	66
K	63	257	80	24[30]	71		11.3	60	10	17	39
计	2086	8137	2687	810[30]	2031	1110	9.7	1641	2400	146	295

综观天镇县孙家店乡，粮食平均每人为 295 公斤，好像够用，但村与村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此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人均超过 200 公斤的村子都是能够灌溉的地方。实施调查的 1993 年是大旱之年，为了能够躲过早灾，也要想方设法灌溉。

知道了这个差距之后，来参观的人想得很单纯，说把上边的村民转移到下边来不就都解决了吗？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下边的村子户均耕地面积很少。该乡户均只有 7~13 亩地，相反上边贫困村户均有 16.5~27 亩土地。无论哪个村子都维持在仅够生存的临界线上，有的人口超过限度处于饱和状态。所以，转移人口谈何容易。

苦于饮水的高处村子

村子之间的差距除给农作物和产量带来影响之外，在其他方面也有诸多影响。例如，盘子底部比较富裕的村落还可以饲养驴、马、骡子、牛等大牲口用于耕地和运输。

顺便说一下，这个地方即使是很富裕的农村也不使用农业机械。农具顶多是铁锹、不同类型的锄头和耙子，另外还有牛或马拉犁。连日本农家常用的独轮车在这里也从未见过。

几年前，环境林中心从日本引进 5 台独轮车。我以为人们看到很方便，会得到普及，结果毫无反应。从附近农家雇来的临时工虽然很羡慕，但也没有动心。只要花上 100 元钱就能购买，或在铁匠铺可以制作，但是他们嫌贵。运输宁可肩扛麻袋，身背箩筐，或者用驴拉车。

言归正传。位于盘子边缘高处 的贫困村里没有大牲畜。顶多每户饲养几只鸡和几头绵羊或山羊。养猪的农户很少见。也就是说，黄土丘陵的贫困村没有饲养大牲畜的财力，同时解决不了饲料问题。特别是耕地很少的灵丘县等山村把牛随意放养到山上，对环境带来了负面

影响。

农活基本靠人力。可是，盘子边缘的村子户均耕地面积很大，因为产量低，只能靠广种薄收。依靠人力使用笨劣的农具耕作大面积的田地，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

另外，处于盘子边缘的村子饮水也极为困难。几年前的春天，我大学时代的室友干场革治参加绿化合作团来到灵丘县石瓮村。在农家吃午饭的时候，一只刚生下不久的山羊羔儿依偎到他身上让他抱。原来母羊因为没有饲料，连水也喝着，所以拒绝给小羊羔儿喂奶。没有办法，小羊羔儿只好去甜乎干场。干场是秋田县人，在海边长大。他的父亲是邮局局长，在当地颇有威望，为了改善当地农村的生活，



图：望眼欲穿的水终于来了！村里的孩子们轮流喝着杯子里的水。这时我们也破例喝了生水。（广灵县 1998 年 6 月）

他父亲引进山羊，他也帮助照看。他喃喃自语：“日本说穷百姓只有水喝，可是这里连喝水都困难啊。”

黄土丘陵的村子要到谷底的井和泉眼取水，用扁担挑回来。离家远的农家挑着沉重的水桶要经过陡坡，来回要花上3个多小时。遇上雨天，坡陡路滑，摔倒了很危险。冬天更危险，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从桶里溅出来的水马上结冰，踩上去容易滑倒。真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

这样的村子，无论是农耕还是挑水，没有男人是干不了的。农民为什么想要男孩儿，除有传统观念以外，更重要的是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

盘子底部不缺水的村子可以种植季节蔬菜，可是边缘的村子却不能种。无论是白菜、圆白菜之类的叶菜，还是西红柿、茄子之类的果菜，只能花钱买或者用小米和黍子交换。

前面已经讲过，我们帮助灵丘县石瓮村和广灵县苑西庄村这两个村子打了水井，而且都出水了。最明显的变化是，村民们使用水井的水，每户都种了菜园。虽然不大，在房前屋后种上了西红柿、茄子、黄瓜、白菜、圆白菜、芹菜等蔬菜。即使微不足道，但对农民的生活来说，却是很大的变化。

新娘不嫁盘子边缘的人家

1993年秋天，我结束了走访大同农村50天左右的生活，回到日本后，开始吹牛了。

“我对经济虽然是门外汉，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重要法则。钱这家伙爱热闹，越有钱的地方它就越往上凑，越没钱它就越绕着你走。”

以前我所看到的农村差距是由自然条件使然，所以也无可奈何。如果社会能改变这种差距当然最好不过，但实际上社会的关系反而加

大了这种差距。

浑源县二岭村的水井在离村一公里远的沟底。最初打的井有 30 米深，并配有电泵。可是因为水量减少，不能满足村里的需要了。虽然又在稍远的沟底打了一眼新井，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400 人的村子有 300 人缺水。

不够的水要走 5 公里坡路到下韩村去买。一大桶水要 5 元钱。而且有专门负责买水的人家。下韩村海拔 1100 米左右，如果说二岭村是盘子的边缘，那么下韩村就是接近盘底的地方。打井取水浇地。二岭村买的就是这水。

下韩村卖水收钱有它的理由。打井要花费，用水泵要付电费。但是，盘子底部取水和盘子边缘的水井、泉眼干涸难道没有因果关系吗？地下的水脉是相通的。本来下边的村子对高处的村子应该给予补偿的，可是很难从地下取证。一桶水 5 元钱对人均收入只有几百元的村子来说并不便宜。钱这家伙躲避穷村子，往钱多的盘子底部凑。

还有这样的问题。所谓传宗接代祭先祖，指的是男孩子。无论条件多么贫困的村子，最少也要留一个男孩子在村里守祖坟。最近虽然也有全家离村出走的情况，但那实属无奈。

与此对比，女孩子不被列于子孙之列，可以任意出走。出生在穷村的姑娘深知生活的艰苦，所以不愿意嫁到穷村。父母们也愿意让女儿嫁到下边的富裕村。在农村，父母对女婿的呵护超过亲生的儿子，依靠着女婿。女婿住在条件好的村子，如果生活富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还能有个照应。

结果，年轻的姑娘像流水一样，一个劲儿只往低处流，很难有人嫁到盘子边缘的贫困村。有的村子男女比例已经是 120 比 100，过了 40 岁还在打光棍儿的单身汉大有人在。

把水引到高处需要动用水泵，让姑娘从下边嫁到上边的动力则是彩礼。越是贫穷的村子彩礼要得越高。要 1 万元左右彩礼的村子生活

还算过得去，如果要 3 万元彩礼，那个村子的贫苦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在天镇县李二烟村和一位妇女聊天。她说已让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结婚了，我一听，说：“这不正好吗？两个儿子的彩礼可以从两个女儿身上捞回来了。”

听我这话，她马上沉下脸来，好像在说：真是个棒槌！

“什么正好！我想把女儿嫁到好一点的村子，可那样才能得到六七百元的彩礼。我知道这很不公平，但咱村没水，交通又不方便，有什么办法呢？”



图：沟坡上盖着土坯房的李二烟村，是人均年收入 100~200 元的特困村（天镇县，1996 年 8 月）

只要知道彩礼的行情，就可以知道这个村在那一带的贫富程度。

我是走到哪里，打听到哪里。可是在浑源县南山区的村子打听的时候，人家说：“不知道。”因为已有 10 年无人嫁到这个村子了。

同时，结婚还要增盖新房，还要购买家用电器和自行车之类的物品。听说几年前的条件是“三金一冒烟”。所谓“三金”即金项链、金镯子、金戒指，“一冒烟”即摩托车。

这些彩礼只靠农业收入的积累是不可能的，所以年轻的小伙子都出外打工挣钱。大同是产煤之地，过去到煤矿马上就能找到的工作。自从煤炭产业不太景气以后，修路或建筑方面的雇工开始增加。如果是大龄青年，结婚条件就会更加苛刻。所以，不惜向亲戚朋友借钱也要把媳妇娶上。由此可知爱凑热闹的钱是怎样躲避穷村的。

最近，我有时在缺水交通不便的贫困村见到从贵州、四川等南方嫁来的媳妇。听人说村里有少数民族，一打听就是这些人。有人对我说：“近处的姑娘除了要彩礼以外，还要翻盖新房，最低也得需要 3 万元，从南方娶来的媳妇 1 万元就够了。”

一户农家有一位从贵州嫁来的彝族媳妇，我曾经在这家住过。南方人的脸和北方这一带人的脸长得不一样，大多是圆脸大眼睛，一看就知道。孩子长得真是可爱，用“明眸皓齿”形容也不足为过。见媳妇反复说“丈夫是个好人……”，我想应该是个幸福家庭。

曾经连续 5 年来此地走访的摄影家桥本说：“我一把镜头对准她们，村里人就都来护着，把她们藏起来。”遇到这种情况，也许有什么特殊的背景。

同样的问题在日本也存在。虽然批评他们很容易，但是农村的问题靠批评是难以解决的。

灾害专欺负穷村子

大同在 1999 年遭受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旱灾，从前一年

8月开始，一年降水量只有130毫米，35万公顷耕地有20万公顷绝收。

大旱之年，易发虫灾。那年发生了大面积的蝗灾，加之早霜和冻灾，据说因此大同市的整个农业生产与往年相比减少了82%。原来就不充裕，现在减少到不足往年的五分之一。颗粒无收的那些农民怎样度过严寒之冬呢？

再有，11月1日在大同县和阳高县交界地带发生了震级5.6的地震，以大同县西册田乡、阳高县友宰镇为中心遭受了灾害。此地与浑源县、广灵县界也近在咫尺。此地处于盘子边缘的边缘，这一带的贫困村赤贫如洗。

1998年张家口的地震也是如此。受灾的张北县在河北省138个县（包括县级市）中，人均年收入倒数第8位，比邻的尚义县倒数第2位，而这两个县的交界地带是震源地。

为什么灾害专欺负穷地方呢？事务局的东川贵子说：“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因为灾害多，所以贫穷。”说得也对。但我总觉得好像有只看不见的恶魔在作怪，专门欺负贫困地区中最贫穷的人们。

我在日本得到消息以后，12月赶到阳高县友宰镇西团堡村等受灾地。

“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我问。

“我们不想给高见再增加负担了。”祁学峰和武春珍答道。

当时，那里的最低气温是零下24摄氏度，最高气温是零下12摄氏度。因为干燥，平时如果天晴无风，还不感到特别冷，但是那天凛冽西北风，把持录像机的手马上就冻僵了。

从外观看来，两村的受灾情况并不严重，不幸中的万幸，没有死人。完全倒塌的房屋只是很少一部分的老窑洞，大部分房屋只是震掉房瓦等轻微受损。但是，进到屋里，砖墙四角都出现裂痕，住人很危险。从结构上来看，很难修复。

和这次震源完全相同的地震（太阳地震）在 1989 年 10 月也发生过，震级是 6.2。以前的房屋大部分倒塌，砸死一些人。1991 年，还是在这一带发生了震级 5.8 的地震，遭受了灾害。现在的住房是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修建的。每户贷款 5000~7000 元，修建的房屋比原来的房子抗震能力要强。可是，还没等还清上次 13 年期的贷款，这次地震又把房子震坏了。

如果是以前的那种土窑洞，可能会造成死人的灾害了。还是那句话，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经济上的损失要超过原来的好几倍。

走访的农家，都在屋前建起了临时避难的简易房。用黄土代替灰浆垒起砖墙，至于高度，人勉强能钻进去。里面很窄，但是搭着火炕。墙上贴着大美人的挂历和旧报纸，用来遮风。

小屋的旁边拉起救灾用的蓝色帐篷。地震刚过那段时间住在帐篷里，因为太冷，所以转移到了砖垒的避难小屋里。听说发生了 1000 次以上的余震，摇晃厉害时就钻进帐篷里。

1995 年日本发生阪神大地震时，我家的房子也被震塌了一半。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参加了救援活动。从我的体验来看，中国这个地区的农民能屈能忍，也可以说对灾害已经习以为常。恕我直言：“平常就在低处生活的人即使摔下去，疼得也轻。”若在日本，灾后精神后遗症往往成为社会问题，而这里的孩子们依然无忧无虑。

连续的自然灾害最可怕

自然灾害很可怕，但连续的自然灾害更可怕。此地的农民即使遇上好年景，取得了大丰收，也不敢把粮食都吃光。为防止遭遇旱灾，念念不忘储备粮食。所以，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如果只持续一年，还能挺得住，可要是持续两三年的话，那事态可就严重了。

我从 1992 年开始走访这片土地，大体的记忆是奇数之年肯定干

旱，偶数之年有好年头。1997 年遭受了严重干旱，1999 年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可是，这次的地震受灾地在 1998 年不下雨，而且遭受了蝗灾。就是说，连着 3 年遭受了自然灾害。走访农家时，我让农家给我看了看粮食。麻袋底仅有少量的土豆，个头儿只有玻璃球大小，最大的超不过乒乓球，手掌上能盛下十多个。至于谷子、黍子，大多数农家颗粒无收。

多少有点收获的是玉米。玉米并非耐旱，因为往往种在水利条件比较好的地方。结出的玉米棒很小，只有 10~15 厘米，大都没长出玉米粒。为了能看出大小程度，我让他们把玉米棒放在手上拍照，从他们挑出最好的玉米让我照这件事，就可以感受到农民的心里是很要强的。据说阳高县友宰镇西团堡村的人均年收入是 150 元。

在屋檐下晾晒着直径 15 厘米左右灰黑色煤饼似的东西。我以为 是燃料或者家畜的饲料，过后才知道是土豆压出淀粉后剩下的渣滓，过正月时好用它和在玉米面里吃。我曾经从老人那里听说他们有 过靠吃苦菜、苜蓿根和树皮度过饥荒的经历，现在可能已经接近这种状态了吧。

政府发来救济粮。每人 30 斤玉米，分配标准是一天一斤。老乡告诉我，救济粮比他们自己种的玉米质量好得多。

农家的土墙上用石灰写着“地震无情人有情”的大字，还有的写着“一方受灾，八方支援”。在张家口遭受地震的第二天，大同事务所的成员就和我一起走访了受灾地。在回大同的路上，对面满载着救援物资的卡车堵塞成一条长龙。他们说，这次大同的地震虽然也得到了救援物资，但是不多，因为除山西省以外没有对外报道，原因是地震规模比较小、没有死人。

这一地区在 10 年中遭受了 8 次自然灾害。地震 3 次，严重的旱灾 3 次，洪灾 1 次，虫灾 1 次。而在遭受 3 年连续自然灾害连吃的东

西都荡然无存的时候，又雪上加霜，遭受了地震袭击，而且时值最高气温只有零下 12 摄氏度的严寒时节。自然灾害专欺负穷地方，有如此实际感受也是很自然的。

值得深思的是，在我走访村子时，有好几个老乡问：“上次的世界银行的贷款看来根本还不上。该怎么办呢？”

在这寒冷的冬天连粮食都吃不上的灾民们，为还贷款还深感不安。

在世界可数的富国日本，苦于还贷而自杀的人不乏其数。其原因也使我陷入沉思。

帮助重建小学校

慰问受灾地最后一站是西团堡村的中学。二层楼的校舍，砖砌的墙面上抹着灰浆，在此地农村，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学校。以前的校舍因为上次地震倒塌了，这是以后新建的。

这个学校现在也不能再使用了。特别是二楼的教室严重受损，南北墙的四角都出现了 X 字形的裂缝。

这一天 12 月 20 日是澳门回归的日子。本来是假日休息，为夺回受灾地震灾害影响的时间，这所中学正在上课。在校园里面的空地上，搭起 3 座连接的深灰色大帐篷当教室。

在中国，城市的中学生显得像小孩儿，而农村的中学生虽然身体矮小，但脸上却显出大人似的表情。像我这样战后不久出生的一代人或者上一代的人，中学三年时已经是大人了，不由想起当年逞强和同学、老师大发议论的往事。

我们在镇政府把筹集的捐款转交到有关人员手里，同时接过了他们表示感谢心意的锦旗。教室里正在介绍着这件事。学生们热烈鼓掌，从正面直视着我。这一双双眼睛盯得我心里发毛……我马上抓住机

会。

“请允许我讲几句话好吗？”

开场白过后，我开始讲了起来。

“1995年1月，日本发生了大地震，我家也被震塌了一半。附近有很多人被夺去了生命。地震过后，我马上参加救援活动，抢救那些被埋在下面的人们，并和与你们年龄一样的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组成救援队，加入了重灾区的救援行列……”这是和芦屋市民学生救援队在一起的一段令我怀念的往事。

我认为我是一个遇事冷静的人，还有几分胆量。对大人物也顶撞过，在人们面前讲话也不怕场。可是这时，我却觉得全身紧张，声音哽咽了，眼睛也潮湿了，学生们的脸庞也渐渐模糊了。这可不行！

“同学们，你们现在虽然很艰难，但是这个经历对你们的将来一定会有用的。希望你们努力，好好干！”我强忍着赶紧把话讲完。

在大同县和阳高县的交界地带，很多学校遭到破坏。据说即使规模较大的学校，有20万元也可以重建一所学校。

我回到北京时，拜访了日本大使馆的杉本信行公使。我把拍摄的录像给他看，并介绍了受灾地的情况。据杉本公使讲，由于外务省“草根无偿援助资金”（利民工程无偿援助资金）方面的工作，前年春天开始走访内陆机会比较多，因此对贫困农村的事情很关心。我们的谈话很投机。

我试探着问道，受灾地重建学校能不能得到援助。因为杉本公使的态度是积极的，所以我让大同市青年联合会提出了申请。

诸如这样的合作，有的能把钱搞活，有的却能把钱弄死，关键在于把握时机。我认为选择在明年春节比较好。年初有好事，灾区的老百姓也会为之高兴，孤独感也会随之驱散。因为制度上规定大使馆有权马上裁决400万日元以内的额度，所以金额不足的部分由我们再想其他办法解决。

这个项目马上批下来了。2000年4月的一天早上，杉本公使乘火车抵达大同，视察了受灾地的情况和我们的合作项目，当晚又乘火车赶回北京，日程非常紧张。当年秋天，两所小学重新建成。金额不足的部分由日本的工会组织“全国下水道劳动组合”的捐款补齐了。日本外务省派遣的ODA（政府开发援助）民间监察员也视察了这个项目，并给予了很高评价。同时，日本电视台和报纸也有相应报道。



图：在外务省“草根无偿资金”的援助下，灾区小学校得以重建。右二为视察灾情的杉本公使（大同县，2000年4月）

三个条件

在日本有这样一句俗语：“听天由命。”意思是，不做田间管理，

地里就会长草，变成野地，逐渐树木繁茂，变成山林，反映出即使这样也无所谓的得过且过的心境。

可是，我们合作项目地区的黄土高原，大部分都是你不管也不会变成原野和山林。荒地上的草也是稀稀拉拉。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在日本即使不播种，也会长出茂密的各种植物，而黄土高原无论怎么播种、怎么栽种树苗也长不出来却是普遍现象。

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日本得益于雨水多，年均降水量有 1500 毫米以上。处于黄土高原的大同年均降水量只有 400 毫米，根据年份和地区不同，有时年降水量不到 250 毫米。

还有气温的因素。大同的最低气温接近零下 30 摄氏度，最高气温能达到 38 摄氏度。能够适应如此温差变化的植物并不多见。

土壤也成问题。颗粒细，有机物含量少，难以形成团粒结构，农作物和植物很难生长。低处有水的地区盐碱含量大，容易形成盐害。

在我们操作的诸多项目中，既有成功之经验，也有失败之教训。对比之下，为使项目取得成功，需要具备以下 3 个条件。

第一个是自然条件。如果无视水、气温、土壤的自然条件，项目不可能成功。对黄土高原不要一概而论，要细分场合，在哪里，种什么，怎么种，对这些都要进行科学研究。

第二个是社会关系。中国政府部门的作用很重要，能否得到和项目有关的县和乡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如果村里人 10 个中有 9 个赞成，剩下的一个坚决反对，可能会后患无穷。所以尽量争取百分之百的同意，即使达不到全体一致，也要千方百计降低阻力。

第三个条件是人的因素。上项目的村子有没有敢于负责的带头人，那个带头人能否控制全局至关重要。

可是，如果是上述 3 个条件都具备的村子，他们自己就会干得很好，根本用不着从国外赶来的我们去指手画脚。成为合作对象的村子基本都是 3 个条件中缺少一个或者两个，甚至 3 个条件均不具备的村

子。

这3个条件并非各自毫不相干。自然条件恶劣的村子，例如缺水的村子；社会条件不好的村子，例如交通不便、经济贫困的村子，这样的村子很难发现人才。这也难怪，连姑娘都不嫁到这里，彩礼的价码也高之又高。即使结婚生了小孩儿，也没有能够接受教育的学校。

有才识，有力气，有胆量的人，本来可以成为村里带头的人都争先恐后跑到外面挣钱去了。越有上进心的人越不愿意待在村里。中国以前对人口移动限制很严，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化的进展，这些方面的限制放松了。

结果出现了3个条件都不具备的村子。刚开始时，我信誓旦旦，踌躇满志，在这样的村子规划了项目。其他村子的人说：“可别在那里搞，快打住，那村剩下的人尽是没用的渣滓。”这些话是坦诚相劝，是直言不讳。事实证明，这样的村子在以后项目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最后基本以失败告终，毫无回天之力。这种情况一多，合作伙伴也都累得筋疲力竭。

在这3个条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得出的结论是：人的因素。即使不具备其他条件，但只要有了踏实肯干的带头人带领全村人干，可以填补许多先天不足。这种情况我已经有了许多体验。

相反，其他条件都具备，惟有带头人吊儿郎当，不受全村人信任，那就不可救药了。

积累了这些经验以后，我想到，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然条件是地利，社会关系是天时，人的因素毫无疑问是人和。竟然经过了如此漫长岁月，走了如此弯路才领悟了古人的教诲。

第6章 日本专家的参与

合作初期的一些体验令我不堪回首，有些现在还不便于写出来。

我常对人说，如果该干的、想干的、能干的事都能天随人愿，当然再好不过。这是我的理想。但现实中，即使不甘情愿的事也要做，甚至力所不及的事也要挑战。要是有几个这样志同道合的人，无论什么事业，却能做成了。

我虽然性格脆弱，却很少在痛苦悲伤时哭泣。相反，在持续艰苦的条件下哪怕碰到一点好事、令人感动的事，就会落泪。我年轻时可从来没有这样脆弱。不过，这种时候流出的眼泪，感受到的往往不是苦涩，而是甘甜。

当出现令人棘手的问题时，我的胃会作痛。但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当绿化项目开始让我们感到乐趣的时候，眼泪也随之变甜，甚至胃痛也伴随着一种快感。也许是因为感觉发生了变化，神经也变得迟钝起来。

在绿化项目处于最艰难的时期，1993年，作为绿化合作团团长访问大同的清田祐一郎先生对我说：“环境太艰难，今后肯定会不断出现波折，技术上也不会一帆风顺，所以最好在日本找个好专家帮忙。如果你努力游说，一定会有人愿意帮忙……”

一听这话，我顿时慌了。“快别往下说了，清田先生。果真出现那么多问题，我可就彻底完蛋了。”可是，现实不幸被他言中。1993年秋天，我们绿化项目的树苗几乎全军覆没。

我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开始了绿化合作项目，现在却面临着重大的考验。我深切地感到，我们太需要专家来帮助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了。

立花吉茂和植物园

筹备时期的干事川岛和义是我的智囊。当时，他说有一位朋友是搞植物的专家，于是向我介绍了立花吉茂先生。1994 年春天，我去大阪市立“百花馆”拜访了立花先生。先生在大阪市立大学理学部附属植物园退休后转任花园大学教授，并兼任了大阪市立“百花馆”的技术顾问，同时还担任过 1990 年在大阪举办的“国际花与绿博览会”的植物总监。

一见面，立花先生就来了个下马威：“号称什么 NGO，既没有知识、也没有经验，净干一些傻事。你们没把杨树这个水鬼种在干燥地上吧？”

我坦率地介绍了实际情况。“我来拜访先生就是为了避免干出傻事。”立花先生接下来说的话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世界在工业化以前，植物园是最早的研究机构。在殖民主义统治时代，比如英国就在印度各地建立了植物园，把印度有价值的植物都集中到植物园里进行研究，确立了栽培方法，并将其作为经营殖民地的基础。但是现在的情况和当时大不相同，现在是地球的环境出现了问题。当前需要做的是在黄土高原这样的沙化地带建设植物园，收集有可能在当地生长的植物进行栽培实验，推广可行物种。如果你们真有这种想法，我也愿意加入。”

立花先生真是了不起。这种感觉在我们以后一直相处的日子与日俱增。他的人格魅力自不待言，从立花先生的身上，我感觉出他不仅继承了几代人积累的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而且背负着要把它传授给别人的使命感，但在今天的日本却难觅知音。

立花先生帮助我们发现和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他参与我们这项工

作的真正意义在于为我们奠定了发展的方向，或者说是确立了战略思想。他的所有构想也许不能在大同马上全部实现，但明确了目标，意义非凡，不仅使我摆脱了被动局面，而且逐渐明确了今后的工作重点。

正好此时，大同方面开始由祁学峰接手我们的合作工作，成立了绿色地球网络大同事务所，并出任所长。当时我们在大同的各个县已经设立了十几个合作项目点。他指出，各个县的合作项目太分散无法管理，需要建立一个统一机制进行管理指导。

立花先生的战略是建设植物园，当然他并不认为马上就得付诸实施。作为前期准备，“需要建立苗圃，还需要实验园和研修设施。总之需要先建立一个实验农场之类的园地”。



图：环境林中心的苗圃。最初完全依赖当地的农村，现在已经开始自立。
(2000年)

我认为中日双方的提案可以合二为一。于是根据立花先生的设想，对祁学峰的提议做了补充。由此，大同市南郊区环境林中心应运而生。环境林中心虽然起步时规模不大，但以后的发展却是迅猛异常。

我认为这样的运作程序十分理想。在中方提出认为有必要的方案基础上，日本专家从自己的角度给予回应。如果日本专家只强调自己的想法去运作，中方的主体性就会被湮没。对于由一群外行人开始的合作项目来说，我感到还是有它的意义的。



图：立花吉茂代表（左）和远田宏顾问（右）察看树木生长情况。右二为来自北京的翻译王黎杰（大同市南郊区，1996年8月）。

从建设植物园的角度来看，大同市最南端的灵丘县条件最适合。选定在该地建设植物园后，我们委托当地的技术人员调查周围植物的

分布状况，结果发现了相当规模的天然林。

由此，我们对当地绿化的印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取得如此进展也是和立花先生对建设植物园的执著追求分不开的。

时间回到 1993 年的秋天。那一年，我在大同农村生活了 50 天。当时听说中方正在讨论在浑源县北岳恒山脚下建立“恒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计划，其中要建一个“引种园”，其主要目的是要引进新的物种。

我当即请求建设森林公园的具体负责人、浑源县林业局局长温增玉给日本专家写一封寻求帮助的信函。我认为这个计划很有意义，如能得到日本专家的帮助，岂不更是锦上添花。

回到日本后，我请协会提供了加盟植物园协会的名单。将译成日文的信函和自己所了解的自然条件写在信上，一并寄给了加盟植物园协会的园长，希望“尽最大可能为我们提供种子和树苗”。

在我发出的 100 封左右的信函中有 3 人答复了我。在川岛和义干事的陪同下，我们访问了立花先生。还有一位是东北大学理学部附属植物园园长远田宏先生。在他给我寄来的热情洋溢的信中说可以为我们提供植物园里的柳树插条，真是令我兴奋不已。再有一位是环境厅新宿御苑管理事务所的所长，他为我们提供了银杏、雪杉等树种。但遗憾的是后来没有继续保持联系。

就这样，我决定在 1994 年派出一个专家调查团。我认为如果不以专门的目的请他们考察当地的情况就无法着手工作。出发前，前中久行先生带来了 3 个学生。前中先生曾在几年前研究过中国内蒙古的绿化情况。

在短暂的考察时间里让代表团看什么呢？从 1992 年开始的项目中，有的完全失败，有的还算成功。究竟是让他们看失败的，还是看成功的？这个问题着实让我费了好多脑筋。最后还是决定让他们去看最差的浑源县西留乡和恒山南面的造林地。当时我有一个说不出口

的想法：只有看到困难还肯留下来的人，才是可依靠的人。

后来发生的事让我长了很多见识。立花先生从来没有进入我的摄像机镜头。只要车一停，他就离开团队，单独去观察植物，拍照片。他说：“身为植物猎人，铁的原则就是见到植物就拍照，就采集，来不得偷懒儿，以前就有过无数次一念之差的教训。”

一次，在去农村的途中，面包车的两个轮子同时爆胎，我们被困在半路。一般的情况下人们会大发牢骚，但是日本专家们一下子全部散开，开始了工作。前中先生在路旁耕地塌陷的地方测量耕地表土的厚度，确认盐碱聚集在哪一层。他一边采集标本，一边解释说：“土地已经耕到极限，再往深耕就要出问题了。”

太原的山西农业大学也来了两位教授，一男一女。两位教授体态丰满，步履迟缓，与日本专家形成鲜明对比。

远田先生的变化

远田先生是一位不太引人瞩目的人，经常是到一个地方就默默地挖土、灌水、然后搅拌，很少开口说话。很久以后，他才对我说“实际上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农作物长得也不错，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呢？如果不是参观了植树失败的地区，恐怕我就不会再来第二次了”。该考察团来大同是 1994 年的夏天，也是我到大同以来收成最好的一年。

远田先生后来做的一系列事情也令我费解。如用硬度测量仪计测土的硬度。绿化团来挖果树坑时，他便进到树坑里用测量仪从土的表层开始每隔 10 厘米测量一下土的硬度。据说是看一看植物的根部是否能进入到土层中。

在进行了反复多次的测量后，远田先生不好意思地说：“测量的意义好像不大，这里的土质含水时和不含水时相比，硬度上有很大差

别。”

在环境林中心旁边有一片小老树的树林，我们曾经在那儿连根挖出一棵杨树。为了避免切断树根，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树根延伸的方向挖。结果发现，从表土向下 20 厘米左右的部位含有黑色腐殖土，草根也很多，但是再往下就是黄土的心土了，既没有腐殖土，也没有草根。



图：远田顾问和当地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松树苗的生长情况。他每年都在大同逗留 80 天做指导。（大同县 1997 年 8 月）

杨树的根部沿着表土和心土的分土层横向延伸，有的长达十几米，和旁边的杨树根交错在一起。只有两三个直根向下纵深生长。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测量它的深度。这些根分工不同，有的起着支撑树干不倒的作用，有的根起着吸收水分和养分的作用。远田先生一边指

导我和环境林中心的技术人员，一边非常认真地做笔记。

远田先生不只是在中国的现场进行研究，回到日本后，他还归纳整理所收集的数据，发现疑难问题后查阅相关资料，然后和事务所联系。远田先生真不愧为科学家，我想。远田先生讲话太专，最初我很难理解，但是我很喜欢那种氛围。

大多数人不会相信我曾经是一个爱好科学的少年。我怀着学习原子能技术的愿望考进了大学，但因为一心投身学生运动，中途不去上课了。我的哥哥在工业中专毕业后放弃了考大学，当了一名土木工程技术员。他给我买了一套德国造制图工具，并对我说：“这可是一辈子用得着的……”可是我却只学会了在油石上划着“∞”字磨鸭嘴规，连往鸭嘴规里灌墨汁都没做过，鸭嘴规就不翼而飞了。

我感到自己在观察远田先生举止言谈的过程中，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尤其在大同和远田先生同住一个屋里时，一边喝威士忌，一边听他讲述各种事情的时候，是我度过的最愉快、最美好的时光。有时搞不好，两个人一晚上就喝掉大半瓶酒，第二天早上还打趣说：“这地方太干燥了，昨天晚上明明盖上了瓶盖，怎么都蒸发了？”

有时酒喝多了，我就缠着远田先生问：“Sen sei（老师），你说我是不是个好学生？”先生无可奈何地回答：“当然。”这时正好在一旁的翻译王萍笑得前仰后合：“哪有这么自己夸自己的？”

我一口一个“Sen sei”地叫着，大同事务所和环境林中心的人也都跟着叫了起来。立花先生现在还有些让人生畏，所以大家称他“立花老师”，而只称“Sen sei”时，则指远田先生。尽管如此，远田先生很长一段时间，无论对中方还是对日方绿化团，始终不主动发表自己的看法。

远田先生发生重大变化是从 1998 年的春天。在欢迎日本黄土高原绿化团的大轿车上，远田先生拿着麦克风，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尽管问，我也不知道的，就实话实说……”远

田先生的话匣子一打开，就不只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了。同时，他也开始向中方阐述自己的见解了。

祁学峰马上就发现了远田先生的这一变化。他大概是通过翻译王萍了解了远田先生说的话。他找到我说：“远田先生怎么了？不仅态度忽然变得积极了，讲话的内容也不像是植物学家，倒像是位社会活动家了……”

被换了土的花盆

立花吉茂代表提出：“如果只种山林苗木和果树苗木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看出结果，而且技术上也很难提高。如果栽培花卉和观叶植物，则可大大缩短周期”。由此，我们建设了温室和塑料大棚，开始栽培花卉和观叶植物。环境林中心花卉部的最早负责人是郭有权。

立花先生多次提出忠告：“那个土不行，颗粒太小，根部会窒息。不掺上沙子和浮石来加强通气性，根部就长不好。谁都知道水和肥料不可缺少，但往往容易忽略氧气的问题。”我也把这个意思多次转达给技术员，但他们却没有照做。一直苦于缺水的当地人担心掺入沙子和浮石会使土壤变得更干燥，植物会马上枯萎。

1997年夏季，立花先生访问大同时，我们采取了强制性做法。立花先生让把温室培育的观叶植物和花卉换上了配制的营养土。立花先生希望通过原有栽培方法和新栽培方法对植物生长影响的比较，使他们能够理解这一点。

当时小郭想把自己精心培育的植物藏起来。我看到后，把它拿出来让立花先生也换上了营养土。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

一个半月左右以后我们又去了大同。一进温室发现立花先生费尽心机换上的营养土又被小郭换回了原来的土。我发了好大的火，但发

火也于事无补。

环境林中心经理邢雁俐告诉我：“小郭这么做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非常担心自己精心培育的植物掺那么多沙子会死掉。无论查什么书，也没查到有掺沙子的介绍，他为这件事苦恼过很长时间。”是我的失误将问题复杂化了。

类似的问题经常发生在植树造林的现场。当地人在挖坑、种树、回填土后浇上水，再用脚把土踩实。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保持水分，提高成活率。



图：将观叶植物换上通气性好的土（南郊区 1997 年 8 月）

他们的做法再讲得细一点就是，坑的深度和直径尽可能大，如果是果树，直径和深度都要达到 70 厘米以上。因为土质很硬，挖起来相当费劲。挖时注意将含有腐殖土的表土和深层的心土分开放，表层的干土和下面的湿土也分开放。直接接触根部的部分，回填腐殖土和湿土。

我们感觉这样种有些过深，但他们主张干燥地区需要这样做（最近认识有所改变）。回填少许土后浇水，等水完全渗透到土里后再填土。如果不等水完全渗透就回填土，水就会被土吸上来蒸发掉。然后将回填土踩实，提高保水性如果不踩实就无法使土壤密切接触根部，然后再撒上一些粗粒土，不再踩实，说这样可以杜绝毛细血管现象，防止水分蒸发。

应该说做得还是相当细致的。他们的做法和日本有所不同，但是我还是有点怀疑在干燥地区这样做是否合适。

这种种植方法不仅仅是一般的习惯，而且已经写进了技术手册，可谓根深蒂固。我听说有一个“七字植树法”：选、细、深、紧、保、试、管。“选”，即选择耐旱树种；“细”即精耕细作；“深”即深种；“紧”即把土踩实，使土和苗木紧密接触；“保”即保护根部，防止水流失；“适”即适时栽种；“管”即管护养育。

这些方法虽然有它的道理，但总感觉太过于强调“水”的观念。当然，归纳成“几字经”的做法比较简单易记，利于普及，但无法根据现场情况因地制宜，容易导致“上面说了算”的弊病。在中国，文字是很有魔力的。

我就是面对这样的状态在大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艰苦工作。

樱花小苗掀起的“革命”

1996 年秋天，我们的合作基地——环境林中心的技术员们提出

了“想要日本樱花树”的要求。最初我没太理会：“种什么樱花，樱花和杏花差不多，一旦长虫子，很难对付。”但他们说：“提起中国，日本人首先想到的是熊猫；提起日本，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富士山和樱花。”

如此一说，我也就不好拒绝了。富士山我没法搬来，但樱花树还是可以想办法弄到的。于是便委托秋田和北海道的会员，请他们收集了“千岛樱”和“大山樱”的树种。1997年夏天，我们将树种播种在立花先生自己配制的营养土中。

第二年春天，我们播种的樱花树种密密麻麻全部发芽了。我们把这些树苗逐一分开，栽种到营养钵里。树苗的长度有10厘米左右，根部的长度也差不多。环境林中心的技术人员对树苗的根系如此发达惊讶不已。

而我感到吃惊的是另外的现象：根部紧紧抓住土中的木炭渣和浮石不放。我把全体技术人员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你们看，因为树根也喜欢氧气，所以就像这样，紧紧盘住木炭和浮石。”

在此之前我们曾将几棵奄奄一息的观叶植物换了盆。我把花盆倒扣过来，发现没有一棵植物的根部长得理想。“根部已经腐烂了”。只见根部不是向下扎，而是浮在表层。我生气地说：“通气性不好，因为氧气只停留在表层，所以根部就向上长。你们应该感谢植物没长脚，如果长脚早就逃跑了。”

通过两者的比较，技术人员对配土种植有了较深的理解有了长足进步。我曾访问过位于怀仁县金沙滩由德国ODA项目支持的杨树研究所，那里的设备全部是德国造高级设备，温室和塑料大棚的骨架也是由德国运来的，看着很结实。但是我们的技术员一进入温室就立即用手摸钵里的土。“这个土像水泥一样硬，需要加浮石和沙子”。就在前不久还对这种做法不理解，把立花先生换的土又给换掉的技术员这样说。这着实让我感到又高兴又可笑，憋了好大劲儿才没笑出声来。

1997年夏天，立花先生又搞了一个实验。那是我们在浑源县照壁村种杏树苗时发生的事。我们看到地边上有一堆废弃的煤渣，便在每个坑里放上一锹煤渣，并要求绝对不要去踩。一半树苗按着这种方法栽种，另一半树苗按着原来的办法栽种。

第二年，当我们又去那个地方时，汽车刚一落脚我就跑下车。树苗生长的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加过煤渣的树苗成活率超过了90%，而没加煤渣的树苗成活率只有60%，加没加煤渣对植物生长造成的差异太大了。

为了使同行的技术员理解这么做的真正意义，我把他们叫到一起，从每组中挖出一棵树苗做根部生长状态的比较，结果是加了煤渣的树苗根系发达，一直钻入煤渣层，整体上比没加煤渣的树苗长势好。

同行的武春珍一看到这种情况，一脸兴奋：“明显，结果太明显了！过去听说过好多次，今天才真正明白这么做的意义。今后我们所有的项目都采用这种种植方法。”在这方面虽然我们费了很多周折，但事情总算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菌根菌”的惊人作用

为了在黄土高原开展绿化合作，“绿色地球网络”建立了4个苗圃，总计面积达25公顷左右。1999年春天，当我们访问在大同县的针叶树育苗基地时，负责人兴奋地告诉我：“我在国营苗圃工作了20多年，没有培育过、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苗。我们这个地方在培育松树育苗方面有些名气，前几天新荣区来人要树苗。我们把用以前方法培育的树苗拿出来，他们说苗不错，每棵可以给两毛钱。后来又给他们看用日本技术培育的树苗，他们说想要这种苗，每棵3毛钱也可以。但因为这是你们的苗木，我们不能卖。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全部用新技术培育树苗”。

两种苗木的差别显而易见。我们培育的树苗长得非常整齐。虽然同一时期播种，但我们培育的树苗发芽后没有枯萎的。

我们把苗挖出来做了比较。将树苗平放在地上，经过比较，仅地上的部分就有很大差别，根系发育的差别就更明显了。我们培育的树苗，挖出来后即使轻轻抖动也抖不下来根上的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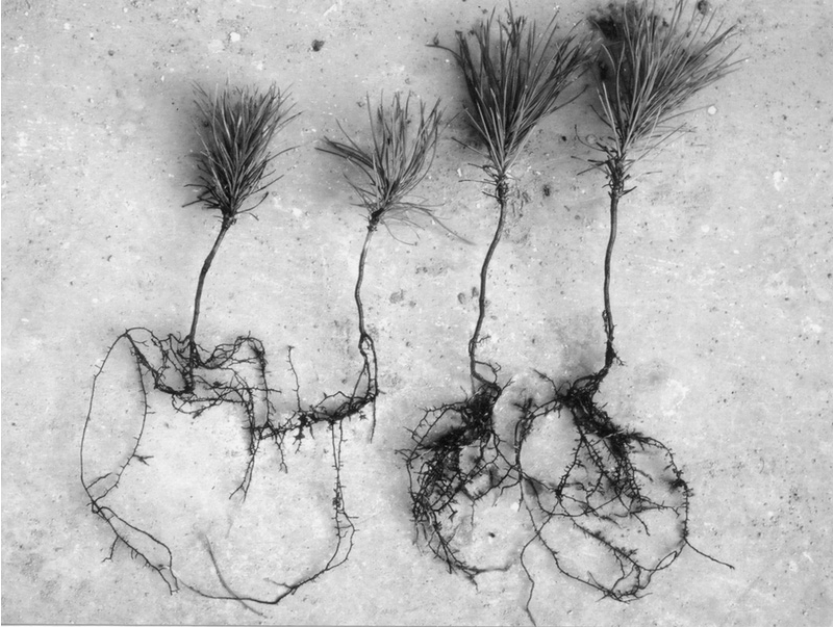
我们把树苗自然干燥一周后，分别对它的根、茎、叶称重。为了进行比较，我们把传统方法培育的树苗用同样方法做了测量。每棵苗的平均重量如下表所示：

单位 (g)	总体	根	茎	叶
实验区	1.11	0.16	0.18	0.75
比较区	0.55	0.12	0.07	0.35

重量相差两倍！我们培育的树苗总体不仅苗壮，而且每棵树苗长势均衡，无大差别。

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种的松树苗在播种前的苗床上加进了少量的松树林表土和木炭渣。使生长情况产生如此差别是菌根菌起的作用。提起菌根菌，也许知道的人并不多，在此之前，我对它也不了解。

所谓菌根菌，就是带菌根的菌，是一种与植物根系共生的微生物，是蘑菇和霉菌的同类。菌丝进入到植物根系的细胞中、或是细胞与细胞之间，汲取植物的糖分作为营养。菌丝深入到土里，使土和根系结合得更紧密，帮助植物的根系吸收水分和矿物质，这样植物就能长得更好。由于菌根菌保护了植物的根系，其抗寒、抗病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图：接触菌根菌的松树苗（右侧两根）与通常的树苗相比长得大一倍，特别是根部的生长情况很好。

1997 年春天，我们请菌根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小川真先生（关西综合环境研究中心生物环境研究所所长）来大同指导。当时我们用营养袋实验培育了几百棵树苗，接种菌根菌的树苗在 4 个月后长大一倍，从而印证了菌根菌的效果。1998 年春天，我们启动了针叶树苗木基地，开始了实用化生产。

前面提到过实验区，实际上我们计划每年要生产 200 万棵这种树苗。几百万棵的实验与几百万棵育苗的成功相比，其冲击力大不一样，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灵活判断，正是我们 NGO 的强项。

我们将得到的数据汇报给小川先生后，他特别高兴，并说：“一

般情况下，菌根菌的效果需要更长一段时间才能得出，也就是说要种到山上后再看效果。第一年就有如此明显的效果，说明当地的自然环境太差了。”

从小川先生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这项技术的意义不在于培育出大的树苗，而是培育出的树苗种到山上以后成活率高，能够抗旱、抗寒、抗病虫害。条件越差的地方，其效果越是明显。

从 2000 年的春天开始，我们开始在植树造林地栽种接种了菌根菌的树苗，成活率明显有了提高。最令当地人吃惊的是，过去的树苗种下去当年只要是不死就算烧高香了，基本不会长大，但接种了菌根菌的树苗栽下去，马上就开始见长了。



图：对当地技术人员做菌根菌技术指导的小川真先生（中）。将信将疑的技术员们对菌根菌的效果感到吃惊（1997年4月）。

所需材料都能在当地筹集到，方法也很简单，只要有菌根菌的孢子和辅助其附着的木炭渣和浮石就可以了。松树育苗需要的是长了蘑菇的树林表土里的孢子。在大同我们用的菌是红牛肝菌，木炭渣用的是硅加工厂用于还原剂的木炭渣。

最初将这个技术介绍给苗圃的技术员时，他们都将信将疑。结果只经历了一年，他们就对菌根菌的效果坚信不疑，并为培育树苗积极准备木炭渣和松树林的表土。

然而，最终使他们产生动力的是使用菌根菌培育的树苗售价是原来树苗的 1.5 倍。金钱的力量真是伟大！虽然这让我这样的人多少感到有些不是滋味，但不管怎样，这样就可以使菌根菌在当地扎根，得到普及。

实现混种过程的艰辛

在筹备绿化项目过程中我看过中国林业主管部门的报告，报告中指出绿化中存在的需要反思的问题。“中国幅员辽阔，但我们只用两种树进行了绿化，南部为阔叶杉，北部为杨树”。同时还指出北部的杨树天牛虫病害正在扩大。

在开始这项绿化事业时我曾经咨询过中村尚司先生（龙谷大学教授），他对我说：“对环境问题而言，循环性、多样性、相关性这三点是关键。”要使树种多样化，实现混种是我们最初就面临的课题。但事情总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首先一个困难，就是适合的树种太少。大同 1 月份的最低温度为零下 30 摄氏度左右，山上温度就更低了。另一方面，夏天的最高气温超过 35 摄氏度（1999 年夏天温度高达 38 度），十分炎热。

南方的树木在当地越冬有困难，耐低温的北方树木刚种下去时看起来问题不大，但夏天的高温会使树木抵抗力逐渐变弱，病虫害就会

乘虚而入。

而且大同农村又是非常贫困的地区，经济上很困难，如果种的树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就无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寻找具备这些条件的树种，很不容易。

第二个困难，是相关人员没有认识到混种的必要性。我们提出混种时，当地的一个技术人员反驳说：“不同的树种之间会产生相互争夺光线、水分和肥料，必须慎重研究。”所谓“慎重研究”的话外音就是表示“不行”的意思。

既没有见过天然森林，对严峻的环境又有深刻的亲身体验，陷入这样的思维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我曾在农家的大门口多次看到过“战天斗地”这样的口号，这些都是基于同样的思想。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天安门广场阅兵时的情形，无论是横看竖看，还是斜看，队列都是整齐划一。也许他们希望种下的树苗长的高度也能像阅兵时跨出的步伐一样整齐划一。

原以为只有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才会这样，但是一问才知道日本的森林工作者也有这种倾向。林业方面存在着经济效益问题，所以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实际上那种造林方法是最危险的。我想，改善生态环境的植树造林也许不让林业部门去做为好，起码不能完全交给他们做。

1997年情况有了转机。大同县遇驾山等三北防护林（绿色长城计划）的示范林中开始出现了樟子松枯死现象。我们急忙请几个日本专家进行了会诊，他们和当地的技术人员一起视察树林后发现了一个问题，油松出现了卷叶蛾虫害，樟子松没事。樟子松发生了红蜘蛛，而油松没受影响。在樟子松和油松混种的地方，两种虫害的影响都很小。尤其是混种杨树和沙棘（胡颓子科的灌木）的地方，虫害影响很小，松树长势良好。其效果之明显，令我们也大吃一惊。可能是因为植被稀少，混种的效果反而更为明显。

当地的技术人员也通过亲眼目睹的事实，认识到了混种的意义。在我们合作的项目中，从1998年春天开始最多混种过6种树木。这件事从思想上为我们建设植物园的设想奠定了基础。往往是发生问题时事情会有飞跃性的进展——坏事就变成了好事。

摄影家的工作态度

1994年秋天，小松光一先生访问了我们的事务所。当时他担任御茶水女子大学的讲师，说是接受日本邮政省（当时）国际志愿者储蓄机构的委托，想到大同进行实地审核。我说你尽可能多逗留一段时间，多看一些地方。话谈到一半时我们就坐进了旁边的小酒馆里，一直谈到很晚。从大同回到日本的小松对我说：“受日本政府的委托，只去一次有点说不过去。我想组织一个合作团去，不知你是否愿意接待？”

1995年由小松组成的合作团，其构成非常独特。桥本紘二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是一位一直为《现代农业》（农山渔村文化协会）月刊杂志拍摄封面和插图照片的摄影家。不过当时桥本一直抱怨“如此紧张地移动，能照出什么照片”！

第二年春天，桥本又去了大同，夏天去了，说秋天还去。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不过反而更好。他那张嘴的刻薄程度和我不相上下。不过只要他龇牙一笑，指手画脚地和农民交流，你就只管放心好了。那笑脸，真是绝了！

摄影家向来我行我素，否则，难以胜任。为找到拍摄一张照片的最佳角度，他会舍近求远绕到沟谷对面；为拍摄一张有对比度的照片，也会一直静静地等到太阳西沉；有时为拍摄对照物，不惜几个小时地等待农民和马车路过。身上背着几台沉重的照相机，简直就是体力劳动。说来也是，在业余爱好者使用的照相机比专业人员更高级的时代，专业摄影家必须拍出业余爱好者拍不出来的照片。

农村最有生气的时间是在早晚，光线最佳时间也是在早晚。所以桥本先生早上天还未亮便出门，晚上很晚才回来，吃饭的时间当然也不规律。这些对他来说倒没什么，但却苦了同行的司机和陪同。

大同的农村大部分为不开放地区。理由就是不愿意让外国人看到太穷的地方。因此，在这里拍照片的意义不同于一般地方。

不久，桥本就落得个“自由分子”的外号。我告诉当地人：“在中国自由分子是贬义，但是在日本是褒义。他在日本就目空一切，你们这样说他，他就更忘乎所以了。你让他赶紧回来，他会认为那是对他的鼓励，就更不回来了。天黑了，或者胶片用光了，他自然就回来了，不用担心。”



图：连续5年拍摄当地农村的摄影家桥本紘二

最后还是桥本拍摄的照片让大同人理解了他的行动。桥本将自己拍的部分照片拿到大同让有关方面的人看。大同市青年联合会主席邵向华也喜欢摄影，自己也拍照片。他说：“我从没见过黄土高原这样的景色！”桥本的照片使他成了发烧友。司机小张到了桥本有可能想拍照的地方便放慢车速，把正打盹的桥本叫醒。

桥本的坦诚赢得了大家的信赖。一看他从归来的汽车上下来时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今天拍没拍到满意的照片。拍到时无论多么疲劳，也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如果没拍到，就会现出垂头丧气的表情。真可谓悲喜哀乐，一目了然。哈哈，爽快之人！

我考虑要出农村题材的摄影集，首先要分成一年四季。因为在1997年底要召开防止地球温暖化京都会议，因此我提议“在地球环境问题备受瞩目的情况下，1997年底出版摄影集如何？”桥本也同意了 my 提议。为此，我想最后再为桥本提供一次机会，于是带他去了天镇县李二烟村。

要在平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甭想拉回来的桥本一进村就说：“高见，咱们回去吧。”我以为是他身体不舒服。到了晚上他告诉我：“你突然带我去这样的村子，我无法用相机面对它。不是怕穷，关键是要有思想准备，否则无法拍照”。

他的想法我很理解，不由想起自己以前在灵丘县下寨北村第一次目睹快要坍塌的小学校时，也是无法按下快门。我极力避开村里人，好不容易拍了两张外景照。通过这件事，我和桥本的感情变得更亲近了。

他说“在看到这个村子之前，自己觉得可以出版摄影集了，但是看了之后，感到时机远远没有成熟”。我意识到，看来我们的交往要延长了，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有5年之久。

虽然花费了更多时间，但从结果上看，效果更好。当作品集《中国黄土高原——沙漠化的大地与人们》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时，我

看了他选的照片，最后一两年拍摄的作品占的比重较大。我想，桥本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当地理解的逐步加深，才拍摄出了这些更能体现自己风格的作品。

在 JR（日本旅客铁路）西日本段的南谷昌二郎社长等的协助下，我们在京都车站、名古屋车站、大阪车站、广岛车站、冈山车站、东京车站举办了桥本的摄影展，使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些摄影作品。

桥本不仅作为摄影家参与这项工作，所到之处还为我们收集到宝贵的信息。如果没有他，我还不可能对农村水源如此匮乏的情况有这么深刻的认识。虽然我叫苦不迭：“我不想知道那么多！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财力物力，你不要再给我加压了”，但我还是得到了许多信息。

用菌根菌培育松树苗所需木炭渣就是桥本发现的。简直难以相信在没有树木的地方会有这么多木炭渣。这些木炭渣是用于硅加工最后工序的还原剂，是用小老树的小叶杨烧制的。后来，作为土壤改良剂，我们大量地应用了桥本利用采访之便寻找到的木炭渣。如果桥本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大概也不会知道木炭渣有着如此用途吧。

一想到摄影集出版后桥本可能就不会再来大同了，不禁一阵伤感，寂寞。每当我说起这事时，桥本总是说：“我还会来的。”远田先生也说：“还要出续集呢。”

第7章 “掺沙子”

曾几何时，日本在热烈讨论如何振兴村庄、振兴地区时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年轻人、傻瓜、外来人的参与非常重要。我认为在国外参与合作事业，亦是如此。遗憾的是我已青春不再，不过还有傻瓜、外来人的资格。在国际合作中与当地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图：通过走访农村和农民交谈，找出对合作工作的要求和问题。在很多村里结识了很多朋友。（广灵县）

有人认为同化是最理想的办法。努力在衣、食、住等基本生活方面接近当地人。我的师傅石田保昭把这种经验写进他的作品《在印度生活》（岩波新书）。在开始着手绿化合作工作时，我也努力去做了，但是十分辛劳。住在农村时既无浴缸，也无淋浴，不修边幅的我几天不洗澡并不觉得痛苦。在当地，我每天即使能得到点水，也是早晚不洗脸、不刮胡子、不刷牙、不擦身。当地人只用一小杯水就能很好地打发自己。

但是，这样的生活只能坚持一个星期。白天活动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异样，但到晚上钻进被窝后被热炕头一烙，浑身上下痒得无法入睡。于是便逃回有淋浴的县城，休整两三天，然后再去下一个村庄。

按理说我生长在贫穷的农家，从学生时代开始就胡闹，也只有这个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感到吃不消。我算那条道上的落伍者吧。不过，过去的这种尝试至今还很有用。我非常佩服那些能够长期和农民同吃、同住、话能说到一起、心能想到一块儿的人。

当然，仅仅这样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发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做有意义的工作。如果完全同化，变成和当地农民一模一样，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在很多人打光棍的农村，年轻姑娘当然受欢迎，像我这样的半拉老头儿，谁要呀。在原本就人口过剩的中国农村再增加一个“中国人”并没有什么意义。

从那时起，我就有意识地将自己作为另类分子做点儿“掺沙子的事。”当地的事情当地人最清楚，我不可能搞明白他们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祁学峰曾说过：“高见不可能搞明白中国农村深层面的东西。”他说得很对，我也不想搞明白。

正因为当地人了解情况，有些事就不会产生更多的疑问。因为关系错综复杂，有很多事情不知道该如何对付。无论哪里都是这样。一旦你确立了一个项目，各种关系就会把你套住，无法脱身。这样，不了解情况、无个人欲望、大脑迟钝也就显现出了它的优势。以第三者

的冷静目光观察、发现问题更有好处。有时可以顽固地坚持己见。

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反作用也很强，自己的价值观会遭到彻底毁灭。我原本的性格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争取把事情做得完美，也可以说是手艺人的性格。但是在这儿的合作事业却把我的价值观打翻在地。总之，广漠的土地，无边无沿。即使想认真地好好干，也无法保证种下的树苗一定能成活。在持续过程中，我感觉脚下在打晃，整个人都要散架了，实在让人痛苦。

说一件我经历过的事。1997年，大同县遇驾山的樟子松开始出现枯萎，原因不明。菌根菌专家小川真先生看了樟子松后，建议“这种现象有可能扩大，最好能呼吁一下”。

我拜访了林业部（现为国家林业局）副部长，谈了上述情况。副部长相当于日本的次官，原本不会见我这种人，是北京的一位朋友给引见的。我的外国人的身份也算帮了一点忙吧。

坐晚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到了大同。和往常一样，祁学峰来火车站接我。一见面他劈头就问：“你在北京都干了什么？市林业局已经叫了我好几次了。弄不好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地开展工作了。”到饭店时林业局局长及其属下的干部表情紧张地等在饭店。看来，我干了一件蠢事，我想。

我在北京反映情况后，林业部给省林业厅打电话过问了此事。

“发生了重大疫情，为什么不报告？”

山西省林业厅又将电话打到市林业局，追问同样的问题。大同市林业局怀疑是与青年联合会合作的日本人向中央汇报的。

看来只有破釜沉舟了。我去市林业局，向他们做了情况说明。中方以局长为首，很多干部参加了会议，省林业厅的副厅长特意从太原赶来参加会议。最初气氛有些紧张，但在交流中气氛逐渐变得融洽起来。

之后，大同市林业局派人去樟子松的原产地对病因进行了调查。

过去我们和林业局一直没有任何关系，通过这次事件建立了联系，同时还请他们给我们介绍了林业局刚退休的优秀技术员侯喜先生，为我们以后的工作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我认为在工作中经常要有不同观点和想法的人去“掺沙子”。

人的想法是可以改变的

从浑源到灵丘的途中，我想起一件事。我们最早走这条路是在1993年5月。临出发时翻译来告诉大家：“从这儿往前是禁止拍摄的，请大家把照相机交给我保存。”

“不允许拍照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收照相机呢？难道这么不信任我们吗？”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终于使他们撤回了要求。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近10年，我们的关系彻底发生了变化。除了改革开放的浪潮波及到地方的因素外，也可以说通过日常的密切交往，我们建立了新型关系，总之，我们的合作伙伴功不可没。

我曾经和阳高县一位管外事的公安干部发生过3次激烈的争吵。摄影家桥本是争吵的导火线。桥本把一个身穿中山装、上面挂满了毛泽东像章的小老头到处游说“继续革命”的场面摄入了镜头。估计小老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刺激，精神失常了。

随后那个公安干部找到我，说：“有过路人举报，请把那部分底片交出来。”我反驳说：“反转片在这里无法冲洗，再说，日本政府没有正确地进行历史教育，中国政府对此多次抗议，日本好多人连日中战争都不知道，更别提‘文化大革命’了。”

吉之岛工会第一次绿化合作团来访的时候，那个公安干部趁我不在时将代表团成员召集到院子里宣布：“出了这个院子，一概不许照相。”这时我正好路过那里，顿时不干了：“如果你这样做，我们马上离开这个县，今后决不再来！”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平时做事小心谨

慎，但是一旦超越了忍耐限度，反而什么都不在乎了。

当时的翻译是王黎杰，翻译得更有分量，还加上了“此人说一不二”之类的话。最近，有个当时在场的人跟我说：“高见，你当时的脸好可怕啊。”



图：最初的时候就这样牵着孩子们的手在村子里转悠。我觉得这种形式的接触很重要。左侧为王黎杰（天镇县 1996年）

那个公安干部一时不知所措，我给了他一个台阶，说：“有问题我负责。”把事情糊弄过去了。作为外国人，尽管我负责的余地是有限的，但我会竭尽全力去这样做的。以后有好几次也是用这句话解决问题的。

后来朝日电视采访团到这个县采访的时候，据说那个公安干部又让把拍摄好的录像带交给他们保管。县里连放录像的设备也没有，这样做显然是在搞恶作剧。

如果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不会有好事，所以在一次见面时，我主动向他表示道歉，说“我也有过错”，还一起干了杯。酒过三巡之后，他甚至向我讲起自己的经历。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融洽。

只要绿化合作团一来这个县，他总是一路陪同，而且率先拿起铁锹种树。了解当初情况的司机小张看到这个情景便跑到我身边说：“高见你看，人的想法还是可以改变的。”紧接着小武也跑过来说：“那个公安拿着铁锹种树呢，人是可以改变的啊。”

已经尝够苦头的我走到关系依然紧张的天镇县一位公安干部的身边和他打招呼，他只回答了我一句话“少跟我套近乎”。唉，连让我靠近的机会都不给。

会吵架的人懂得吵架的火候

有人喜欢阅读我的《黄土高原来信》，理由之一就是“文章写得很好，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完全不认识我的人这么说倒有情可原，认识我的人看到这话，一定感到愕然。

在参加国际绿化推进中心举办的座谈会之后，我说了一句多余的话：“如果打算培养 NGO 人才的话，重要的是要教会他们吵架的方法”。我的说法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结果还被指名成了“讲师”，而且几年后竟然弄假成真。

在工作中我的一个切身体验是有的时候学会吵架要比友好相处更为重要。友好相处心情舒畅，自己也轻松；但和人吵架，不仅消耗能量，同时自己也会受伤。

但是，如果要想让植树造林成功，有些时候吵架是必须的。每当这时我总是这样鼓励自己，要不想干，干脆一走了之，要想继续干，就必须直言不讳。

在活动初期随同我一起来大同的翻译王黎杰告诉我：“刘怀光说‘我和高见关系很好，但有一件事我不能原谅高见。高见曾经骂我不是人’。我告诉他，高见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刘怀光当时是大同市共青团委的副书记，我们合作事业的负责人。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曾经说过那样的话。后来终于想起来，大概是哪件事做得不顺畅时脱口说过“chikusyo^①”，旁边的翻译把它翻给刘怀光时说成“他说你不是人”。确实“chikusyo”这两个字换种说法是“不是人”。在相互之间还没有完全建立信任关系之前，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引出莫名其妙的结果。

因为有过诸如此类事情，所以开始的头4年，我一直采取克制态度，努力不去注意差的方面，只看好的一面。我感到自己体内潜藏着危险，沉积的精神疲劳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爆发出来。在第五年的春天，我终于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这种转变，祁学峰和王萍也都说“从那时起高见变了”。

尽管我自己没有多大感觉，但别人的感受还是相当强烈的。有一次绿色地球网络的副代表有元干明先生也在场，他对我说：“高见你好敢说啊，真让人捏一把汗。”

历史和文化上存在的差异，即使说出来也有不理解的地方。如果不说彼此就更无法沟通了。我把自己的想法不加掩饰地说出来，对方的反应也就变得更加坦率了。我认为，在某一个阶段实现这种转换是必要的。

我年轻时气盛，一到吵架和争论时就想占上风。实际上最理想、最巧妙的吵架是，挠着脑袋告饶“我认输！”但结果却达到自己的目

^① 日文中有“畜生”“真气人”两种意思，但此处中文意为“真气人！”——译注

的。我恐怕来世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我这么讲，祁学峰可能要说“是我们把懵懵懂懂的高见带出来了”。这也无所谓。建立了关系，彼此都会发生变化的。

被迫吵架

我觉得自己吵过不少架，但是始终坚持避免发生肢体冲撞，如果动手，我只有招架的份儿了。我这个人本来就讨厌别人在你面前盛气凌人，可是在中国，国家和政府是强者，平民百姓是弱势群体，让你看不惯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在北京站的入口处，我看到一个保安冲着我前面的一个农民模样儿的人嚷道：“掏出票来！”话音未落，脚已踢了过来。我气愤极了，可是毫无办法，我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我恨自己，当时真想再也不来中国了。

1995年夏天，大阪青年会议所代表团来的时候由于人数太多，无法坐火车移动，便包租了从北京到大同的专机，回北京时我也顺便搭乘此机。位于怀仁县的大同机场原来是军用机场，由军队管理。在机场他们竟然要没收我宝贵的威士忌，原因是“瓶塞已打开，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我说：“你们拿两个杯子来，我先喝一口，然后你也尝一口确认一下。”他们不肯。我又说：“一个杯子也可以，如果你们非要没收，我就把它全喝光。”

当时的翻译是王黎杰，只有她做翻译时我才能够这样吵架。“这个人可是说一不二”。因为她又补充了这句话，威士忌就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不是还回来的，而是自己回来的。这还用说吗？威士忌当然是愿意让我喝它啦。

根据我的观察，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欺软怕硬”。其实，这种倾向无论在哪儿对谁来说都一样，不过普遍认为日本人更是如此。

可悲的是这并不是误解。在日本国内，“不畏强者，帮助弱者”一词已成为死语。

一次从北京机场乘坐中国国内航班去上海时被蛮横地告知“你的座位被取消了”。不是我要取消的，也不是超量发售机票导致的，而是某些要人突然决定出差，通过内部走关系，结果另一些人就成了牺牲品。我碰见这种情况已不止一两次。

这时如果用只言片语的中国话去交涉，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于是我就用起大阪方言，敲着柜台抗议，拿出一副强者的架势于是出来一个懂日文的人应对，这样我就一直处于优势了。

在绿化合作事业中，我起着协调中日双方的作用。但是社会形态完全不同导致双方存在分歧。日本是资本丰富，生产过剩，工业产品价格低廉，劳动力价格昂贵，而且不管对什么，要求的水平都很高。而大同农村与日本相反，资本匮乏，产品不足，工业产品价格高昂，劳动力廉价。

在日本有很多通过自动化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但对大同没有用。当地更需要的是增加就业，扩大就业率，采取工作分摊制。当然扩大就业对现在的日本来说也是件好事，但却无法实现。把日本的标准拿到大同无疑过高，造成经费及其他方面的浪费。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专家和有能力领导应该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提出合适的方案，但我的能力无法满足这种期待。我的方法是，只有慢慢等待。如果用当地的方法能够成功，我就缄默不语。即使通过引进日本的做法能够提高10%的成活率，但要搭上器材和时间的话，也就失去了意义。其实事情也很简单，如果有的地方种下的树苗死了，第二年补种就可以了。

如果出现失败，正好是一个机会。我尽可能从根本上考虑，使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各种各样的技术改造也都集中在这种时候进行尝试。人在失败时都会自我反省，进行反思，这时最好和他们一起共商

对策。如果能想出更多走出失败的方法，肯定会受到对方的欢迎。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和他们一起正视失败。共同拥有失败的教训比共同分享成功更能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有难同当的意识。所谓“同犯意识”，尽管这种表述不太恰当。如果这时表现出“失败的是你们，跟我无关”的态度，就会彻底毁掉合作关系。

喝酒的教训

中国很多的地方的习惯是“烟酒不分家”，一个人喝酒是对同桌人的不尊重。如果你想喝酒，就要与周围的人干杯，和他们一起喝。说“干杯”，然后一饮而尽，再把杯子倒过来让对方看一看。如果还剩一点，就会被说成是“半心半意”，受到指责，要想证明你是“全心全意”，必须先干杯来证明。

按着中国的旧习惯，与其在会议上正经八百地谈，不如大家围着饭桌谈管用。旧习惯有其历史渊源，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当然吃饭时酒是不能少的。我和市里干部谈事的时候也经常采取这种形式。

我总是利用这些难得的机会拜托一些事情。但是让人不安的是，有时酒喝多了，对方就会把承诺给忘到脑后。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事，我就将他们的军：“没有比喝酒时做出的承诺更神圣的了，如果不遵守承诺，就没有资格喝酒！”有一次我甚至要求对方把说的写在纸上，结果被祁学峰数落了一顿。

不过也确实有让我为难的事情。早期参加黄土高原绿化合作团的一些人被“干杯”搞得半死不活。有一个女学生因为能喝，午餐时遭遇轮番灌酒，一坐上回宿舍的车便不省人事瘫倒了。

不过近几年这种情况少多了，这个功劳要归于我。1994年的春天，为了讨论为小学校种杏树的事，我们走访了浑源县照壁村。访问刚退下来的前任党支部书记家的时候，一只看起来就很凶猛的狗狂吠

着向我冲来。趁主人使劲拉住狗的瞬间，我从他背后的小窄缝中挤进屋里。

我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又没有翻译跟着。语言不通时惟一的靠山就是酒了。“干杯！”当我把酒杯里的酒一口喝光时，同桌的农民们脸上都露出了笑容。一杯，一杯，又一杯。而且当时给我们斟酒的是脸上施着红粉的农家姑娘，如果你拒绝，周围的人就会跟着起哄：“你怎么一点也不给姑娘面子！”结果那次喝的酒远远超过以往。

当我起身时已经酩酊大醉。一出家门，我就走到猛犬旁猛地把它抱起来一个劲儿地转圈，嘴里还嚷嚷着“狗是我的老朋友”。在场的人都为我捏着一把汗，担心我被狗咬着。实际上我有驯服狗的绝招，但为了避免被人乱用，就不在此公开了。

我庆幸当时抱起来的是条狗，如果是抱住了年轻姑娘，那么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在日本，都会引起轩然大波。最近我有意识地离狗远一点，主要是因为大同还有狂犬病，而且时有发病。

自从“狗事件”以来（实际上还有一次失败的教训），我一喝酒，大同的合作伙伴就阻拦我，“不要紧吧，别再喝了”。因此，绿化合作团来的时候，很少再发生以前那样危险的事情了。

虽然不再抱狗了，但是最近一喝醉酒就开始骂人，开始侃大山，醉话连篇，而第二天忘个一干二净。可能是因为上了年纪的缘故吧。我一喝酒，小武就说：“侃大山倒还蛮有趣的，骂人就免了吧。”

2002年春天，在走访大同农村时有人看见我就说：“傻瓜、酒鬼。”让人这么说，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大家都这么说，我就有点纳闷了，因为比我更能喝、更傻的大有人在呀。

后来搞清楚了。原来《大同晚报》有一篇彩印的报道，标题是《我是傻瓜和酒鬼》。当时记者采访我时我已经喝醉了，说：“搞活动初期曾面临过很多困难，但是因为我傻，逃得太慢，所以只好留下来接着干。”但是再怎么着也不能把这作为大标题呀！唉，这也算是自作自

“我是地球和海洋”

——与高见邦雄对话

本报记者 张洪波

一个人、日本无利己的动机、只为了绿化、目的、直到两次来了。从1982年至今的10年里，日本绿色地球网络组织领导人高见邦雄为绿化事业投入了1700万日元，前年绿化事业经费达1000万日元，用于大规模绿化。为何如此执著如斯？高见邦雄说：“我是地球”。

3月8日，记者随高见邦雄先生组成的绿化小分队前往他在南部、灵丘、大庭岛植树。在此间三次采访了他，以下是记者与他的对话。

记者：您为什么选择了绿化？

高见：三个原因吧！一是1979年我来到过中国，以我为荣过十多次，中国严峻的环境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是说，美国是经过四五代人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繁荣，中国现在的发展非常快，所以发展太快了，但环境问题很严重。我想不能因为别的原因而忽视环境。

三是说，中国、韩国生活在一个亚洲，面临一个环境，应该共同努力把环境搞好。如果任由中国的环境恶化，那将危及全世界。

记者：您在10年中到大庭岛等地植树，那地方人口如此稠密，可您却把那里当成您自己的地盘，您有什么思想支撑下去？

高见：因为我热爱。

记者：“您说”为什么？

高见：如果我想像您那位一样一位老师，现在您不去上学(苦笑)。

高见：那您为什么要去上学呢？

高见：您想上学，您把我当成孩子，还有那多比我更热爱的人把我“骗”到这里，让我去上学。

记者：您2000年“我是地球”说，说这个美国孩子有着特殊背景的外国中

家孩子，您作为父亲就把他放在大庭岛绿色网络里，这是为什么？

高见：我是孩子，我觉得这更像是发动了孩子，因为我太爱他了，所以我想把这个家放在这里。

记者：您说，听说您自称“高见”？

高见：本身我就爱唱歌，读了这书和人的精神很好的方式是唱歌，所以我想叫我唱歌。

记者：您在10年的植树过程中，您最艰难的是什么？

高见：10年中体会是辛苦，我在一年中70%的时间在日本筹集资金，20%的时间在中国。1990年时我在大庭岛参加了100—120次左右。

记者：您的日记是150页的，可您说打字的日记比之一大半，很多人是受您日记的感动而加入的，您在日记中写到的这些辛苦(日本人称其为“泪痕”)，是这样？

高见：(笑)这说太难听，我的日记在网上上传，我每天对每个电子信件都有答复，最多时每天有150多件，至于有多少来信我没数清楚了。

记者：您常做环保的日记吗？

高见：我不写，因为我写完后就记忘了。

记者：您的孩子知道自己的日记吗？

高见：我有两个儿子，一个28岁，一个23岁，我想他们不写，因为他们还写我这件事(指植树)，因为为写事。

记者：您对儿子不写这种烦恼吗？

高见：不，在我小时候家中很穷，我父亲常对我说，自己的事决定了，就靠自己干。所以我常想他们能用自己的见解做事。

记者：您每年都在植树，在家中您是否也干？

高见：我常做。

记者：听说您体力很差的，您是怎样克服自己的，您是怎样克服自己的？

高见：(伸开手和比划)我干完后就觉得很疲倦，但我觉得很值得。

《好》。(像资料带全部是高见自己的录像带在日本卖4000日元，约合240元人民币，所得全部用于植树)。

记者：您在绿色网络中收到很多来信，能和我们说说吗？

高见：最好是说接受爱结婚的过程，可是什么来信了？为什么来信了？

记者：您说最好是接受爱结婚的过程，能和我们说说吗？

高见：最好是说接受爱结婚的过程，能和我们说说吗？

记者：您说最好是接受爱结婚的过程，能和我们说说吗？

高见：最好是说接受爱结婚的过程，能和我们说说吗？



高见邦雄先生(左二)在植树现场。

新闻背景

绿色地球网络

这是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由美国绿色建筑组织的民间社团，专门从事中国的环境合作。成员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家庭主妇科技专家、商人等。

该组织从1992年起在中国开展合作绿化活动，不断派遣绿化专家来华指导活动。先后投入大量经费建起了4个不同类型的示范基地，生产、地种、绿化、生态等多种类型的。目前，大同绿色网络已建起了100多个植树点。

另外，为促进绿化工作的深入开展，日本绿色网络组织还成立大同绿色技术者300多人，辐射到各个乡、村、10年来，这个组织还积极开展绿色科技工程，先后为大同的绿色网络建起了3个“希望果园”，为当地居民生活解了燃眉之急。

日本绿色地球网络组织为大同争取了多次的日本政府和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援助，会员已帮助大同植树6000人。

高见邦雄简介

高见邦雄先生是日本第一批开展绿色环保运动的日本友好人士之一。1992年开始，高见邦雄与我国环保界、民间环保组织“黄土高原植树队”及“热干年七彩虹工程”10余年。高见邦雄先生每年有1/3的时间在中国，他组织了大同绿色网络的一个成员，与当地居民共同植树。高见邦雄先生，制定了在黄河流域“环保战略”，并组织了多次环保活动。他还在日本各地奔走宣传，参加日本各界对中日环保合作的具体落实。目前高见邦雄先生已筹集到资金1700万人民币，全部用于大同的绿化事业。在绿色网络和“大同绿色网络”的共同努力下，日本绿色地球网络100多，在37000亩，高见邦雄先生已筹集到资金3000万日元，用于绿色网络建设。

由于高见邦雄的突出成绩，2001年，他被授予“大同绿色网络”（专门用于对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受到了高见邦雄、钱其琛等国家领导人的赞扬。

人物故事

高见邦雄的“吝啬”

高见邦雄毕业于日本名牌大学——东京大学。高中时他就靠做家教挣钱。一些日本企业高薪聘请他，但他都拒绝了。这不是说他没有钱，而是他有着强烈的职业观念。高见邦雄的工资加房租相当于一个日本普通职员的工作。高见邦雄在日本的资助概况如下。

高见邦雄没有汽车，在日本每年植树资金的两倍都和植树有关。为了养狗，他不过过任何一件奢侈品。他帮助过很多中国学生，但从不收他们的学费。仅此一例，就使得他节省9万多日元。

高见多被批评到中国，但高见并不以为己多花一分钱。住在他家及家中，早饭后只花一两元了事。大庭岛的日日月里，他和老伴一起吃住在一起。农村的老乡们都称他为“老高”。十多年的植树经历，使他积蓄了一些财产。高见邦雄说：“一些北京人都很崇拜高见的大同乡话，说他不‘吝啬’，‘好不是’。他都说得上高见。”

高见邦雄的“固执”

10年间，高见先生建造了大同的山山水水，以及了解当地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状况。他因地制宜制定绿化方案。

高见对植树的热情远远超过了植树的热情。每次的选址都亲力亲为，完全不照顾别人的感觉。在选址时他常带着3名日本专家从晨曦时开始，直到夕阳西下。再从山岗前往土路上另一座山，在选址的4天中，最早的一天太阳公路边已是晚7时。跟他走在一起，我们既佩服又佩服。高见邦雄于也。可是，第二天他依然带着3名日本专家，沿着同一路的地方向两座山走去。高见邦雄已是46岁的人了。

1994年4月，高见邦雄到灵丘考察了3英里。他提出到最偏僻的村里去看看。多原什么也不了解。他出于一种农民的自尊心，把最偏僻的村子“高见”给外人不认识。高见邦雄说：“我们同路上来，不要说话，说话会去。一起到附近的市委的市委去。高见邦雄说：“只好到那里了。高见邦雄打心不愿去。高见邦雄说：“我们几个年轻人能送你，要让你到村中去看看吧！”



图：《大同晚报》上刊登的报道

受吧。不过有趣的是，年底评比报道的 10 大人物时，我被选为第二名。当然我的“傻瓜、酒鬼”也给叫开了。

第二年是《大同晚报》创刊 10 周年纪念日，我又有幸当选为“10 年报刊 10 大人物”，本来是件光荣事，可这“我是傻瓜和酒鬼”的卖点怎么好到处跟人炫耀呢？

恋爱、结婚、育子

2002 年 4 月，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在北京举办了中日青年环境保护合作论坛，并安排了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的会见等一系列盛大庆典活动。因为不习惯，我感到有些疲劳。

在论坛上我做了如下的发言。

如果给我讲的内容起个题目，不妨叫做《恋爱、结婚、育子》吧。今年正值日中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在这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大家谈论更多的是“友好”，举杯庆贺。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历程，感触颇深。我觉得“友好”和“恋爱”很相似，往往是在并不很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产生了激情。不了解对方的缺点反而不错，只要双方心情都好的时候在一起就可以了。

可是种树养树就不同了。麻烦的是树是有生命的，一旦枯了就无法起死回生，因此来不得半点儿疏忽。培育树的过程很长，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也很枯燥乏味。如果希望它长得快点，拔苗助长又适得其反。那么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肯定是不行的。一年中有 4 个季节，必须不误时节地抓紧作业。就某项实验而言，有可能会因为瞬间的耽搁就得再等一年，所以是在和时间赛跑。

虽然和合作伙伴的关系非常重要，但对方并不一定是你的意中

人。因偶然的相遇或是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但是在很多方面双方互相并不了解。对着镜子照照自己的脸，觉得自己也该有自知之明，应该有意识地努力去深入了解对方。不应该只了解对方好的地方，还应该相互了解对方的缺点，取长补短。越是在痛苦的时候越要相依为命、相互扶助。只有同甘共苦，双方的感情才会更深。

如果把“友好”比做恋爱，那么育树就好比维持婚后生活，养儿育女。热烈恋爱的结果会有孩子，即便有时是“计划生育”失败的结果，男女双方也已产生作为父母应履行的长期责任。种树也是一样，不能光种不管。尽管恋爱、结婚、育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阶段，这一点我们必须意识到。

在我们实施的项目中，有的地方举行盛大的开工仪式，邀请政要出席，并建造了非常漂亮的纪念碑。这对烘托“友好”气氛虽然大有帮助，但是其中大部分种树本身却没有成功，令人不可思议，也可能是因为对不同的性质缺乏充分认识。从那以后，我要求所有的开工仪式都搞得简单些，纪念碑也修得小一些。

将来绿树成林是最高最好的纪念碑，其他的东西没有也无所谓。形式主义对绿化有百害而无一利。（中间省略）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干部多次来视察我们的合作项目点，日本政府和政府援助项目的有关人员也多次来过，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对双方的合作关系，很多人都说“真令人羡慕，你们是怎么建立起这种关系的？”林业厅的退休干部相马昭男先生在两年里和我一起在大同逗留了100天。他向前来参观的人介绍说“这个项目最可贵之处在于不仅把树种在了大地上，同时也种在了人们的心里”。我非常高兴。

我和直到昨天还在会场的祁学峰在一起工作了8年。我们像兄弟，更像夫妻，坦诚相见，真心实意。实际的工作都是大同的青年们做的，我也是他们教育出来的。应该表彰的是他（她）们，而不是我。

我出席昨天的表彰仪式，觉得很惭愧。今天也应该是他们站在讲坛上做报告。

工作开展初期频繁的人事变动令我非常头痛，但我现在仍然认为选择共青团作为合作伙伴非常好。一起在农村同吃同住的共青团干部在这 10 年里不断提升，成为县、区的领导干部，正是他们全力以赴地支持着我们的合作活动。

我讲的内容也许不太适合今天的场合，好像饭后又在酒馆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时说的话。但这是我从经验得出的发自内心的感受。如果能对各位起到一点参考作用，我将感到非常荣幸。谢谢各位。

在实际发言中，我中间省略的内容有很多是让主持人提心吊胆的部分，大都是“作为异质分子‘掺沙子’”的内容。我的发言多次被掌声打断，能够得到中方与会者的支持，我非常高兴。会后很多人和我握手时都说我的发言很精彩。

第 8 章 终于初见成效

1999 年 7 月，我们去浑源县吴城乡查看果树。我们为这个乡村振兴建设小学附属果园是在 1995 年的春天。我们在 5.3 公顷的土地上栽种了 4500 棵杏树。而该乡在以后的几年中开辟了 400 公顷的果树园，栽种了 30 万棵杏树。

在该乡栽种杏树的同一个时期，整个大同掀起了种植杏树的高潮。政府鼓励种植这种最适合干燥和寒冷地区的果树。一时间到处都出现大面积的“仁用杏基地”，现在大部分的地方只剩下了纪念碑。在我们合作的项目中也有失败的。

失败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因冬天被野兔啃光而遭受致命打击；有的是因为连年暖冬发生蚜虫灾害；还有的是因为嫁接了假苗被农民拔掉。

托尔斯泰曾经写道：“幸福的家庭，幸福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不幸是各种各样的。”

成功的原因都是一样，失败的原因各有不同。要想成功，只有严格遵守基本原则，跨越一个又一个难关。但是失败却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

吴城乡的杏树栽培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现场，我们看到树与树之间，树枝已经连在一起，树枝修剪得整整齐齐。为防止野兔啃树皮，根部涂着白灰，而且每年都涂。如果有遗漏的地方，树皮就会被野兔啃掉，真可谓“见缝插针，无孔不入”。于是农民就用方便面的空塑料袋缠在树上保护。正因为每件工作做得到位，才取得这样的成果。本来应该在 1998 年就可以有收获了。但那一年花谢之后天气骤然变冷，冻害使幼果夭折，结果一无所获。这一年，这一带的农作物——



图：硕果满枝的杏。比谷子、黍子的收入高 4~5 倍，也可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浑源县，1999 年 7 月）

获得了大丰收，可是改种了杏树的吴城乡可就惨了。我一直担心，如果 1999 年也无收获，岂不前功尽弃？

听了他们的介绍，我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1999 年杏树获得大丰收，全乡的杏树收入达 100 万元以上，收入高的农户达到一万元，数目相当可观。树长到这个程度，野兔和虫灾的影响少多了，管理也不用太花工夫了。

1999 年是大同大旱之年。虽然 7 月中旬下了 30 毫米左右的雨，但在之前滴雨未下。玉米没长到一米就已经抽穗，20 厘米高的马铃薯开了花，见此情景，令人痛心不已，收获已经全无指望。而且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不得不实施空中撒药灭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杏树却获得了丰收，乡里的人们体验了和去年完全不同的心情。

遗憾的是我们来之前的几天收获已经结束，树上只剩下零星的果实。最近吴城乡作为实行退耕还林的典型，不仅受到省里，而且受到全国的瞩目。

开始变化的村庄

吴城乡的杏树在 2000 年也获得了丰收。基本种法是一亩土地种 55 棵杏树，那一年每亩地收获了 100 公斤的杏仁。每公斤按 10 元计算就是 1000 元。

这种杏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以使用杏仁为目的的品种。敲开果壳，里面柔软的部分是杏仁，可用做药材或烹饪调料。作为药材有镇咳祛痰等广泛用途，在中国还用于制作饮料和点心，也可炒着吃。在日本，杏仁豆腐是为人熟知的中国甜点。

在种杏树之前，该乡一直种谷子、黍子和马铃薯，这些农作物每公斤只能卖 2 元钱。马铃薯 5 公斤折算 1 公斤粮食，每亩的收成最高是 100~130 公斤，换成现金是 200~260 元钱。

因改种杏树收入提高了 4~5 倍。现在杏树还比较小，再过 3 年，产量起码还可以增加一倍。

种杏树的成果不仅仅是得到了钱。当相邻的杏树长到树枝相连时还可以减少水土流失。大家不妨想像一下下雨时走在森林里的感觉，雨水落在树叶和树枝上，顺着树干流到地上，再沿着树根渗透到土壤里。雨水不直接冲击地面，地面也不会形成水坑。杏树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一样的。

要想让杏树结出好果子，每年必须剪枝。剪下的树枝用做燃料，农民可以不再烧附近的灌木，这对恢复植被多少起到一定作用。过去谷子和黍子的秸秆也被当做燃料，现在这些农作物的副产品用于堆肥



图：联合国环境计划（UNEP）友谊大使、著名歌唱家加藤登纪子视察硕果累累的杏林。（吴城乡 2004 年 7 月）

重新回到田里。过去因水土流失陷入了土壤愈加贫瘠的恶性循环。由于种了杏树，这种情况得到遏制，今后会逐步朝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支持教育、培养人才，起到一举多得的作用。今后的发展，令人充满期待。

广灵县杨窑村的变化更快。该村的果树园始建于 1995 年，种的也是杏树，但与吴城乡相比，成绩逊色一筹。两个地方的土地一样贫瘠。吴城乡采取集中管理给杏树施肥，而杨窑村只把种杏树当做一项副业，再加上果树用地离村较远，所以也不给果树施肥，管理上也无法和吴城乡相比。

杨窑村的杏树从 1998 年开始结果，当初他们并没有新种树苗，只是在原来的土杏（当地原有品种，果实小而苦涩，无经济价值）上嫁接了仁用杏。现在新种的杏树也开始结果了，但数量还不多。

尽管情况如此，我为什么还说这个村子变化最快呢？原因是当初我们在那里开始合作项目时，县政府觉得“外国人都来援助了，我们却总是这么落后，太栽面子了”，于是决定在该村搞扶贫工程。为帮助贫困村自立，政府投入资金，建立了砖厂和养猪场。

在村子北面建造的砖厂可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雇工报酬是每天 20 元。因冬季土和水都会冻结，所以砖厂不是一年四季都开工。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获得可观的现金收入。

农户基本可以实现粮食自给。每当有了积蓄，农民首先考虑的是修建新宅，这一点似乎世界相通。土窑洞被扒掉，新瓦房取而代之。村里原有的宅基地已经不够用，新房子一直向西扩展开来。农户家里也有了彩电等一些电器用品。

砖厂的劳动时间比较长，男人们一大早出门，回到家已是晚上 8 点多钟了。农村妇女在田里劳动的机会增多了，孩子们也经常帮助家里干农活了。这种变化是好是坏，还有待时间来证明。

村里的年轻人对我说：“这些都多亏了你们啊。”但我说：“我们帮你们建的只是杏树基地，不是砖厂。”可他们说：“正是因为你们的到来，砖厂才跟着来的。”也许我们的工作多少起到了挖渠引水的作用，不过我还是觉得受之有愧。

有了这些小产业，村里也发生了变化，不再需要出去打工了。有收入做后盾也可以逐渐摆脱依赖放牧的状况，从长远看有利于森林的恢复。关键是在哪个环节切断环境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

开始生长的松树

从 1995 年春天开始，我们在大同市北部的大同县、阳高县开始了油松、樟子松的造林项目。项目规模大小不等，筹集资金较多时，一个绿化点的面积达 100 公顷以上，资金少时面积在 20 公顷。尽管如此，7 年之间我们在两个县建立的规模在 150~300 公顷的绿化项目就有 4 个。以后，我们又开始在新荣区、左云县、浑源县、灵丘县等开展了同样的项目。



图：像草一样弱不禁风的松树苗（桥本摄影）

所种树苗为二三年生的苗，地面上的高度最多也只有 10~15 厘米，像是小草，弱不禁风。不过苗小成活率反而高，成本低，种起来也简单，所以一般在山上和丘陵地带种树用的都是小苗。

基本做法是沿等高线挖一条宽 40 厘米、深 20 厘米细长的沟，把挖出的土堆在沟的后半边，修成宽 40 厘米、高 20 厘米的堤埂，这样，沟和堤埂加起来就形成了 40 厘米高的土墙。沿土墙栽种小松树苗。用语言表达起来有些难度，也不知道这样解释大家能否理解。

平整土地最好在头一年 8 月之前完成，因为这个时期雨水比较充沛。沟和埂可以挡住雨水，使雨水渗透到地里。9 月份气温降低，可抑制水分蒸发，10 月份土就上冻了。第二年春天种下树苗后随着气温回升，冻土开始解冻，树苗得以滋润。这种方法叫雨季整地，对提高成活率非常有效。

从 1999 年开始，我们在土粒很细的黄土丘陵种树时，往树坑里掺放沙子。栽好后浇水。如果以后再补浇一次最理想，但是很难做到。1999 年和 2000 年是大旱之年，种树的地方多半是丘陵和山地，附近的庄稼基本上颗粒无收。很多地方基本上没有耕种，即便是播种了，大多没有发芽或枯死。在连饮用水都困难、眼睁睁看着庄稼枯死的状况下，我怎忍心让他们给山上的松树浇水呢？

早年容易发生严重蝗灾。虫卵不喜欢湿润气候，雨水多就会腐烂发霉死掉，但适合干燥气候，干旱年份所有的虫卵都会孵化。多的地方每平方米的蝗虫多达 600 多只，无论是松树还是杨树、沙棘，统统无法逃脱。一到此时，就连大同市内都飞着蝗虫，即使空中喷药也不能驱尽。

种下的松树苗在最初几年要把树苗埋在土里过冬。冬天干燥的西北风很硬，如果让苗木裸露在外，就会因失去水分枯死。同时通过掩埋的方法也可避免野兔侵食。

第二年春意盎然时节，把树苗周围的土扒开。树苗刚被扒出时颜

色发黄，看着有些不放心，但过一周至 10 天左右，树苗就开始变绿了。冬季时树苗处于休眠状态，不需要光线。每公顷土地栽种 3300 棵松树苗，100 公顷可栽种树苗 33 万棵，想起来都觉得脑袋发晕，而且要连干 3 年。



图：樟子松从第五年开始长势加快（大同县，2000 年 8 月）

松树早期生长十分缓慢，需要花大功夫克服各种障碍。武春珍所长跟我说：“能不能种一些大苗？哪怕一小部分也可以，树苗长得太慢了，上面来人视察，绿化团的人来参观都没法给人看，连照片都拍不上。”

我反驳说：“这完全是本末倒置，随着时间过去，树苗自然会长高。我们还是在管理上多下点功夫，别让辛辛苦苦种的苗死掉。”

2000年4月，我陪同东京大学大学院の鈴木和夫教授、林野庁の退休干部相馬昭男先生去了大同县金山寺的植树造林点。1996年种的松树已经长到高60厘米左右。根据对附近遇驾山的调查，樟子松在第六年以后每年都会长20~40厘米。枝条也同时横向生长，纵目看去，绿色连片。

鈴木先生说：“长到这么大就放心了，你就等着高兴吧。”我说：“还不能掉以轻心，树根还有可能被老鼠吃掉枯死。”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的性格过于乖僻，但听到鈴木先生那么讲，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环境林中心的扩大

1995年动工的环境林中心发展一直都很顺利。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我们遇到了能人。第一任经理是曾任大同青年旅行社副经理的邢雁俐。她工作能力强，同时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

一开始我们无偿借用了属于村里的3.5公顷果园，不仅如此，水和电也是免费使用，当然这一切都不能大声对外宣传。在耕种苗地时，村里给派拖拉机时还外带司机和燃料。总之，是完全依靠人家村子起步的。

环境林中心的地点和其他项目的条件完全不同，交通和水电方面都很方便。大同近郊农村的周边到处是菜地，土地之肥沃令人难以置信。稍有疏忽，苋菜和灰菜和杂草就会长成一人高。环境林中心最初

的艰辛是和杂草做斗争，有时是用手拔草，有时是人去收集拖拉机放倒的草。

这种时候邢雁俐总是站在最前面。大同的最低海拔也在 1000 米，日光非常强烈，到外面待一会儿皮肤就被晒黑，我就曾经几次暴过皮。在拔草过程中，这位过去担任旅行社副经理的邢雁俐晒得黝黑。由于以身作则，她在环境林中心赢得大家的极大信任。中心的职员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邢雁俐的卫队。

2000 年 3 月 18 日清晨，我和远田先生一起抵达大同后直奔环境林中心。一个震惊的消息正在等待着我。中心周围的土地正在被收购，将于当天下午在太原签订收购合同，收购方是焦碳厂。土地如果被他们收购，环境林中心就会遭受致命打击，5 年的心血将付诸东流。

环境林中心周边都是以生产蔬菜为主的近郊农业用地，如果焦碳厂进来，势必带来负面影响。听说对方正在交涉，并自诩是环保设施。村里的负责人对我们提议：“你们是否能够取代焦碳厂购买土地使用权”。

我和远田先生商量了一下，又通过电话和立花代表取得联络，最后决定购买。立花先生说：“现在利息这么低，由我来借钱购买也没关系。”我高兴得热泪盈眶。

就这样，环境林中心的面积一下子扩大到了 20 公顷。我们用 26.5 万元购买了 20 年的使用权，折合日元为 330 万左右。这个价格不足市场价的十分之一。购买本身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太大的负担，但是怎样完善、利用这 20 公顷的土地却是很大问题。

当前，中国大兴绿化事业导致苗木供应紧张，价格高涨。我们自己苗圃生产的苗木除留出自用的部分外，其他全部卖光了。中心的员工们也认为，只要扩大规模就可以建立经济自立的基础，大家干劲十足。虽然是身不由己的扩大，但只要对策得当，反而可以转为新的飞跃的契机。

面积扩大以后，中心的全体职工和 20 多个季节工开始忙碌在新扩大的区域，尽管是计划外扩大的面积，但还希望尽可能多加利用。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认为合作事业本身已经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可以依靠自身的活力开展活动了。我不想站在前面指手画脚去阻挠，只想静观他们的行动。结果，资金方面的压力日益明显，我也只能千方百计想办法了。

花钱买罪受？

意想不到的事情导致环境林的扩大。在办理购买手续等其他事情上，新上任的大同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郝军生发挥了作用，但是小武却显得不太高兴，说：“这是花钱买罪受。”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过去的中心是邢雁俐拼命经营的，通过她这层关系，什么事都依靠当地的村里。用远田和桥本的话说，邢雁俐是“中心的妈妈”。要自立就是要脱离这种庇护。当然这需要用钱，如水费、电费、拖拉机使用费、土地税、农业税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让小武头疼的问题。环境林中心有一块地原来是小老树林，1986 年前后砍掉后改为苹果梨果园，在它的西侧是老早以前就有的杏树果园。杏树是老品种，花很漂亮，但是果实又小又涩，没有经济价值。由于管理疏忽，杏树林里修建了好多坟墓。

决定扩大中心时我们去确认过边界。令人吃惊的是在前一年又增加了 100 多座坟头。一问中心的员工才知道“3 天就有一次葬礼的队伍通过，多的时候一天有 3 次。”坟头虽然没占中心用地，为抄近路，送葬的人们都从中心穿过。这个问题令我十分棘手。

“村里有人过世了，明天要埋葬。”

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去坟地走了一趟，不禁大吃一惊。过去我也多次看过坟墓，一直以为棺材埋在并不很深的坑里，然后在上面堆上

土。

但眼前的坟墓远远超出我的想像。首先是垂直挖宽 2 米、长 3 米、深 3~4 米的坑，然后两边各挖一个侧室，用于埋葬男主人后为夫人准备的房间和埋随葬品。规模虽不大，但布局和十三陵的地下宫殿相同。

看到中心用地边儿上有几个人影，过去一看，原来是挖墓穴的人。一次挖了 8 个。据当地的风水先生说“这儿的风水好”。周围是大田，杏树还开花，从环境上来说当然是最好的。据说外村的人也到这来埋葬。如此下去，这儿可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墓地了。小武说：“村干部就害怕出现这种事，所以才把这块地推给我们。”



图：巡视环境林中心苗圃的武春珍所长。抱怨“花钱买罪受”的她正在努力争取自立。（2000 年）

“可以把风水先生召集起来，劝他们另找地方。”我说。

“你知道有多少风水先生吗？”小武对我好像过分随意的想法很生气，“葬礼上要放烟花爆竹，每逢清明节还要烧纸钱，真担心发生火灾。”但面对死去的人，大家容易感情冲动。我们又怎么能挡住送葬人，不让人家通过呢？

“可以在中心用地和坟地之间修一堵墙，但留出一条通道，这样不通过中心就可以到坟地。”我劝说小武。这样一来，育苗的面积要减少，修墙还需要花钱。

小武一脸不高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那要花不少钱呢？”

不满归不满，她还是和村里的干部进行了交涉。

回来后她向我通报：“对方不让留通道，说国家政策不允许土葬，如果留出通道就变成公认的墓地了。那样村里反而不好办。今后村里负责墓地的管理，只允许扫墓，禁止再建新坟。”

原打算做出最大限度的退让，由我们负责出资修建围墙和道路。没想到会得到如此难得的结果。提出这样的方案，那我就成了谋士了。还有人真这样想，其实不然，请不要误会。

“自己养活自己”

环境林中心的面积一下子扩大到了 20 公顷，在其后的一二年期期间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使所有地都能实现灌溉，首先我们修了水渠。同时又申请利用日本外务省“草根无偿援助资金”，打了一口 140 米深的水井。在这一带地下水位每年以 2~3 米的速度下降，对打新井控制很严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市长本人的批准，动工打了新井。第二年，打井审批制度更严了，据说我们那次是最后一次机会。

在这样一个缺水的地方，我们不能随意用水。打井的同时，我们还 在中心里面建设了一个通过土壤净化的污水处理设施，将附近矿区

的生活污水处理后用于灌溉。我们请大阪产业大学菅原正孝教授到现场来,并得到环境技术研究所的帮助,混浊的污水变得很干净。因为外来参观者很多,想必成为参观节目中的最引人瞩目的项目。

我们从德国 ODA 项目建设的杨树研究所引进了 40 多种杨树育苗,又从日本的王子造纸公司要了 39 种杨树,在中心的一块角落里建立了杨树示范园。

同时,包括在灵丘县天然林发现的树种在内,我们又收集了适合大同地区的树木,决定建设一个小示范园,目前正在进行整地工作。

在硬件方面完善后,整体技术水平的问题就显现了出来。日本专家不断提出改进方案,对我们的要求也高了起来。大同事务所正在全力以赴来弥补这些差距。

扩大面积时附带了一栋砖房。表面上看起来很破旧,但结构很结实。我们将表层贴上瓷砖,内部做了装修,这样一来比中心的管理设施还漂亮了。他们计划在这里开办林业学校。每年计划培养 50 名学员,还修了一个能容纳这么多人的教室,同时正在拟订从各大学聘请讲师的计划。利用中心的苗圃实习,通过这个过程还可以重新发现中心及各处项目点所需的技术人才。当地能够提出这样的计划,令我大喜过望。

观念也在开始发生转变。现在武春珍所长提出“自己养活自己”的口号,并正在努力实现经济自立。最说明问题的就是开始“制造”土壤。日本专家曾苦口婆心地强调过改良土壤、堆肥的重要性,但是过去都没有引起过重视。在我们逗留期间即使按照我们的要求做了,我们一走就放手不管了,数量比例上也大打折扣。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用拖拉机拉了 50 多车牛粪等肥料,做了大量的堆肥。中心的土壤颗粒太小,不适合某些树种的育苗,他们就用运煤车拉了十几车的沙子,进行土壤改良。

购买了 20 年的土地使用权,深知今后至少 20 年要依靠这块土地

养活自己。他们已经意识到，改良土壤不仅关系到今年的育苗，还将关系到今后 20 年的育苗事业。想到这里，我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一句话：“无恒产者无恒心”。^①

^① 此为孟子答滕文公问国策时的一段话，意为：若民众连基本生活都无保障，哪里有工夫来奉行礼义呢。

第9章 何谓富裕？

这还是六七年前的事。绿化团的成员问我：“农村人到底什么时候干活？”

我一时语塞。不过想想看，这么问也不无道理。

农村一般是在一早一晚干活。如果住在县里招待所是接触不到这些的。当我们坐车进村时，农民已经干过一阵活儿正在休息，等我们坐车离开村时，他们才又开始去田里干活。特别是夏天烈日当头的时候是不到田里去的。在我小时候日本的农村也是如此。

于是我想哪怕是一个晚上也好，最好能让绿化团的人在农家住一宿。在大同事务所的奔走下，几年前我的愿望得以实现。对农民来讲，接待绿化团住宿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农民们没有多余的房间给外人住，为腾出一间屋子，家里的一些人只能到亲戚和朋友家去住。

为防止发生意外，公安人员和一些干部不休息，轮流在村里巡逻打更。不过，次数多了也就渐渐地习惯了，现在不像一开始那么精神紧张了。

2001年夏天，我住在大同县中高庄村的农家。利用晚饭前的一点空隙，我独自溜达到村头。这时看到很多中耕的农民扛着锄头从各自的田里往家走，也有的人坐着驴车往家赶。我就冲他们喊：“你好！”他们报之以腼腆的微笑。

在村头有一个打谷场，500多平方米的场地平平整整，很适合在这里做游戏。小学校十几个低年级的学生对唱着正在玩游戏。我观察了半天也没搞清游戏的规则，只好甘居局外了。

这时，一个老婆婆叫着孙子的名字：“吃饭啦。”男孩儿回答：“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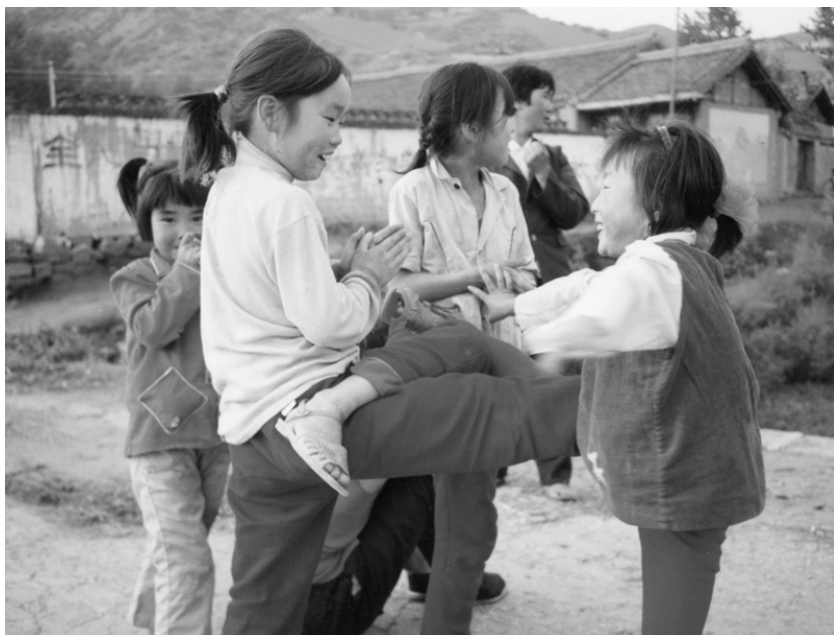


图：在农家住宿后回到集合地点。虽然只住了一宿，和当地人的感情更加深厚了。（大同县，2000年9月，桥本摄影）

吃。”估计还没玩儿够。老婆婆又说：“那就不给吃啦。”男孩儿回答：“不吃就不吃。”看着眼前的情形，我朦胧了，一时搞不清眼前的一切是现实，还是我儿时的记忆。尽管如此，在一起游戏的伙伴们还是一个一个地走了，直到一个都不剩。

接着又出现十几个孩子，领头的是中学生模样儿的女孩子。他们年龄相差很悬殊，小的只有三四岁，走路还不稳当呢。这样的情形在日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呢？

回头看一眼西边，我惊愕了。透过杨树的枝条，一轮巨大火红的太阳正慢慢地消失在地平线上。真红！真大！别说是在日本，就是



图：儿童是游戏的天才。没有道具，也能自己不断创造出新的游戏。这种情形在日本已经成为过去。（灵丘县，1999年）

在中国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夕阳。当我急匆匆叫着绿化团的人来看时，只剩下半个太阳了。大家异口同声：“太棒了，真是激动人心。”

如果没听过驴叫的人听到驴叫声肯定会吓一大跳。我请喜欢观察鸟的汉语老师池本和夫用拟声语形容一下驴的叫声，他苦思冥想，最后还是没想出来。驴的叫声很悲哀，给人带来伤感。

放牧的羊群回来了。放养的小鸡也回到窝里梳理着翅膀，渐渐地安静下来。

晚饭时我向主人敬白酒，他只沾了沾嘴唇，并没有喝的意思，

啤酒也不喝。我很少见到这种情况。他说：“受苦人不喝这东西。”受苦人，用日语怎么表达呢？翻成“Hatarakido”？我过去生活过的农村曾经用过这个词，不过也可能有人说这不是日文。

雨天对话

2002年9月，碰巧又住在原来那户农家。从北京来的翻译冲着主人就叫“大爷”。主人鬓发斑白，脸被太阳晒得黝黑，皱纹很深。我赶紧截住他的话：“你别这么叫，他肯定比你年龄还小呢”。翻译吃了一惊，一问，主人的年龄比翻译小两岁，和我是同年。

这次主人情绪比较好，和我说了很多话。一起来的是三得利工会代表团，自他们到大同以来一直在下雨。在这之前有40多天没有下过雨了。因此所到之处大家都高兴地说：“是你们给我们带来了雨。”

“如果晚上不好好洗手，疏松一下关节，第二天早上就拿不住东西，关节弯曲不了，受苦人都这样。天天干农活，到了这个年龄就开始闹毛病了。城里人有退休，农民无论多大年龄，只要活着就得干活。

“农活没完没了，没有说干到啥时候了是个头。有勤快的，也有懒惰的。那么是不是勤快了就有回报呢？也不一定。单从表面上看，看不出干的活有什么区别。但是不干也不行啊，这大概也是命中注定的。

“收获黄花菜时是最要劲儿的。早上3点半起床，顶着星星去地里。眼睛隐隐约约能看见黄花菜的花蕾，摘下放进挂在脖子上的袋子里。如果花开了就不值钱了。10点之前必须干完，口袋重了，肩膀和脖子勒得生疼。走回去把它倒到筐里又太费时间，所以也就忍了

“花摘回来后要马上加工。要先熏蒸一下，然后摊开晒干。如果太磨蹭，就会沾上怪味。根本没时间吃饭，连水都不喝一口。有时只吃晚上一顿。在夏天，这样的日子要持续40多天。



图：全家在耕种。没有农耕机械，也没有家畜。身后可见烽火台和长城，对面就是内蒙古（天镇县，1996年9月）

“去年是大旱年，所以价钱卖得还不错，每斤5块钱。今年丰收了，可是价格下来了，每斤卖4块钱，整个收入差不多2000块钱。但是活儿太苦，肥料呀，浇地呀，费用太大，剩不多少。”

黄花菜为夕萱的同类，开花前的花蕾可食用。鲜的黄花菜炒着很好吃，但只有在产地才能享受到那样的奢侈，一般是把晒干的黄花菜泡开后烹调。大同县是黄花菜的产地。最近我在日本的超市看见有卖的，名叫“百合花”。

第二天下大雨，我们只好放弃户外工作。这样一来，又有幸和主人继续聊天了。

“早上好！睡好了吗？汽车喇叭把你们吵醒了吧。这是去大同的汽车，每天一大早出发，午后回来，完了再去大同，傍晚儿再回来。一般是去医院呀、买东西呀，到城里办事的人坐，没有人坐这车上班的。

“今几个天儿不好，正好我也可以歇会儿。对农民来说，也只能是下雨天歇歇，平常总得干活儿。等雨停了，还要上窑洞顶上把土夯实，不然的话就会漏雨。

“你说去年那丫头？那是俺家老闺女。今年也离家到大同的超市打工去了。两个儿子都跑到新疆什么挺远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俺们两口儿了，着实有点寂寞。

“现在这时代，男孩女孩都一样，女孩反而更好。女孩即使离家，一年也要回来几次孝敬我们。男孩子一年顶多回来一次，可能都孝敬丈母娘了吧。

“什么？现在大同农村还有生三四个孩子的吗？俺村哪，如果头一个儿是男孩就不要了，如果是女孩就再要一个。小孩的数量已经少多了，孩子太多养不起呀。

“俺原以为俺村最穷，怎么？还有比俺这儿还穷的呀。别的县俺不清楚，只是听说天镇县更穷，可没想到会那么穷！要说大同俺还会去，天镇嘛，俺压根儿就没想去。

“早上开的那趟汽车到大同，一去的票价是2块，没人会坐这车去打工的。一天打工的工钱是15到20块钱，谁会来回花4块钱坐车呀。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已经增长了几十倍，但是物价也涨起来了。不过我们受苦人的生活没什么太大变化，还是住在土窑洞里。

“年轻时，大约30多年前吧，我也在外面干过活。在煤矿运煤，每天的工资是一毛钱，干满一个月才挣3块，而且到月底才支付，所以手头总是空空的。

“也不能在外面吃饭，太费钱。俺都是拿上玉米面窝头去干活，再让食堂给碗热水，也就凑合过去了。

“去煤矿的途中路过云冈石窟。每次路过时俺都从外面往里望，特别想进去看看。当时门票是5分钱，就是这样也不愿意花，因为挣的钱勉强够生活。俺每次去干活时都要路过门口，看门的人都记住了俺，说‘你是农村来得吧，想看吗？’俺说：“想看。”他让俺悄悄地溜进去。虽然门票才5分钱，可几乎没人参观。

“现在云冈石窟的门票是50块钱吧，是过去的多少倍？100倍？不对，是1000倍！但参观的人多多了。到大同打工，一天顶多能挣15到20块钱，你让他拿出二三天的工钱买门票，不太可能。

“你们从东京来的？飞机是什么模样呀？哎，只要3个小时，那么近呀。机票多少钱？6000块！那么贵啊！我以为五六百块就够了呢。”

供孩子们上学的贫苦农民

天镇县李二烟村是我们搞绿化活动中最贫困的村庄之一。一般村里都有出外打工挣回钱盖的砖瓦房，但是李二烟村一栋也没有。只有一些已经开始破损的窑洞紧紧地趴在黄土丘陵沟壑的斜坡上。有许多窑洞在1995年发大水时土墙上出现裂缝，靠杨树干支撑着。

那是发生水灾那年春天的事了。头一年秋天滴雨未下，强烈的西北风卷起干透的表土。草还没有发芽，没有饲料，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瘦弱的羊儿被风刮得踉踉跄跄。我和王黎杰一起到农家了解情况。一般听到的都是生活如何艰辛。

“上面的闺女小学六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如果是男孩，就让他上初中，女孩子念完小学就行了。”母亲对我们说。正好这时两个女儿放学回家。姐姐的脸通红，眼看着眼泪充满眼



图：村里的小学校。孩子们的求知欲很高，也很希望能继续学习，但村里没有高年级。（灵丘县，1999年，桥本摄影）

眶，之后开始抽泣起来。低学年的妹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奇怪地看着突然哭泣的姐姐。

接着又听说有一个家庭让4个孩子全部接受了高等教育。王黎杰坚持要去看一看这家。我说不用看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说：“城里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辛苦，条件那么好还不愿意学习。我回去以后要讲讲农村的孩子是如何艰难求学的。”

我们去的那家是一个非常破旧的窑洞。大概正在午睡，一个不起眼的小个子男人一边提着裤子一边走出来。

我问他：“你想让孩子们上大学，祖上有读书人吗？”

“我们家代代都是贫农。”

母亲代替不太爱开口的父亲打开了话匣子。

“孩子们都喜欢学习，从学校一回来只要有时间就读书。我们这辈子受尽了苦，如果有可能，想让孩子们走另外的路。把养的羊卖掉，农具也卖掉，把谷子和黍子都换成现金，自己每天只吃土豆。这还不够，最后只好到亲戚那里借钱。

“大儿子从太原工业大学毕业后，在大同电力公司工作。他省吃俭用，把剩余的钱寄回来供弟弟妹妹读书。这样我就好过多了。二儿子也大学毕业了，两个妹妹在太原上大专。大儿子上的是好大学，毕业后又在大公司工作。一般情况下完全可以找一个干部的女儿结婚。可我们太穷，大儿子只好和工人的女儿结婚了。”

我说：“这样才好，如果是不会过日子的干部子女，也不会好好待你们的，还是娶工人的闺女好。”

孩子父亲插嘴说：“你说得太对了，儿媳妇待我们可好了。”

我问：“孩子都到外面去了，你们不寂寞吗？”

回答：“回到村儿里也找不着用得上的工作啊，所以早有思想准备了。”确实如此。

我本来不想问，所有这些不用问我也清楚。我的双亲也是贫苦农民，他们经常对我们说，“不希望你们和我们一样整天像田螺在地里爬来爬去。我们自己这样就足够了，想让你们走另外的路。”但是只能允许一个人上大学，于是就让哥哥把机会让给我这个老二。哥哥尽管也很想上大学，但还是高中毕业就开始工作了，并给我往东京寄生活费。

可是我一入学就热衷于搞学生运动，只上一段时间课，不久便被退学了。我对别人打圆场说：“说我是中途退学有点学历诈骗的感觉，实际上我开始就退学了。”虽然没有在教室里学习，但是得到了在社会中学习的机会，广泛地结交了朋友。很早就和中国发生关系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距离成功的人生相当遥远，但是能有今天，也是

多亏了双亲和大哥。

我自己的每一步都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想法，没有一丝遗憾。不过事实上我还是背离了双亲和兄妹们的期待。我甚至连表面上孝敬父母的事都没有做。父亲死后，孤身一人的母亲说：“你哪怕偶尔回来就不行？又不会遭什么报应。”可我却每天忙于工作，连这一点都没做到。

你也许觉得我的话有点离题，但我通过这些确认了所走过的道路和自己当前所从事的事业之间的关系，感到问心无愧。

我在招待所里一边喝酒一边和别人谈这些事的时候，上田信先生说：“这个事业是你的天职。”人家一说，我自己也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包括失败和错误在内，过去所做的事情以及众多老师和前辈的教诲，这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我今天的铺垫。

上田先生这么说，指的并不是一个被皮肤包裹着胴体的有形的我，而是指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关联、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以及由此发展了关系的我。想到这些，心里就觉得非常坦然、平静、踏实。

如果将幸福数值化

在绿化合作事业的初期阶段，浑源县林业局长温增玉带我坐着森林消防的红色吉普车到各村去考察。从那以后，我开始一个人去村里走访了。我们的植树点大多是位于山地和黄土丘陵的贫困村。

农家里没有茶。因为这里气候寒冷，常绿的茶树不能生长，但又不能奢侈花钱买茶叶。因为没有实物，好像连茶这个词也没有。一般是说“喝水”，拿出白开水招待客人。普通话是“喝水”，本地话是“哈水”，如果喝酒就是“哈酒”。到了县城虽然有茶，但还是说“哈水”。

如果表示特别欢迎的话，会在白开水里放糖。平常做菜时不放糖，糖一般存放在带锁的木箱里。他们把勺子给我，拿出糖口袋让我“多

放点儿”，围着的孩子们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咽吐沫声。接着又从木箱里拿出专为客人准备的带过滤嘴的香烟，也许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封了。

家里收拾得很整齐，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东西。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放在炕角，再盖上一个类似包袱皮的布，还有一张吃饭用的炕桌。没有炕桌的人家就直接把碗筷放到炕上。有刚才说到的木箱子的人家是条件好点的农户。灶堂间放有水缸和装调味料（酱油、醋）的坛子，同时还堆着装粮的麻袋。

火炕旁边有一个灶口，上面放着一口大锅。炒菜、蒸东西、烧开水都用一口锅。有电视的家庭多起来了，但接收信号不好，不一定都有影像。

农家院里、村里的道路上见不到垃圾，越穷的村子垃圾越少。最近才开始看到一些方便面的塑料袋。当他们把从城里运来的西瓜切给我们吃时，小鸡就会跑过来吃我们吐出的瓜子。扔掉瓜皮，小鸡就会群起把瓜皮发青的部分啄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纸一样薄的瓜皮。

厕所是一个2米见方、深1.5米的大坑，没有踏板。大便时背朝角落方向蹲下，屁股冲着坑。一想掉哪儿也不能掉进这里，就越觉得要被吸进去。我先在旁边练习，确认无误后才正式蹲上去。

人家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从没见过茅坑里有手纸，但又不能去现场窥测，所以至今是个谜。看到自己扔下去的白色手纸，“犯人”是谁自是一目了然，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曾经了解过他们一年中所做的农活。春节过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捡散落在道路上的家畜粪。其他季节也可以看到一大早就有人背筐去拾家畜粪。自家里的粪堆上如果来了别人家的小鸡，他们就会扔石头把它赶走。

环境的严峻、生活的贫困状况令我们难以想像。那么是不是当地人都堆缩着一声不吭，悲惨兮兮地生活着呢？事实上并非如此。



图：贫困村里的人笑脸朴实可爱，表情丰富。这个人比我的年龄还小。
(怀仁县，1993年10月)

与日本、特别是城市人相比，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非常亲密。有时甚至会让你觉得有点烦。我离开农村，或者说被农村抛弃来到城市再也不想回到农村，也是因为农村这种亲密的地缘血缘关系让我承受不起。可是在黄土高原这样的环境中，没有这种关系，人是无法生存的。

参加绿化团的年轻人曾经这样对我说：“贫困村里的人笑脸非常

可爱，表情丰富，有人情味。脸上深深的皱纹也觉得好看。如果到城里去做买卖，农村的朴实感就没了。大同和北京都很富裕，可是人们的表情一点儿也不亲切。一想到前面还有大阪等着你，真是不愿意回去。”有时我也这么想。

大学医院的护士中野纪子曾对我说：“为了参加绿化团，申请休长假费了好大劲儿，平常替同事们节假日值班攒假。看到农村人的笑容真是心情愉快，一年的精神疲劳都在这里恢复了。在这儿愉快地度过一周的我和一年到头儿在这儿生活的人，究竟谁更幸福呢？”

“你单身一人，干脆在这结婚算了。”我打趣道。当然，作为客人生活一个星期和终身在这里过日子完全是两码事。后来，她在日本结婚了。

说白了，现在人的幸福感可以数值化，分母是欲望，分子就是实现欲望。不管你的欲望能实现多少，只要是欲望膨胀，就难以逃脱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生活在日本的我们几乎被物质淹没，可是仍然会受到欲望的刺激。国民们不买东西，国家就以恢复经济为名，代替我们乱花钱。

反过来，从原理上讲可以有通过抑制分母获得幸福感的生活方式，中国的老庄思想也许就是这样。我对中国的气功感兴趣，其根本思想就是“恬淡虚无，无为自然”。也许所有的宗教都有共同之处。

我在学生时代一直有一种焦虑感，可能是因为从农村一下子来到东京不适应造成的。当时日本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持久。我感觉是日本一定是在哪个岔口选错了路，本来有一条重要的路径，但却被忽略走到错路上来。现在仍有这种感觉，但是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

成绩驱动欲望

1999 年底，我们围绕着绿化问题在大同农村进行了民意测验。首先我起草了一份提问方案，然后和绿色地球网络的干事及大同事务所的人一起讨论敲定。事务所的人们对此事非常感兴趣，一共在 7 个县 21 个村进行了民意测验，比我原来期待的数量还多。

事务所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这还用说吗？光是提问的大项就有 26 个，此外还有一些小问题，问得很深。发放测验表 950 份，回收 900 份，有效回答 884 份，成绩相当可观。

测验表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种树”。我们将所有村里的总计及与我们关系密切、具有典型特征的 5 个村子的回答作了统计，参见下表。

农民关于“为什么种树”的回答（%、可复选）

	整体	遇驾山	随土营	李二烟	吴城	上北泉
A 可以卖钱	30.8	23.3	19.6	0.0	71.4	80.0
B 自己用、吃	39.8	10.0	39.1	16.0	16.3	84.0
C 防风防沙、防止水土流失	74.6	56.7	54.3	88.0	42.9	72.0
D 美化改善环境	67.6	33.3	52.2	80.0	40.8	84.0
E 行德积善	25.1	6.7	23.9	0.0	6.1	62.0
F 没办法	2.0	0.0	0.0	2.0	2.0	0.0
G 其他	1.0	3.3	0.0	0.0	2.0	0.0

从数字上可以了解到该地区是如何重视绿化对防止水土流失、防风防沙的作用，也从中认识到这种思想正在渗透到农民中。

在另外一项提问中问到迄今为止参加植树的天数，回答 500 天以上的占全体人数 37.7%，100 天以上的占 66.0%。不仅在观念上，还在具体上参加了劳动。

关于“种树目的”的提问，A 和 B 是狭义上的切身利益，对于这

个问题的回答，不同村之间有很大差异。两项合计，上北泉村为 164%，李二烟村为 16%，其中对可以卖钱一项的回答为零。

但是对以改善环境为目的的 C 和 D 的提问，李二烟村的数字最高，为 168%。我们怎么看待这组数据呢？李二烟村的目的最纯，最好。几年前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需要说明的是上北泉村和吴城村都种果树，此外还种了松树。上北泉村早在 15 年前就将陡坡窄地块改造成果树园，成为县里少有的富裕村。吴城村从 1995 年开始种杏树，1999 年开始收获，收入多的家庭可达 1 万元左右。

而李二烟村在大同市也是环境最差的一个贫困山村，人均年收入只有 100~200 元。我们从 1994 年到 1997 年在那里开展了合作，但是效果不好。

失败的原因不是农民的责任，而是县林业局的指导不力。比如说，按照当地的常识，种松树时应避开阳光照射的南坡，在背光的北坡栽种。可是在李二烟村，特意选择了阳坡整地种树。这样种下的树不可能成活，所以成活率只有 18%。

从这种意义上讲，狭义上的切身利益也不可忽视。不，应该说它很重要。从一开始就不期待有利益的项目似乎不能成功。

另外，我们对植树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做了提问。对“付出劳力或其他也没有回报”一项的选择回答参见下表。

关于“植树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回答 (%)

	整体	遇驾山	随土营	李二烟	吴城	上北泉
付出劳力或其他也没有回报	5.7	0.0	0.0	0.0	6.1	24.0

整体的数字只有 5.7%，不满意度不是很高。在 5 个村子中有 3 个村子数字为零。

但是在成果最明显的上北泉村，每 4 人中就有 1 人不满意。尽管是第一年但迎来了收获季节的吴城村也有一些人不满意。那么，我们又怎样看待这一现象呢？

如果没有欲望、希望，任何事情也做不好。如果得到了什么，欲望就会随之膨胀，也许人的存在意义就在于此。何谓富裕？何谓人？很难说得清。

得与失

希望将来在国际合作部门工作的成田茂登子作为绿化合作团的一员访问大同是在 1996 年的时候。可能是过于兴奋，她在灵丘县扁桃体发了炎，发高烧。当地女医生昼夜看护，为她打点滴。一气打了近 20 支安瓿的点滴，真有点吓人，不过效果十分明显。翌日一早，高烧全退了。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体验，宛如魔法的作用。

坐夜火车离开大同前，她边哭边谈了自己的感受。

“我本想为贫困地区的人做点什么，不仅没做成，反而添了麻烦。可是他们对我依然是那么热情。何谓富裕？何谓贫穷？我越想越明白了。”

在当地，自然灾害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春天的风沙、晚霜、干旱；夏天的水灾、冰雹、虫害；秋天的早霜；冬天的冻害；再加上鼠害、兔害和一年到头刮不完的风，就像当地流传的说法“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除此之外，还有多发的地震。

尽管生活这样的环境下，农村人却很开朗。生长在日本青森县津轻的相马先生经常和我们一起在大同活动，他说：“我体验过战前日本东北的寒冷。真是悲惨极了。客观地讲，这儿比起日本东北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但却感觉不到悲惨。这是为什么呢？”我也一直解不开这个谜。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尺子去测量处于两个极端的富裕和贫穷。单方面援助贫困者的形式也难以维持下去。虽然也计划实施项目，但总是担心：这样做行吗？会不会带来副作用？会不会把当地的好东西给丧失掉。

所幸的是我们所开展的合作是绿化事业。绿化是个很不划算的项目，坏的结果立竿见影，好的结果却迟迟不出。但反过来看，效果虽然缓慢，但副作用少，在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思考。而且可以多次地反复。我们生活在物质极端丰富的日本，往往怀疑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已经失去了什么？得到的会不会就是失去的？想起来，也许我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15年前中京大学的河宫信郎先生对我们说过的话至今记忆犹新。

构筑现代都市文明的大部分要素是生物介质。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均属此类。水泥原料的石灰岩是由生物的壳和骨架形成的。由于细菌的作用，铁由水溶性转变成了非溶性，因此才产生了铁矿石。否则，人类就会与铁无缘了。

形成都市的代表性物质，铁、水泥、化石燃料等是经过几亿年生物演变而成的。人类利用它不是生产，而是消费。经过上亿年时间才形成的物质在瞬间利用，理所当然效率很高，但是不久就会用完。核的利用从原理上讲是完全不同的技术，但是放射能无法做到完全隔离。换一个角度看，生产就是消费，得到的即失去的。

京都精华大学的槌田劭先生曾经讲过，就在不远的以前，小孩一发烧，父母就会抱着孩子用身体温暖，等待着靠小孩的自身抵抗力恢复健康。现在只要给吃抗生素和退烧药很快就解决问题了。可是从此以后，以前那种父子之间的亲情也就随之蜕化了。

在我早期的记忆里，有一次父亲抱着我跑了好几里路去看医生。所说的跑，是指父亲用自己的脚跑。那时候，我经常一发烧就痉挛。父亲像念咒语一样不断地对我说“阿邦，你要挺住啊”。比我早生一

年的二哥在出生后不久就死了，排行老三的我，受到了格外的照顾。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比较亲近也许和这种记忆有很大关系。写到这些，我不禁热泪盈眶。

得到什么，同时也会失去什么。人们往往能立刻感受得到时的舒适、方便，但不到彻底失去时却很难察觉。等到彻底失去时甚至会忘记它曾经存在过。

我觉得，人是很可悲的生物。正如在大同看到的那样，只要是挖井灌溉摆脱旱灾，确保粮食生产，大家自然就去挖井。可是一旦尝到了甜头，就再也没有办法后退了。谁也不会想到埋藏在看不见深处的地下水会枯竭。

所有的环境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得到的和失去的，如同硬币的两面同时并存，但是人们容易感受到得到的一面，却很难察觉到失去的东西。

过去我一直认为环境问题是产业革命以后的工业化产物，但是自从往返大同以后，想法发生了变化。大同曾是北魏时期的都城，早在5世纪时就已经是一个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了。我现在认为，从诞生文明那一刻起，人类就已成为地球生态系统的癌细胞。

听我这么一说，立即遭到了大学同学的反对：“癌细胞也有生存的权利。”他们说的也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人类又怎么能够生存下去呢？

延续的生命

那是在绿化合作团乘车去农村时发生的事了。有个从车窗向外眺望的人喊了一声：“快看，这里在过节呢！”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以为是过节，因为那里又放烟花，又放鞭炮，还把拖拉机的拖车搭成舞台，有的人演戏，有的人戴着假面具，有的人拿着麦克风扯着嗓子唱歌。

可是，这是在举行葬礼！为把孩子拉扯大后过世的人举行葬礼好像过节举行庆贺活动似的。举行婚礼是红喜事，举行葬礼是白喜事。中国电影《老井》中有举行葬礼的场面，描写的是有人强迫卖艺的人唱艳情歌曲（故事背景也是山西省）。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各县的文艺工作队都是很健康的。

只要我们绿化合作团访问天镇县，他们就会为我们安排一个联欢晚会，县文工团的俊男靓女们为我们表演歌舞。我奇怪这么贫穷的地方怎么能够养活起专业舞蹈演员和歌手呢？当有一次我看到她们在拖拉机的拖车上演节目，就明白了。

人死了肯定会悲伤，特别是年轻人的葬礼。我不了解情况，有一次想拍照，结果遭到村里人的呵斥。

但是把孩子拉扯大后去世的人的葬礼，说成是白喜事，是一种文化。历史证明以这种形式接受人的死亡，是一种内涵深邃的文化。我想，日本在不久以前也是以同样的形式接受人的死亡的。我在农村长大，曾经以类似的形式送走过我的亲人。

但是，现在的日本已经不是这样了。不管是 80 岁还是 90 岁，死亡都是一件忌讳的事。如果是死在医院，不能从正门抬走，只能悄悄地从后门出去。

死在自己家里，也是一件麻烦事。听说曾经给过我很多关照、我一直敬重的一位人士在自己京都的家里去世后，被认为是不正常死亡，结果夫人被当作嫌疑人，还得接受警察盘问。

一旦死亡成为忌讳的对象，那么延长一天的生命也就有其意义，人们就会掩饰死亡。

我们常说“生命无可替代”。生命宝贵，不言而喻。在个体生命没有得到尊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强调生命宝贵是有其意义的。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生命果真无可替代吗？延续的生命，由儿子传给孙子的生命，在生命的衔接中得以延长的生命……我认为这些

才是真正的生命意义所在。这一切也是我从大同农村的“白喜事”中重新得到印证的。

2000年4月底，中宫寺住持日野西光尊师姑和药师寺副住持的夫人安田顺惠女士等访问了大同，参观了我们的几个项目。他们是我们这项活动一开始的会员，在最困难时期支持我们的最亲近的人。他们动员了国际女性协会奈良的5个俱乐部的成员，对我们的活动一直给予有力的支持。在阪神大地震时，我们还曾一起到处参加过救援活动。

我一激动，在车里用麦克风将上述内容讲了出来。在下车的时候，日野西光尊师姑低头双手合十对我说，“你讲得太好了”。顿时，我像被凝固了一样。惭愧！

第 10 章 只种树不能算绿化

大同市地域广阔。从最北部到最南端的直线距离有 190 公里，北部以黄土丘陵为主，南部以进入太行山的山地为中心，两者在自然条件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从再生森林的角度说，最南部的灵丘县条件最适宜。

1996 年夏天，以立花先生为团长的绿化合作团从北部的阳高县、天镇县到南部的灵丘县进行了一次紧张的考察，最后看了灵丘县上北泉村以苹果为主的果园。立花先生说，“这个果树园的管理人有能力，对植物也很了解。环境林中心能不能把他挖来？”立花先生并没有见过种果树的人，只是看了他种的果园便下了定论。

这个种果树的人在当地很受青睐，名叫李向东。灵丘县共青团早就盯上了他，想把他挖到我们的项目中来。也正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才带我们来参观的。

我把立花先生的意思告诉祁学峰后，他对把李向东调到环境林中心表示为难。灵丘县共青团正在计划以李向东为轴心开展下一个合作项目。另外，李向东只是农民出身，有关果树和植物的知识也只是通过现场的实践和自学掌握的。祁学峰担心他到中心后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不能让鱼离开水。”

我能够理解，在这里，无论干什么，人都是最重要的。立花先生的战略是要在当地建设植物园，以此来带动那里的绿化活动。我们要的不是充满幻想和浪漫的沙漠绿化，而是要在这个地方摸索出一条符合生态的绿化之路。

从自然条件来讲，灵丘应该是候选地。立花先生在那里只看“作

品”便相中一个不曾谋面的人。我当时就觉得立花先生的感觉没有错。

在我眼里，李向东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他喜欢植物，每当话题谈到植物，他都两眼放出异样的光彩，而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我也有类似毛病，但是像他那么极端的人还真少见。

让他去搞人事和理财虽然不合适。因为他不擅长这些，他痴迷的是植物。他就是这样一种人。我想应该发挥他的特长，不足之处由其他人补充。我把立花先生要在灵丘建设植物园的想法告诉了他，并拜托他寻找候选地，对周围的植被做一番调查。

发现天然林

1998年夏天去灵丘时，李向东一边用手势比画一边对我说：“山里有片天然林。”还说了一大串树的种类，并说有一人都抱不过来的大树。我一时难以相信，因为迄今为止还没看到过那么粗的树。

自己没亲眼见过，就不能妄下结论。李向东说：“林子就在附近。”按照他说的我们去找，结果怎么也走不到。问当地的老乡，回答：“还有两里，不远”。走了半天再问，回答还是“还有两里，不远”。如此反复多次，最后走得大家筋疲力尽，无功而返。

不过这一带好像真有天然林。我曾经遇见过背着砍柴下山的老乡，背的砍柴里有栎树等落叶阔叶树。这里的山路，我们空着手都走得气喘嘘嘘，可上了年纪的人背着足有60公斤的柴下山快步如飞。

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一清早我们就向目的地进发。坐车到了山脚下的雁翅村，再往前就只能徒步了。走过遍布鹅卵石的河道，爬过一处又一处陡峭的山坡，单程用了四五个小时，总算到达了目的地。

眼前的景观令我大开眼界。对面山坡上是一片茂密的落叶阔叶树林，其中有栎树、桦树、椴树、枫树、白蜡树、核桃树等。

“没错儿，确实是栎树！令人盼望已久的树，终于找到了。”立



图：以天然林为背景留影的立花先生。身后是茂密的树林，其中有栎树、桦树、枫树等。（灵丘县，1998年8月）

花先生说着，突然加快了脚步。“只大概一看，乔木就有 20 多种，灌木有 40 多种，草有 100 多种”。

远田先生说：“这儿和日本东北的山很相似，虽然品种不一样，但在属类上大体相同，可以断言，树的种类相当丰富。”

我们发现了最大的树高有 12 米，直径有 25 厘米左右。沿着山谷的方向发现确实有一抱粗的栎树。

令人吃惊的是林地。地面堆满了厚厚的落叶和腐叶土，一直埋到膝盖。沿着谷坡，自上而下自然容易堆积。不过，眼前的情形，我在日本也没有见过，大概因为低温和干燥，物质不易分解所致吧。

这一地区绿化的重要目的是保持水土。从这个角度考虑，这种落叶阔叶树最适宜不过。蓄水能力和保土能力比起松树要强得多。但是过去绿化时主要是种杨树和松树，根本没有发挥这些树种的作用。

由于发现了这个天然林，我们的绿化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天然林再生的思路

通过地图，得知有天然林的山名叫碣寺山，海拔 1768 米，属灵丘县管辖，距河北省界不足 5 公里。以后我们又在灵丘县发现了 4 处天然林，但还是第一个发现的最好。

2000 年夏天，我们立项调查植被。分类工作由专家冈田博先生（大阪市立大学理学部附属植物园长）和浪花彰彦先生（北海道大学实验林技师）参与。

我们在北京采购了帐篷、睡袋等野营物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就在预定开始调查的那天开始下起了大雨。由于一直干旱，田里的农作物已经开始干枯，如果再有几天不下雨就会颗粒不收。农民脸上充满了焦虑。也许是农民盼雨的心情比我们搞调查的心情还迫切吧，老天终于下雨了。

雨水冲毁了道路，只剩下一条最长最陡的山路可走，而且所剩时间也只剩一天了。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起程赶路，一路马不停蹄。可怜我刚一上路，脚就开始抽筋。我辩解“可能是因为事先调查一直走路的原因”，高中时代同年级的池本和夫故意挖苦我：“那是因为你每天晚上都泡在酒里所致。”

言归正传。当时我们调查植被的结果是：虽然还不到郁葱茂密的程度，但是树冠覆盖严密，寸草不生。林地里堆积着腐叶土，下面已经变成黑色的森林土壤。

树林的主要树种有辽东栎、其次是糠椴、黑桦、元宝槭等乔木和——



图：克服了千难万险，终于完成了天然林的植被调查，大大加深了对这里植被的了解。（灵丘县，2000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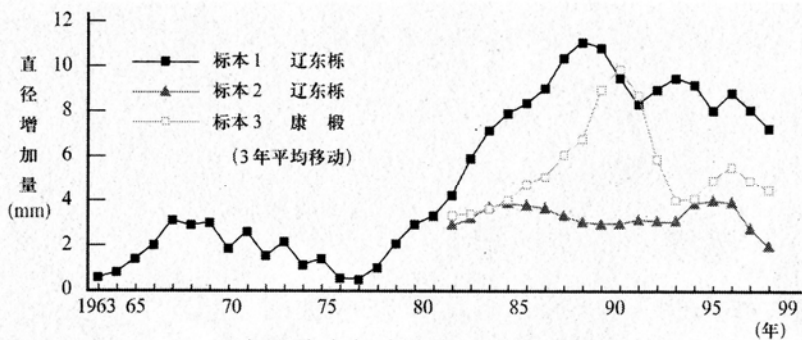
榛子、六道木、锈线菊等灌木。

选择两块区域，进行方形区分株调查。用塑料胶带将周边隔开，对每一个区域里的树种、每棵树的胸高直径、树高等进行测量、记录。我们已经脚力不支，更要命的是山林的坡度有40度，不抓住树枝就可能从山上滚下去。

为了调查树木的成长过程，我们先采伐了3棵树作为年轮分析标本。我们忍痛伐倒了一棵长得笔直、胸径有25厘米左右的栎树标本，用尺子测量了一下树高，竟有8.1米。这片树林的树木基本都是这个高度。

虽然写起来简单，伐起来可就费劲了。树的材质极硬，体壮如牛的周金（植物园职员）马上就大汗淋漓了。浪花先生偶尔替换一下，我只管拍摄现场的情景。之所以这么费劲，据说是因为锯刃太钝。

另外的两棵树，一棵是比刚才那棵直径小一倍的栎树，一棵是糠椴。观察这些树木的年轮，可以弄清许多问题（参见下图）。



碣寺山林木标本直径的历年变化

大的栎树树龄有 39 年，长到直径 3 厘米用了 17 年的时间，而且越往后年轮越密。大概是因为周围树木茂盛，被树阴遮挡影响了生长。

这棵栎树从 22 年前年轮开始变粗，最近年轮的幅度或持平，或下降。也就是说，22 年前左右遭遇过人类的最后的破坏。周围的树木遭到砍伐，而直径 3 厘米的栎树幸存下来了。已经腐烂的树桩可以使你联想起当时的情景。

砍伐过后周围变得明亮，充足的阳光使树儿们如枯木逢春。另一棵栎树和糠椴好像就是在砍伐后周围变得明亮时发的芽，长得笔直，挺拔。

我们从山脚下到山里最少需要四五个小时，途中还有近于垂直的峭壁。看到从山脚下雁翅村来这里砍柴的老乡，真让人惊叹。

但是从那时开始，人们不再上山砍柴了。谜底就在我们登山的途



图：用山上树木做劈柴。老乡背着 60 公斤重的砍柴走在陡峭的山路上。环境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由此可见一斑。（桥本摄影）

中。毛泽东领导的 60 年代，在这个山脚下种了一大片油松，经过十几年后，松树下部的树枝可以做燃料了。如果在村子附近能解决问题，当然不用特意跑到山里去了。因为种了松树，使落叶阔叶树的天然林得以喘息之机。

过去我一直对人们讲，黄土高原森林的消失是来自于人口的压力，文明毁灭了森林。口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始终怀疑如此大规模的破坏难道真是人类所为？

通过对天然林的考察了解到，自然条件确实存在，如果没有人口压力，可以通过自然的自身力量恢复森林。

建设灵丘植物园

考察落叶阔叶树的天然林后，我们对绿化的想法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我们和当地的技术人员讨论这些问题时，他们不屑一顾，认为“那种树没有什么用”。虽然是林业工作者，但是很少有人见过天然林。

这样一来，立花先生的植物园构想就更具有重要意义了。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以当地的树种为主品种多样的森林再生示范园，但是如果拿不出实际的东西，是很难有说服力的。

我们决定在上寨镇南庄村村外建设植物园，那里离碣寺山天然林不远，地形相似，紧靠 108 国道，交通方便。我们购买了 86 公顷土地的 100 年使用权，大部分是山地。根据立花先生“有高低差的地方适合栽种不同种类的植物”的意见，主要选择了海拔 900 米至海拔 1330 米的地段。

主要目的是：（一）观察该地区植物迁移的过程，寻找绿化途径；（二）从其他地方引进有可行性的植物，进行实验栽培；（三）通过多种植物栽培，提高技术，培养人才；（四）建设品种多样性的森林再生示范园。

首先，我们和村里协议，规定禁止砍柴和放牧。同时建设管理设施，派工作人员常驻现场。这种做法马上见效。过去草只到膝盖高或齐腰高，现在已经高到胸部和肩部。品种上，过去只有毛茛科等有毒和带刺的植物，现在增加了胡枝子、苜蓿等一些豆科植物。

山丹是一种当地的野百合，小小的橘红色的花瓣，从远看也很显眼，当初我想只要找到一棵就知足了。3 年后的夏天，山丹已在植物园花开满地，形成群落。兰科的大花杓类也开花了。

在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地方可以生长天然林一样的辽东栎。最大的树高 8 米，胸高直径 15 厘米，树高 6~7 米以下不计其数。每年树



图：用从天然林收集的种子培育了很多树苗。右侧为李向东，左侧第二位是周金。（灵丘县，2001年8月）。

高增长 60~70 厘米。根据天然林的调查结果，这么大的树年轮约为 5 毫米，树直径每年增加 1 厘米。

树长大了树叶自然多起来，落叶也多了，土壤变得肥沃，树的生长速度随之加快。这样就开始了良性循环。相信再过 5 年，植物园一定会成为郁郁葱葱的森林。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有很多由种子发芽的 1~2 年生树苗，也有 3~5 年生的。围起一角进行调查，发现每平方米有一棵辽东栎。植物园的工作人员指着树对我们说：“以前这儿的树都被绵羊和山羊吃光了。”

辽东栎长得茂盛的地方是山北侧背阴处，中国叫做阴坡，南侧向

阳处叫阳坡。阳坡非常干燥，一天当中的温差较大，树木很难生存。但是种小白蜡树却照长不误。它的根系横向延伸，在顶部发芽，呈灌木状扩展，有的地方一处竟有 100 多棵。生长在阳坡的品种在当地还很稀少。

我们没有一味地等待自然生长的品种。李向东带领植物园的工作人员走访附近一带，采集了好多种子培育小苗，工作非常艰辛。栎树果实成熟期每年不同，如果落到地上干了，发芽能力就会减弱，还有可能被松鼠和老鼠吃掉。尽管如此，他们采集了 200~300 公斤的果实。一开始由于缺乏经验，在储藏上出现过失误，现在已基本走上正轨。

周金曾对我说，他年轻时离开村子，在制药厂干过，也在海南岛工作过。现在双亲上了年纪，只好又回到村里。“本来以为这辈子只能干农活到死了，没想到建设了植物园，自己还能参加这项工作。想到自己死后生前种的树还能继续生长，实在是太高兴了。”说着，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竟然流下了眼泪。

他们还在植物园少量地试种了一些其他地方的树种。他们的做法很独特，如果有新品种进来，大家就每个人分一点，每个人都尝试几种育苗方法，而且偷偷地关注着别人的做法。一年之中尝试了好几种育苗方法。

祁学峰在市人大会议上的发言

2000 年 4 月末，为了欢送我们回日本，祁学峰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他在担任副书记时一直陪同我们一起活动，但是自从担任书记以后就难有这样的机会了。仅是共青团的工作就够他忙的了，更别说还兼任着其他的工作。

“在人大常委会讨论绿化问题时，我也发言了”。祁学峰开始讲

起了发言的情况。我和远田先生对他讲的内容都很吃惊，因为当时喝了很多酒，所以过后还是让他把讲话的内容传真给我。在此把传真内容和在大同的谈话情况简要归纳如下：

1. 绿化荒山时应该先种草，再种树。要乔木灌木混种，特别应该重视灌木。

2. 当前全市都在积极参与云冈石窟周边的绿化活动。虽然从旅游的角度考虑有其意义，但那里条件太差。需要在岩石上挖坑，运土，栽大苗，究竟这样是否合适，需要重新研究。我们是种树，不是搞政治活动，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3. 浑源县吴城乡种杏树成功后，提出建设“万亩杏树基地”的口号，掀起一股种果树的高潮。不要忘记，在成功的背后还有很多失败的例子。苗木的质量和农民的觉悟很重要，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就匆忙上马，还会失败。起步时规模要小，等农民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心和干劲再扩大规模为好。

4. 改造小老树是必要的，但如果后种的树生长缓慢，对环境来说就不经济了。不要忘记小老树在防沙防风方面还是起作用的。

5. 对于条件太差的村子应考虑国家出钱进行移民。离天然林近的村子应该整体迁移。如果减轻人口压力，即使不去人工种树，森林也会自然恢复。

6. 应在大同建立培训技术人员的设施。这虽然需要资金，但与绿化投入的大量劳力、受伤的危险相比，费用要少得多，效果也好。

7. “三分种树，七分管理。”我们大家都在强调种树后的管理。实际上许多问题都是在树种下后因人的介入发生的。作为从事绿化工作的人，其首要任务就是宣传植树绿化的重要性和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他的发言确实切中要害。说到防止沙化，在日本立刻想到的就是植树。但是祁学峰对这个问题看得更广。讲话中还涉及到居民的搬迁、村庄的整体迁移，这和当前国家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政策一脉相通。在他的讲话中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只种树不是绿化。

我在北京向团中央的干部介绍了这些情况，他们说：“他讲了这样的话？不会影响晋升吧。不过他既然这么说，应该是有所考虑和思想准备的吧。”

祁学峰提到的项目大部分是市领导挂帅的项目。正因为我多少了解一些大同的情况，所以才更佩服他的勇气。

听了祁学峰的这些话，我立刻问：“反响怎么样？”他说：“了解基层的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市林业局局长感到很吃惊，问我你什么时候学的林业？不过大部分人不太关心，大概是听也没听懂。”

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了立花先生。读了传真上祁学峰的发言提纲后，立花先生说：“我真高兴他能够理解得这么深，看来我没白去大同。”

远田先生也感慨地说：“我一直关心人才培养问题，但只是针对技术人员而言，对政治和行政的重要性没有认识。祁学峰的事情使我感到他做了比我们所关心的事情还重要的工作。”

听到合作对象受到赞扬，我感到比自己受到赞扬还高兴。祁学峰因为做我们的工作，升迁推迟了很久。2001年10月他离开了共青团，出任大同市南郊区党委副书记。

“喜鹊林”

10年来，我们的绿化合作有了相当充实的内容，也引起了国际合作及绿化专业人员的注意。但是，活动内容也开始变得复杂，一般人难以理解也是事实。何况我们还提出“只种树不是绿化”。

参加绿化合作团的人也提出“应该建立一个我们能持续访问，感受到自己种树成果的地方”。

大同事务所方面也希望建设一个自己直接管理，可进行各种尝试的自己的林场，而且目前也具备了这样的实力。

我们将二者综合考虑，在交通便利、方便管理的大同县聚乐乡取得 600 公顷土地的 50 年使用权。

在我们的占地中有条宽 150~200 米的低谷，谷底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沙地下有渗流水。那里可以栽种杨树、臭椿等速成树种。过去我们一直主要种松树，但苦恼的是这些树长得太慢，所以也很想尝试种些短时间能看到绿色的树。



图：村里人说“喜鹊叫，好事到”。喜鹊衔来树枝在住家旁边的杨树上搭起一个大窝。（桥本摄影）



图：实验林场“喜鹊林”中央的低谷。因地形复杂，我们根据具体条件可以尝试栽种各种树木（大同县，2000年9月。）

低谷两边是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丘陵。聚乐乡的面积有 100 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4500 人左右。占地中还有一个鹰嘴墩村，过去有 400 个居民，现在只剩下 20 多人，而且尽是一些老人，无法干农活。

当前中国正在推行退耕还林的工作，这个政策是停止耕种诸如水土流失严重的陡坡等条件恶劣的农田，将其改为林地。这里是实施这一政策的对象。乡党委书记说，“正当我们自己要搞绿化的时候，你们来帮助我们绿化，真是感激不尽。”

在丘陵地带可以试种油松、樟子松等各种树木。我们将灵丘天然林里收集来的栎树种子在植物园里育苗，开始了试种。

中方给实验林场起名叫“青年林场”，同时我们在日本征集了昵称，最后决定叫“喜鹊林”，中方对此也一致表示赞同。喜鹊是乌鸦的同类，身体和翅膀的一部分羽毛为白色，黑白相间，十分显眼。这种鸟在中国北方和朝鲜半岛很多，但在日本只有佐贺县的部分地方有一些，其他地方似乎没有。在日本，喜鹊是国家保护动物。

中国有个传说，七夕之夜牛郎和织女要跨过喜鹊搭的银河桥去幽会。因此，在中国喜鹊作为为男女双方牵线搭桥的鸟很受喜爱。还有“喜鹊叫，好事到”的说法。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喜鹊不怕人，会走到你旁边，在靠近人家的杨树上衔枝搭窝。

我们在日本以5万日元为单位募集合作对象，用这笔钱可以在一公顷的土地上栽种3300棵松树，如果是杨树，可以栽种800棵大的树苗，其中还包含5年管理费。在两年时间里我们共募集了150份合作款。同时在国土绿化推进机构的“绿化募捐”、国际开发救援财团、日中绿化交流基金等方面的援助下，还完善了管理处和供水设备、作业道路等基础建设。我们把捐赠者的名字刻在铜匾上挂在现场。

2001年4月开工后，进展十分顺利。其中，侯喜技术顾问的贡献很大。老侯今年68岁，已经有一个7岁的曾孙。老侯睡在管理处的双层钢床上，坚持在第一线指挥。像呵护小孙子一样，管理农场，培育树木。

两年里，我们种的松树90%以上成活了。我说：“如果有死的苗不必补种，可以试一试阔叶树，这样就自然成了混生林。”老侯则回答：“问题是没死一棵苗。”是啊，可喜可庆。

来自灵丘县自然植物园的阔叶树种也几乎全部成活。我们期待最终成为这一带主流的是栎树。试种的200棵树苗几乎无损，全部长出了绿叶，并且已经过了一个冬天，成功的希望更大了。这里是完全没有腐殖土的黄土丘陵，树长得慢也实属无奈，只要长得好，就让人高兴。



图：在现场第一线指挥的大同事务所技术顾问侯喜（右）。由于他的参与，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许多。（桥本摄影）

栎树、楸树、榛子、臭椿等也都顺利地过了冬，但长势不是太好。胡枝子也长高了，但不如期待的那样好。不过在旁边的采凉山栽种的长起来了，前途有望。

我们在管理处周围栽种了大树苗和花木。主要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向参观者进行一种展示。云杉全部成活，长得绿油油的；丁香树长得也不错；玫瑰开了很多八瓣儿红花；耐旱的杜松长得还凑合；沙地柏 100%地成活了。

但是桧柏树大苗死了很多。2002 年风刮得特别大，桧柏被刮得死去活来。看来在条件恶劣的地方还是种小树苗为宜。

再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是，在通往喜鹊林的入口处，松树长得特

别好。那是采凉山项目。2000 年春天种的松树已经长到 40 厘米左右，成活率也很高。这个项目从 1999 年开始每年都在种树，绿化面积已超过 150 公顷。

小武脸上充满了喜悦。“自己负责的最早项目就在这里。过去这个乡里从来都不植树，因为我们帮助种树，他们才开始种。正因为我们做出了成绩，政府的防风防沙项目才落到这个乡里”。

如果让从日本来的绿化合作团的人在喜鹊林里种小树苗，归途中再看看采凉山生长的松树，一定会使他们对未来信心倍增。2002 年秋天，日本经团联自然保护协议会的大久保尚武会长带队的代表团访问这里时就受到很大鼓舞，他们满意而归。

天然林和人工林

在喜鹊林的沟底有了新发现，那里生长着无数棵小杨树苗。有的地方长得密密麻麻，令人吃惊。我正在观察时，小武走了过来。

我告诉她“这是杨树苗”。她也和我一起找了起来。

“哎呀，到处都是。”她也很惊讶。过去这里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情形。杨树种子发芽时如果环境不好，两三天就会死掉。之所以很多树苗成活，可能是因为 2002 年春天的雨水好。不过，以前即使有过发芽，也被放牧的羊吃掉了。自从我们开始在这里植树造林，因为禁止放牧了，这些树苗才得以生存。

小武反复对我说：“这件事增加了我的见识。日本专家强调自然的恢复能力，我还不太理解它的含义。在中国说起绿化，就是强调种了多大面积。但是，依靠自然的恢复能力，的确太重要了。”

几天前，白羊峪林场的场长陪同我考察了广灵县的山区。山里有一座圣佛寺古刹，周围是一片油松树林。据说由于火灾，原来 300 多公顷的松树只剩下一半。场长告诉我，这里是天然林，不是人工种植

的。寻找母树,发现在寺庙附近有油松古树。因为长在山谷里,所以树长得挺拔。从远处目测,直径超过 80 厘米,高度近 30 米。

“以前这里有 3 棵松树,三十多年前,县政府为建办公楼砍掉了一棵,另一棵是为建县文化馆砍掉了”。

太可惜了。这里只有一棵古树了,但还能看见山顶上有几棵比较粗的松树。

走进里面,是一片很不错的树林,树龄多半为 40~50 年左右。树的直径有 20~30 厘米。树顶部呈锥形,说明生长还未衰落,如果生长停止,树冠就会呈现圆形。

在大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长到这么大的松树林,说明松树也可以成林。小武说:“我们现在种的松树再过 40 年也会长这么大,也许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但是想到未来的情景,就感到高兴。”

远田先生在一边自言自语:“奇怪,怎么不是人工种的呢?从间隔上来看,排列整齐,不可能是天然林。”但是和场长确认时,他说:“没错儿,肯定是天然林。”说实话,我也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晚餐时,远田先生问小武今天所见的感想。小武说:“场长说是天然林,我看是人工林。如果是天然林,应该有各种树混杂在一起。但那里只有油松,而且大小也相差无几。如果真是天然林的话,树的大小也应该有差别。”

“再有一点就是如果只有松树就不可能出现腐殖土。如果是阔叶树的天然林,即使年份不很久远,也会形成厚厚的黑土层。我们今天看的山林已经有 40 多年了,但还没有形成黑土层,也没有其他种类的树木生长。相对于人工林而言,自然恢复的树林要好得多。”

远田先生说:“该看到的你都看到了,即使是带着专业学生去考察森林,也很少有学生能发现到这些基本的东西。”

“是吗?“Sen sei”(老师)。真是谢谢了。”小武高兴地说。

我也惊呆了。一进树林,小武和王萍就开始说个不停,她俩平时

也这样。不过该看的都没逃过她的眼睛，多次现场考察使小武积累了经验，所以才有了前面那番话。小武能够这样认识问题，我们的事业也容易发展了。

我们询问了大同事务所的侯喜技术顾问，人工林还是天然林的问题马上就弄清楚了。“毫无疑问是人工林。场长是新来的，以前的事情他可能不知道。”

老侯是这个地区林业方面的活字典。

第 11 章 再论中国的水问题

近来，水作为地球环境的新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20 世纪围绕着领土和地下资源展开了争夺，而 21 世纪人们将会为争夺水源而战。说到水，每每必提黄河断流问题，堪称典型案例。每当电视播放黄河水流完全终止、河床干涸龟裂画面时，也许会有人感到震惊。

电视里报道的多半是黄河下游，实际上中上游的干燥地带、半干燥地带的缺水问题更加严重，大同可以说是一个典型。1999 年秋天，《大同日报》曾报道过，“29.7 万人面临饮水困难。”当年 4 月又报道，“每年地下水位下降 2~3 米，2008 年水将枯竭。”

在我们的据点环境林中心，79 米深的水井已经不出水了。我们又急急忙忙打了一口井，井深有 140 米。地下水源大面积枯竭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我们 1999 年底实施的民意调查中加入了关于水的内容，调查对象为 7 个县 21 个村的 900 个人，调查答案令我们感到意外。

- A. 用水充足，也可以灌溉。 42.6%
- B. 生活用水充足，但不能灌溉。 47.4%
- C. 喝的水不缺，但要节约才行 18.3%
- D. 喝的水不够，需要到外村取水。 3.6%

也许有人会认为只有 3.6% 的人缺水算不了什么。为此我们询问了一个家庭一天的用水量和家里的人口。以“一担水”为水量单位做调查。大同农村的一担水有 45 升，相当于日本的“一荷水”。21 个村每人每天的用水量为 23.8 升，少的村子只有 15.6 升。

所用的水只有这么一点点。我们的水洗厕所冲一次至少也要 10

升，据说一般的需要 12 升。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生活用水是我们每人每天冲两次厕所的用水量，而且其中还包括了家畜的饮用水。一个 4 口之家一个月的用水量不足 3 立方米。

其后的问题是，最近水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61.5% 人的回答是水减少了，而且这种趋势扩展到大同市整个区域。回答水增加的人集中在特定的村子，说明有一些特殊原因。5 个村子中遇驾山、李二烟、吴城位于丘陵地带，本来就缺水。这里的人大部分回答水减少了，说明危机状况继续加剧（参见下表）。

农村的水使用量(人/日, 单位/升)

整体	遇驾山	随土营	李二烟	吴城	上北泉
23.8	15.6	24.5	31.0	16.6	21.4

水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

	整体	遇驾山	随土营	李二烟	吴城	上北泉
增加	15.4	3.3	6.5	12.0	2.0	18.0
减少	61.6	70.0	21.7	84.0	85.7	44.0
没有变化	22.4	16.7	32.6	0.0	0.0	48.0

另一方面，从日本看中国的发展异常迅猛，北京就是一个象征。每次往返大同路过北京时都对其发生的变化感到惊讶。但是从大同看北京的背影，仿佛是沙中楼阁。

大同是北京的水源地。发源于山西省西北部管涔山脉的桑干河由西向东流经大同的中部，然后进入河北，流入官厅水库。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是北京仅有的两个“水缸”。上游大同没有水，官厅水库的



图：北京的水源桑干河没有水。农民在河川地耕地、播种。水源不足已成为中国中纬度区域严重的问题。

水量减少，水质恶化，据说密云水库的水量也在下降。

由于地表水已无法满足北京的用水，只好开始大量开采地下水。我所看到的资料上介绍，80年代北京、天津地区可利用的地表水为60亿立方米，90年代减少到50亿立方米。目前利用地下水已达70亿立方米，约60%的用水依赖于地下水。

为了开始筹备绿化合作项目活动，我们在1991年调查了北京郊区的顺义县，当地的人告诉我们：“以前5米的地下水位已经下降到40米，还出现了盐碱灾害。”不知道那里最近10年的情况如何？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创办人莱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曾

指出“1999年北京的地下水位下降了2.5米，从1965年算起，北京的地下水位下降了约59米。随着有水层枯竭，中国的水资源不足问题重新抬头，将向中国领导层敲起警钟。”（引自网络消息《警钟》）。

世上大多矛盾总是最先在边境的贫穷地带开始显现，环境问题最具代表性。其实日本也是一样，水俣病、大骨节病等即典型事例。

前面已经介绍，进入90年代大同的降水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春季雨水减少，夏季导致水土流失的雨水和农作物长成后的雨增多。虽然全年降雨量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微小的变化却给当地的农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参见P22“大同地区月降水量的推移”）。

如果这种现象是地球变暖带来的结果，那么今后有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这种变化同样发生在工业发达国家和富庶地区，但因有缓冲余地，尚不会立刻显现出来。在那里，地球变暖问题还只是未来的话题。但是，在本来已达极限的黄土高原农村却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水的问题也是如此。在大同地区，首先是县交界附近的贫困农村的井和泉眼干涸了，然后向其他村庄和城市蔓延。近几年来，除了下雨之后没有看见过有流水的河流。水库也枯竭了。在此我还要重复：大同是北京的水源地。

被截流的黄河

2001年4月，在大同逗留期间我们利用一点时间去观察了黄河。我们访问的地方是山西省偏关县万家寨镇，位于山西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对面就是鄂尔多斯。从地图上看此段黄河几乎形成直角走向。

黄河的观光胜地并不在这里。司机小张说：“既然看黄河，莫不如去壶口。”壶口有瀑布，黄河奔流咆哮，气势恢宏。但是我仍然选

择万家寨自然事出有因。

一路盘山越岭，绕着大弯一直走到黄河。车刚一转弯，最初映入眼帘的黄河被水库隔断了。水库看起来似乎不大。

25年前我曾经在河南省郑州市附近看过一次黄河。黄色的浊流卷着旋涡流淌着，河对岸一片苍茫。我一边追溯当年的回忆，一边感慨“难道这是当年的黄河吗”？可你不要小瞧它，只是因为景观一望无际，黄河显得有些渺小而已。我数了数吊桥上钢索的间隔距离和钢索，推算河的宽度大约有500米。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大河。

另外一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水很清澈。相马先生曾经看过离此地很远的上游，他说“上游的水是黄色的”。流过来的水也是同样的水，只不过被水库拦截后泥沙沉淀，水变清了。也就是说，库底堆积着泥沙。当然会有办法解决，但是我这个外行人还是免不了担心。

这个水库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发电，实际上好像已经开始发电了。另一目的是为全国水源最缺乏的山西省供水。计划首先为山西省省会太原供水，其次是为第二大城市大同供水。按预定计划太原部分应该已经完成，但工程进展不很顺利。所发的电用于提高泵压。

建设资金使用的是世界银行贷款，国内也发售了建设债券。听说大同事务所的人都响应工作单位的号召购买了债券。也许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强制，但对该项工程也有一种期待吧。

因为是截流，不知道到底有多大流量。从一般常识来看，应和溢流到下游的水量差不多。但是实际上水量少得可怜。河里的石头露出了水面，似乎人可以踩着石头过河。

我说：“你们不要期待水流到大同啦。”其他人赞同我的观点，只有司机小张说：“不用担心，现在对水管理得很严，黄河从去年开始就没有出现过断流。”

大同的领导也很担心这一工程：“工程完工后水真的能供应给大同吗？即使提供，水价如果太高，大同的产业能用得起吗？”

要想从这里引水，还有竞争对手陕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如果从经济实力上看，山西省几乎没有胜出的可能性。当向曾在中央负责环保部门的领导谈及此事时，他漫不经心地回答“那水大同不能用”。也许那水只是通过大同供应北京而已。

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强调“西部大开发”。如果西部大开发受挫，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差别就会扩大，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如果取得成功，上游的用水量一定会增加。那样就会出现上下游争夺水资源的局面。

争夺云彩

2001年8月，在大同逗留一个月后经由北京回国。这一次我乘坐的是白天由大同至北京的火车，主要是想广泛地观察一下这次空前的干旱状况。

灾情相当严重。这次考察的大同县、阳高县虽然灾情严重，但是东面的天镇县更加严重。其他几个县的山还多少有点泛绿，而这里的山却满眼都是黄土的颜色。

广袤的黄土高原，降雨情况变化多端，过一个山头，情景就会变得完全不同。7月24日，南郊区的环境林中心在40分钟之内下了48.3毫米的大雨，院子变成了水塘，苗圃也被雨淹了。同一时间段，喜鹊林只下了5毫米的雨。二者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中间也没有山。

问题变得如此复杂是有一个因素是采取人工降雨。如果有云，具备了降雨条件，就会向天空发射形成水滴核物质的碘化银之类。环境林中心下大雨时一开始也是星星点点，后来就听到了几声轰鸣声。

话题重新回到我从车窗看到的情形。列车过了天镇县，进入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农村地带，眼前的干旱状况更加严重，已经长到一人高

的玉米叶子变得枯黄。天镇县从一开始就已经放弃，既没有播种，也没有耕作。河北省枯黄的庄稼给人的视觉冲击更强烈。但实际上，连种子都无法播种的地方，干旱情况当然更严重。

同样的张家口市，其东部的情形大不相同。东部海拔下降，还种水田，相当富裕。进入北京之后，农作物和树木都生长得不错。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远田先生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疑问。到了北京一打听才知道北京下了不少雨，而且是人工降雨，据说有报道说这是“科学的胜利”。听说北京环境志愿者网络的会员们都在议论“那些雨云本来应该给那里带去雨的”。

在大同有一个说法“云由东向西移动就会下雨”，也有的说“东风一刮雨就来”。西面来风都是干风，与下雨无缘。东面的风和云带来的雨也许是来自于海洋。原本应该给大同带来雨水的云也许被北京和天津的人工降雨给阻隔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在争夺水源之前就是争夺云彩。

制约发展的“水”

我写的是大同的事。读了这些很多人会认为写的是偏远内陆的事。实际上大同离北京只有 300 公里，与北京仅一市之隔。北京旁边的城市是河北省张家口市，紧挨着的就是山西省大同市，所以 2002 年 11 月高速公路全线开通之后，北京至大同之间只需要 3~3.5 个小时。如果开辆好车，有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大同市是继山西省省会太原市的第二大城市，人口 300.3 万，面积 14176 平方公里，大体相当于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的总和。提到市，大家的印象可能是城区。虽然这里的市也包括城区，但大部分是农村、山村。前面所写都是实情。

按照中国政府的政策，西部大开发正在全面展开。山西省既不属

于东部沿海地区，又不属于西部地区，所处的位置“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大同地区的年轻人对此现状非常不满。

比如，作为北京水源地的桑干河附近住的农民不能使用该河水进行灌溉。实际上这条河流几乎常年无水，处于干涸状态。

大同使用丰富的煤炭资源进行火力发电，规模最大的第二发电厂所发电力全部输送到北京、天津。在街上遇见的人对我说：“发出的电送往北京，留给大同的只有污染。发电需要大量的水，因此地下水越来越枯竭。”我觉得挺有意思，想用摄像机把他的见解拍摄下来。不料对方立刻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支援北京是我们大同市民的光荣任务！”

我觉得大同好像是北京的附属地，山西省是“后娘养的孩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大同属于察哈尔省，之后察哈尔被一分为三，张家口划归河北省，大同划归山西省，集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据说被划归山西省后煤炭作为基础产业的年代，大同比较受到重视，但是当煤炭价值下降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很偏，只了解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大城市的情况，对内陆地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平常也没有什么关系，就连中国人也有好多不了解内陆农村的情况。

于是在日本就有这样一种论调——中国已经那么富裕了，相比之下，日本现在很不景气，经济正处于“卡脖”阶段，中国方面还要拉后腿。日本有必要对中国进行经济协作吗？

然而，中国的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比如说水的问题就直接关系到粮食问题。我看到日本报纸上有一篇评论，说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过剩，正在寻求从量向质的方向转换。这种看法未免太片面。

中国靠只占世界 7% 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 22% 的人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相比，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 45%，而人口增加了 2.4 倍。

耕地不可能说增就增，最近还有所下降。尽管如此，过去曾经有过饿死很多人的现象，而现在已经基本解决粮食问题。

粮食生产飞跃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土地制度的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封建地主制经过合作化生产，转变成个人承包制，由此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再加上品种改良，稻米已经实现了一代杂交。化肥和农药也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更重要的是完善了灌溉系统，恐怕还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彻底实施灌溉的国家。这一点对粮食生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据说每生产 1 吨小麦和玉米需要 1000 吨水，若是稻米需要 4000 吨水，谷物等也是用水灌出来的作物。

访问大同的日本年轻人说：“到这儿以后深感水的重要性，回到日本以后要努力节约水。”“不对，日本水源丰富，应该多用水。”我这么一说，大家感到很茫然。“应该提高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使用日本的木材。世界上水源最丰富的日本大量地进口这些需要水的物质是没有道理的。”得，我的话又跑题了。

黄河断流的最大原因是灌溉而大量取水所至。据说在华北的粮仓地带，地下水每年下降 1~1.5 米。在中国粮食生产占重要地位的华北平原，水源正在枯竭。过去支撑粮食发展的灌溉难以为继。

以水为基础考虑生产率，农业只有工业的七十分之一。中国从农业向工业化转型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是为了摆脱水制约的一种苦肉之策。北京、天津、华北的部分地区好像已经在讨论放弃部分农业，将剩余的部分水用于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

制约中国今后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以水为中心的环境问题。讨论所有中国问题都不能避开环境问题。

北京的背影是沙中楼阁？

2004年4月20日~22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日中水论坛”研讨会，我也在会上做了题为《北京的背影是沙中楼阁？》的发言。从博得了中方与会者的掌声来看，应该说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

我们绿色地球网络从1992年开始在山西省大同市的农村开展绿化合作项目，我每天在农村东奔西走，日晒和酒的功效使我变得黝黑。这一带的水像漏底的水缸在迅速减少，一种与其说是危机不如说是恐怖的感觉油然而生。

最早发现的是县与县交界的农村地带，井水和泉水都已干涸，需要到几公里以外的地方担水吃。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帮助两个村子打了水井。幸运的是两口水井都出了水，可是一口井的深度是176米，另一口井的深度是183米！村里的人皆大喜。老人们拉着我的手不放，哭着说：“真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碰见这么大的事。”结果把我也给弄哭了。

因打井认识的打井队队长的话对我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地处临近县界的地带都没有水了。我们最清楚没有水的日子有多难，所以即使不赚钱也想替他们挖井。可是，缺水的村子大都穷得叮当响，哪有钱来打井！没有打井订单，我们的工资也被一拖再拖，只能干着急。”

如果是那样的话，打井只是一种应急措施，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里的缺水问题已经远不是打井就能解决的了。

另外发现的一个问题是，大同的所有河流、水库都已干涸。桑干河横穿大同中部，我最后一次看到河里流水是在1997年夏天。在那以后我每年都要路过这条河10次以上，但是再没有看到流水。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应县过这条河时看到河底全都变成了玉米地，根本没有流水的地方了。如果不是看到桥的话，谁也不会想到这儿曾经是一条

河。当地的农民们既不期待、也不怕水流过来。丁玲写过一本著名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现在这里变成了“太阳照在玉米地上”。

城市的缺水问题也很严重。2003年9月我拜访了大同煤矿职工的住宅。自来水每天只供应20分钟，存在浴缸里的100升水就是一家4口人一天的用水。

地下水位也在急剧下降。据当地报纸报道“主要地区的地下水位每年以2~3米的速度下降。2008年将完全枯竭”。

中国这么大，出现这种问题也不足为奇。但是大同是北京的水源，刚才说到的桑干河就是注入到官厅水库的水源。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一样，是北京仅有的两个“水缸”之一。

大约一个月前，我在去大同途中的高速公路上下车看了一下官厅水库。水位从原来的地方后退了许多。干涸的库底也变成了农田，农民正在忙着春耕。有苹果、葡萄果树园，还有柳树苗圃。水边还有贝壳的尸体，水草已经腐烂。农民说：“最近五六年水位下降得很快”。

2003年国庆节前夕，大同的册田水库开闸，向官厅水库输送了5000万立方米的水。在当时的仪式上强调“为首都做贡献是光荣的任务”。但是，大同缺水的状况要比北京严重得多。从大同的角度看，北京用水实在太浪费。不知北京人是否了解大同人是以怎样的心情送走这5000万立方米水的。

从日本来看，北京正在高速发展，我每次路过北京时都为其变化感到吃惊。但是从大同看到的北京背影犹如“沙中楼阁”。中方也做了很多相关方面的报告。在此我向节水及其他水利工作者表示敬意。但是如果北京继续以目前的态势发展，节水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我也知道，作为外国人如此说三道四，过于无礼。但是每年都在大同逗留100~120天的我却不能不一吐为快，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们的本职工作是种树，也多少做了一点与水有关的事。刚才说

过我们在农村打了水井，此外我们还在自己的据点环境林中心建设了一个小型污水处理设施。那里有 20 公顷的苗圃，种树苗需要水。我们在日本外务省“草根无偿援助资金”的援助下打了水井，但是在地下水位急速下降的今天，我们也不能乱用地下水。于是想到将煤矿住宅的污水净化后加以利用。

日本大阪产业大学的菅原正孝教授自费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采用的技术是土壤净化法。用 25 米泳池大小的简易设备，每天可处理 250 立方米的水。因为我们用处理后的水饲养着金鱼，所以说明这些水完全达到了灌溉用水的标准。许多人来看过后都说：“如果这么简单的设备就可以达标，我们也想马上搞。”实际运行后还有地方需要改进，目前我们正着手这项工作。

因为我们只考虑了灌溉用，所以这套设备在冬季气温近零下 30 摄氏度时无法运行。如果冬季也能运行，用途将更加广泛。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大规模的处理设施很有效，但是在人口密度低的农村地带，如果能够在污水排放源的附近建设很多小规模的处理设施，将处理后的水排放到河流中效率更高，这样河流也就可以得到恢复。

项目的成功使我们尝到了甜头，从去年秋天开始我们试验将矿山污水进行净化。大同是中国最大的煤炭城市。坑道挖得深，自然就出地下水。因为水中含有铁、锰和其他物质，不能直接使用。因此便被废弃了。据说，平均每挖 1 吨煤要破坏 2.5 吨的地下水资源。最近中国也启动了将水净化后用于自来水的项目。由于使用的是逆渗透法，需要大量资金，所以，只是有实力的大矿山企业能采用，中小煤矿与它无缘。

我们采用的是生物处理方法，用铁细菌处理污水。这个设备虽然小得像个玩具，但一天能够处理近 70 立方米的污水，可充分满足 800 人村庄的用水。设施运行了 3 个月，离自来水的标准还有些差距，但洗衣服、洗澡用完全没有问题。煤矿工人从矿里出来浑身上下全是煤

尘，如果能够洗个澡，那该有多舒服啊。

然而，这项试验却不得不在3月份中断了，原因是煤矿被关闭。在通告颁布的第二天，根据上级的指令入口被封闭了。我们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成果就这样夭折了，感到十分遗憾。但是地方的要求非常强烈，所以我们还希望能够重新上马试验。类似这种麻烦事在地方时有发生，过去也有过这方面的体验。希望日本的各位在发生这样的情况时不要着急，也不要气馁，向中方提出要求尽快解决问题。

大部分社会问题首先在贫困的边境地区显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都是一样。环境问题、水问题最为重要。如果全社会随时关注这个问题，就会及早发现，容易得到纠正，负担也会减少。

中国有句格言“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句话说得好。但是我想再加一句话，“吃水不忘上游人”，反过来，排污也应不忘下游人。

环境意识的变化

我考虑在中国开展绿化合作是在1991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71年，之后每隔两三年去一次中国。一开始我从没有想过中国的环境问题会如此严重。

“中国以‘为人民服务’为原则，不存在公害问题。”“废物也被当作有用的资源加以利用。”这样的观念深深地渗透在我的脑海里，当时的我完全没有理解环境问题的能力。

当时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的原则是“按需生产”。“按需生产”意味着物质和服务经常不能满足需要。因为从所需的统计到生产完成有一个时间差。工业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起因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而当时的中国应该说还很少有这种形式的环境破坏。

生产者、销售者高高在上，对购买者态度蛮横的现象是物质的长

期匮乏所致，而相反的关系则源于生产过剩。在日本称“顾客就是上帝”，尽管到中国来旅游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服务之差有诸多不满，但是考虑到上述原因也就可以理解了。

随着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形成，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同时，环境问题也随之日益严重。正好在这一时期我在日本国内开始涉足环境问题，同时，由环境问题重新审视社会。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感到问题非常严重。

首先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存在的“环境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加之中国文明历史悠久，问题积累得更多。我们在大同经历的各种艰辛也源于同样的问题。中国伴随着工业急速发展突发公害，类似日本经历的在高速增长时期出现的水俣病及其他公害。一次性废弃物的环境问题也快速显现出来。塑料瓶等一次性容器转眼间铺天盖地。中国的生态环境本来就很脆弱，加之诸如地球变暖、酸雨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地球环境问题，比起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

我认为如果不想办法解决，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环境问题必然会影响到日本。但是水的问题、大气污染问题……很快也会变成政治问题。

我遇事轻率鲁莽，因此不可能在中国涉足这些问题，我想，搞绿化谁都不会反对，我希望通过绿化积累实绩之后再向其他领域扩展。

为了寻求各方面的合作，我在日本走访了各种团体和个人。但反响都不很理想。甚至有人说：“你没病吧？为什么要从水泥森林、沥青沙漠的大阪特意跑到绿树成荫的中国去种树？”持这种观点的人多半是了解中国的人。日本人去的多半是绿化搞得不错的沿海大城市，很多日本人只知道这些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我多次访问了西山五郎先生，他说“我连樱花和梅花都分不清，到那里去又有什么用呢？”话虽这么说，他还是接受了第一个绿化合作团副团长的职务。我感到很高兴，如果没有他的参

加，代表团就无法成行。西山先生也一直担任我们“绿色地球网络”的副代表。

跑到中国去游说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多半是要碰钉子的。“这是先富裕起来的日本人一相情愿的想法，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解决吃饭的问题，因此发展经济是必须的。如果发展经济一定带来环境破坏，那也只能接受现实，我们有时甚至需要污染。”

后来，中国人的环保意识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不能忘记知识分子所发挥的先导作用。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何博传。他写的一本书现在手头没有，记得日文版标题是《中国·未来的选择》^①（NHK出版）。我们绿色地球网络的最初会员多半是看过这本书。但是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就在中国国内禁止发行了。

另外民间环保组织非常活跃。在中国，民间团体独立开展活动非常困难，特别是在资金筹措方面有很多制约。我十分敬佩这些在困境中开拓道路的人们。

国外的活动也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代表性的有莱斯特·布朗的书《谁来养活中国？》（钻石出版社）这本书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产生的影响应该予以评价。我甚至觉得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够带来如此强烈的冲击力，就不能算是干工作。

远远超过上述因素的更强烈冲击是1998年长江、松花江等地发生的特大洪灾。每当长江发生洪涝时都有报道“这是百年不遇的灾害”，但是这一次中国新闻媒体明确地指出“这是人祸所致”。

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即使实现了经济发展，如果环境继续恶化的话，取得的成功也会功亏一篑。不仅如此，还会受到大自然更严厉的惩罚。”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措施。

从那时起日本国内也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这真让我高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① 中文书名：《山坳上的中国》（何博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但在工业文明方面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要比日本年轻得多，经济方面还很不成熟。今后将有更广阔的地域需要经济开发。据说，要想保证新毕业的年轻人有工作，从微观方面比上一年有所好转的话，就必须在宏观方面保证至少 6% 的增长。实际情况是否真是这样呢？

如果连续 12 年以 6% 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就增长 1 倍，如果是 7% 的话，10 年就可以增长 1 倍。如果是 7% 的增长持续 20 年，经济就翻两番。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 2020 年 GDP 增长比 2000 翻两番的目标就是这样计算的。由于水的需求量猛增，环境负荷加重，制定的目标否能实现呢？从长远来看，能源和环境问题将制约中国的发展。

人们说，之所以增加到现在这么多人口是因为毛泽东的人口政策失误。为了弥补这一失误不得不采取独生子女政策。从环境方面考虑，现在的经济增长同样也是一种冒进。纠正得越慢，将来付出的代价就越大。这种现象给我的感觉就像是爷爷用孙子的信用卡乱花钱。

但是在经济增长时人们和社会是不会这样去思考问题的，只是一心要赚钱。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和泡沫经济时期也是一样，被“日本第一”冲昏了头脑。一旦碰壁时却丧失了改革所需要的能量和精力，一蹶不振。

作为邻国人，我痛切希望中国不要走日本的老路，因为它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后记

2001年1月，我在东京大学农学部的教室里报告我们的活动情况。在报告后答疑时，有人问到ODA和NGO（非营利民间组织）的关系。我立即回答：“ODA的人是工作，NGO的人是消遣。”原因是，前一天晚上我住在远田宏先生家里对博子夫人说：“经常承蒙先生的关照。”夫人说：“哪里哪里，多亏你，他才有地方去玩。”因此当问到这个问题时，前一天的对话情景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于是，坐在最后边曾去过大同的棍干男先生大笑起来。我想“坏了”。和我同年代的大学教授悟出其中奥妙，而年轻人却未能理解话的含义。

我急忙改口补充，“因为是玩，所以比工作更上心。”其实要说“如果你把一件事当做工作就会觉得是件苦差，如果当做娱乐，就会感觉轻松愉快”，这样表达更贴切。在任何一个单位，都会有人感觉工作就等于苦差。

如果把不足挂齿的NGO的事当做工作，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太不划算，也无法干下去。每年我都要在大同逗留100天，但这并不是工作的重点。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都是表面文章，真正较劲的是筹措资金，需要投入70%的精力。NGO的事务局长大多数无法摆脱这种处境。

特别是活动初期更为艰辛。草创时期的人有的甩手不干了，资金筹措受挫等等，想起来像是一场噩梦。我曾经几次想放弃，也曾经回家发过牢骚。我夫人对我说：“你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痛苦，可以不干呀。”我夫人叫太田房子，和我结婚以后一直沿用原姓，在绿色地球网络担任会计工作。无论是网络的财会还是家里的支出，她都付出了很多的艰辛。

那时她如果对我说“你要好好干”，我肯定就放弃了。她太了解

我，知道如果想让我向东走，就说“往西去”。于是我就会朝东去。

现在，我仍然为筹钱而辛苦。活动持续了十多年，有些赞助费用已经停止。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特别是我们的根据地大阪经济更是低迷，很难募集到钱。我到处奔走化缘，自己都觉得很辛苦，可大部分没有结果。可能是因为我躬鞠得还不到位吧。

不管你怎么把这个工作当做消遣，但是不可能太愉快，经常会感到厌倦。年轻时我就不擅长喝酒闹腾发泄，喝了酒只知道向周围的人发表费解的议论。于是我想，与其说不如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

我在自家的电脑桌上安装了一个自制的小架子，在上面放个杯子。一边抿着烧酒或是威士忌，一边开始写《黄土高原来信》。酒一喝多，里面的牢骚也随之增多，因此第二天早上要大体地看一遍，再用电子邮件发出去。现在去大同时也带上笔记本电脑。从1999年4月开始到2003年3月累计发出了200篇，基本每周一篇。

幸运的是我有很多好读者。他们不仅自己读，而且有很多人，如关智子等人还转发给别人。所以阅读《黄土高原来信》的人是我所掌握的地址人数的好几倍。有时我会为自己写的《黄土高原来信》有意想不到的人阅读而感到惊讶。阅读者会向我提问，反馈阅读感想。其中最热心的是前川宏先生，每一期都不落下。对读者的提问，我有时在下一期作答，所以有些采用对话形式。

这项工作，不，应该说消遣，是消遣中的消遣，非常愉快。发泄厌倦情绪竟然也能有生产效率，自是愉悦。活动越忙，《黄土高原来信》发送得越频繁。各位读者，让你们受累了。不过，《黄土高原来信》还将继续发送，想阅读的人请联系。

有热心的读者建议把《黄土高原来信》出版，认为现在虽然有介绍国际合作的书籍，但是如此直白地描写国际合作活动内幕的书籍还不多见。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另一个侧面。还有人提出希望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本书以这种形式出版，是我在重新整理了《黄土高原来信》的基础上，加写了后来发生的变化，做了大量的修改。但遗憾的是，那么多热心人对我开展工作给予了帮助，却无法在书中一一提及。我还担心由于我的幼稚会给一些人带来麻烦。

书中人物的职务，没有特别标注的还是原来的职务。

对中国的理解还有许多阴差阳错的地方，因此本书中一定有不少不妥之处，恳请谅解。

在此还想说明一点，《黄土高原来信》不是“绿色地球网络”团体的报告，但也不是个人的东西。我们的会员章程中规定：“绿色地球网络是在共同目的下组成的个人网络，每个人做力所能及的事，在互相尊重，互相信赖的前提下开展活动”（第四条）。网络协会的干事和会员们能以宽广的胸怀对待这份多有越轨内容的报告，在此深表感谢。

值本书出版之际，得到许多人的关照，在此深表谢意。对编辑此书的日本经济新闻社出版局的国分正哉先生、菊池薰先生、鬼冢忠先生以及为本书提供照片的桥本紘二先生表示感谢。

补 遗

再访西留乡

我每年的 12 月都要去大同访问，主要是为了和中国的合作对象一起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制定新一年的计划。在出发前夕接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目贺田周一郎公使的电子信函，说“草根无偿援助资金”接到了在浑源县建设医院的申请报告，问我是否了解那里的情况。

我告诉他浑源县是我们合作的第一个地点，结果马上有一份传真发了过来，看后让我吃了一惊。医院的建设地点竟然是西留乡的西留村！西留村是 1992 年 1 月我们第一个考察团访问的地方，当年秋天，我到农村考察时决定把西留村当做绿化的据点。

无论怎样答复目贺田公使，都必须要去一下现场，这次尽管在大同只逗留 3 天，我还是抽出一天去了西留村。

车一进村，就看见每家门口都站着亲切面孔的人们。我急忙让车停下。打开车门，只见刘天文跑了过来，我们情不自禁地抱在一起。我曾经和他一起视察过造林现场，还住过他家。听说我要来，从一大早就冒着严寒等在外面。

县和乡里的干部向我介绍了建设医院的计划，看了现场之后我又访问了刘天文的家。他们夫妇和老父亲在家，两个闺女已经出嫁离开村子。最小的是儿子，当时只有 12 岁，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出外工作不在家，家里留下一位可爱的妻子。刘天文夫妇将堂屋让给了年轻夫妇，自己住到厢房的小房间里。10 年的时间变化真大啊。

西留乡最初的项目有很多都失败了。以我们当时的力量无法继续维持，因此渐渐地很少去那里了。今天，看到他们的面孔，我发现自

己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东西。世上没有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宝贵的了，但是我却淡漠了它。

有了迄今为止的经验和技术的积累，现在完全可以重新开始。如果建设医院的计划得以实施，我们还可以考虑多方面开展与内陆农村的合作。

最初承诺干 20 年的合作事业马上就要进入第十二个年头了，我自己也感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今天再访西留乡，又见到温增玉，使我更坚定了重新开始的决心。

2002 年 12 月 1 日 于大同

附录

绿色使者高见邦雄

记一位在黄土高原植树的日本人

《世界知识》记者 葛军

入春以来，华北、东北地区连续十余次强劲沙尘暴天气，使我们似乎一下子对环保的紧迫性有了切肤之感。恰逢此时，日本“绿色地球网络”事务局局长高见邦雄于4月9日~28日去山西大同考察，在全国青年联合会国际联络部的协助下，我进行了随行采访。

“有人说我是为了日中友好才来这里植树的。说我喜欢大同那地方，其实都不是。我一点儿都不喜欢那里，我甚至恨那个地方，那里太穷，气候条件太差。”

在北京站大厅并不熙攘的人流中，全国青联的万学军向我介绍了高见邦雄。我近乎诧异和失望地跟他握了握手，接受了他随后递过的一张名片。这就是日本人吗？那种整洁、刻板和谦恭荡然无存，代之以松弛、随意、甚至是不拘小节：蓬松的头发、敞开的领口和外衣，腰包的两根黑色带子随着他走路的节奏不经意地在身后摆动着。

火车刚启动，他便迫不及待地从背包里取出一瓶英国威士忌和几个纸杯，礼让一圈之后，他就边喝边滔滔不绝地讲开了。

“有人说我是为了日中友好才来这里植树的，说我喜欢大同那地方，其实都不是。我一点儿都不喜欢那里，我甚至恨那个地方，那里

太穷，气候条件太差。”

再没有比这样的开场白更让我处境尴尬的了，我暗自庆幸没有提出常规思维下的问题。

他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不是我自己要来了，是他们（他用手指着随行的全国青联干部）把我‘骗’来的”。

全国青联副秘书长汤本渊介绍说，“绿色地球网络”是一个由日本发起的非营利的国际性民间组织，以日本会员为主，也有少数韩国、美国、英国和中国的会员。会员中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家庭主妇，也有科技专家和商界人士。该组织的宗旨是“环境无国界”，实现超越国界的民众合作，共同保护地球环境。该组织目前有 500 多名会员，总部设在大阪。

玩笑归玩笑，其实日方选择黄土高原并非毫无科学论证。从 90 年代开始，日本的中西部地区经常遭到“泥雨”的侵袭，风沙天气日渐频繁。对于气候变坏的原因，日本国内舆论认为，除本国国内的生态环境恶化之外，由大气环流带来的中国黄土高原的沙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大同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内外长城之间，平均海拔在 900~1500 米之间，年降水量为 380~460 毫米，无霜期为 90~130 天，干旱风沙等灾害性天气严重，曾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说法。同时，大同地区属于举世瞩目的“三北防护林”——绿色万里长城的一部分。

从 1992 年以来，全国青联和山西省青联委托大同市青联与“绿色地球网络”合作，开展了以日方捐助资金、我方组织实施的方式，共同营造“黄土高原地球环境林”及“桑干河青年工程林”的活动。截至 1999 年 5 月，日方累计提供绿化资金 1000 余万元人民币，共植

树造林 2560 公顷，接待日本黄土高原绿化协力团成员 700 多人。1995 年 8 月，成立了由日方投资、大同团市委管理的“绿色地球网络”大同事务所。

“中国有句谚语：万事开头难。其实，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开始很容易，过程比较难，关键是有结果就更不容易了。种树就是这个道理。种很容易，但能否成活就不好说了。这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其二，社会关系，包括与政府的关系和个人的交际能力；其三，人的因素。”

作为“绿色地球网络”的创始人之一，高见邦雄似乎与中国有一种不解的情缘。他早年肄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现年 52 岁。1971 年首次来中国，参观考察了大寨。当我问及他当时的感受时，他说：中国的农民是伟大的，但随后我觉得，大寨人造梯田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许，他创办“绿色地球网络”的设想便发端于这样的思考。

从 1991 年底开始，高见邦雄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大同，与当地的农民和技术员一起，从事植物的试验、育种、推广及相关工作。他跑遍了大同的村村寨寨，了解当地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绿化方案。难怪老乡们亲切地称他为“高见”、“老高”。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能听懂连北京人都很难听懂的大同乡下话，而且还能说上两句“知不道”“么”，他也不无夸耀地自称“四分之一个大同人”。

谈起种树的感受和经历，高见感慨地说：“中国有句谚语：万事开头难。其实，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开始很容易，过程比较难，关键是有结果就更不容易了。种树就是这个道理。”据高见自己说，在中

国第一次种树时，他种了不少棵，但第二年满心欢喜地来看他头年种的树，却大失所望，死的死，枯的枯，能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更令他不解和气愤的是，有的树竟被当地的农民砍了，因为这些树占用了他们借以维持生计的耕地。其实，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何以理解和顾及环保问题呢？“我犯了官僚主义。”他笑着对我说，这个很中国化的词让他用得很到位。

后来，高见调整了他的“环保战略”，找到了促进环保与发展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和提高农民素质的结合点：一是改变农民的生存条件。1998年，他在日本募集了约合20多万人民币的资金，为广灵县苑西庄村打出了第一口井，结束了全村200多户人家走20多里路肩挑手抬的吃水历史。二是营造经济林。1994年和1995年共投资23万余元人民币种植了9000余亩仁用杏，去年收入50多万元，估计今年将达100余万元。此举最大的收益是使农民看到了“退耕还林”的直接经济利益，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种树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三是与希望工程挂钩，共同为贫困山区的小学营造“希望果园”。因为他意识到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脱贫要靠人才，植树也要靠人才。

我们的汽车卷着一路黄尘来到苑西庄村的井边，我看到了一块石碑，上面赫然刻着红漆描摹的大字——“吃水不忘打井人”。当四周的尘埃落定，我惊奇地发现，井四周齐腰高的围墙外，已静静地围上了20多个老乡。高见走上前去隔墙和他们互相拍拍肩膀、握握手，平静、自然，一切“尽在不言中”。那是一双双因辛勤劳作而异常粗糙的手，是岁月沧桑留下一道道洗不去的泥土痕迹的手，干枯、布满皱纹……就是这样的手与高见的手握在一起，久久地握着。他们一起抽着黄土高原产的香烟，披挂一身永远也掸不净的黄土。如果不是那架已经磨得发白的尼康相机和一双已被黄土遮盖了本色的深色旅游

鞋，你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是日本人。

临别，一个老乡说：“高见，上家喝口水，歇歇。”高见说：“下次，我住这儿，咱们喝酒。”于是，我感悟了，感悟到他们之间不用太多的语言就能彼此沟通的那份真情。

“我一直都在失败，我很少成功。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原因有二：有一种人放弃是因为他们有了更好的去处，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可我没有，我只有这一种事业；另一种人是承认失败了，而我不承认我最终的失败。”

当初，“绿色地球网络”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时共有 5 人，其他 4 人都认为在大同植树成功的希望很渺茫，最终放弃了，只有高见一直坚持到现在。我随口问了句“”为什么？”高见轻描淡写地说：“我傻，我太傻。”

其实，“太傻”的不止他一个。据说高见的妻子也在“绿色地球网络”大阪总部工作，也曾来过大同植树，不知她看到黄土高原的穷山恶水有何感受。不过，高见一直坚持到现在，肯定与她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虽然这种支持更多的是“排忧解难”而非“享受成功”。

高见曾告诉我：“我的同事们说，我妻子有 3 个孩子，我是老大。”从一句不经意的玩笑中我听出了很多隐情。从日本到中国的偏僻山村，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精神生活都存在着极大反差。他不仅要迎接恶劣生活条件的挑战，还要忍受精神生活的匮乏，克服语言交流的障碍，最为严重的是要面对因水土不服而枯死的树苗。但高见最终坚持下来了，这是不是应了西方的谚语：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据说，有时他很少吃饭，只喝些啤酒或自带的威士忌，吃些绿

菜。

高见是一个平凡的人，偶而，他也会发发牢骚，说说自己的苦衷：

“我不怕自然条件的艰苦，我能吃苦，可我怕人的因素。这个县委书记很支持我，鼓励我多种树。我刚种好树，县领导又换了，新书记不热心植树，于是树就一点点地死去。有很多官僚主义的做法，比如，提倡种万亩林，搞隆重的仪式，两年过去了，热乎劲儿没有了，林子荒了，只剩下一块‘万亩林’的牌子……”

“我感到最苦恼的还是资金问题，现在‘小渊基金’还没申请下来，就是申请下来也太少；而原来的资助方日本环境厅和邮政省听说我们申请了‘小渊基金’，便都停止了资助。”

高见有着务实的态度、勤勉的作风和执着的精神。他说：“我在播种树木，树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有希望，所以我是在黄土高原播种希望。”正因为如此，他说：“我已经欲罢不能。”

最初，也许是高见对环境的关切打动了日本的志愿者，使他们自费来到中国的穷山僻壤植树造林，而现在不也正是志愿者们对全球环境所表现出的责任感和深切忧虑在激励着高见吗？就让我用日本志愿者来中国植树后的感受结束本篇采访吧。

“日本一张电话磁卡的钱在中国能买3棵树苗，每棵树苗的成本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

“我深感一元钱、一滴水、一棵树的重要。我们追求富裕生活时，也失去了很多东西，而这次活动让我们收获很多……”

“生活在发达国家里，我们使用了很多能源，排出了许多废物，对环境是有责任的。”

“21世纪不能回避环保与南北差异问题，中国环境的真正受益者是日本人。”

——原载《世界知识》（2000年第10期）

译者后记

去年走访日本时，秋意正浓。在下榻的花园会馆完成了本书的初校，犹释重负。望着窗外的妙心寺院，湛蓝的天空下，漫山红叶，层林尽染，松柏叠翠，草木芊芊，不得不为日本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而慨叹。望着这番上好的景致，不由得想起了环境与它有着天壤之别的塞北黄土高原，想到了高见邦雄……

我和本书译者之一王黎杰都是在 1974 年认识高见的，当时他 20 多岁，而我们还在上大学。时光荏苒 30 年过去。高见自 1992 年开始在大同地区开展绿化事业以后，我们接触的机会便多起来，成为知己。如今他在中国的绿化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当地组织和村民的支持下已绿化 4500 公顷，种植树木 1600 万株，受到了中国各级政府、群众团体等诸多表彰。去年 2 月，我曾在《人民中国》杂志上介绍了高见和本书的日文版。他笑着说：“你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可没那么完美。”其实我并没有夸张，每当谈起高见的事，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朋友，都对他的行为大为赞赏、敬佩。一个生长在优越自然环境下的日本人，为绿化中国的黄土高原事业奔波于塞北的穷乡僻壤，13 年来每年有 100 多天在此度过，不仅要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文化冲突，还要克服自然和人为的诸多困难保活种植的树苗，想起来确实非常不易。

事业之初，举步维艰。当初高见一个人来中国，身背装有数月用品的行囊排长队买火车票，为节省费用，他住饭店多人房，去便宜的饭馆吃饭，甚至有时自己跟自己较劲儿，创一天花钱最少的记录。“今天晚上改善一下吧，给我放两个鸡蛋！”读到这里，不觉心里隐隐作

痛。他为绿化合作事业到处奔波，集资筹款，截至 2004 年累计争取了日方提供绿化资金 2000 余万元，而对自己却如此苛刻，铁石心肠，焉能不为之动容。

山西大同是日本侵华时期的重灾区，因此当地村民在感情上对日本抵触很深，这种情绪无疑对“绿色地球网络”的合作活动产生了无形的压力。下寨北村在战争期间曾遭受日军洗劫，当高见在 1993 年提出要帮助该村脱贫、为小学建设果树园的建议时，遇到了村里长者的反对。“我们再怎么穷，再怎么苦，也犯不上要日本人的施舍。”这件事使高见意识到战争给人们留下的阴影太深，在当地团干部的说服和高见的诚意感召下，最后老人们同意了。1994 年春天，当植树团抵达大同后接到通知参加下寨北村小学果树园的植树仪式时，不禁喜出望外。那天全村男女老少齐出动，日本朋友和孩子们一起栽树、浇水，老人们坐在周围有说有笑，热闹的场面好像过节一样。此番情景，令人感慨万分。高见在书中有一段谈到了战争责任问题。面对日本存在的“战争说不好谁是谁非”，“感谢为国捐躯的人理所应当”的论调，高见说：“劝君不妨好好想一想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那场战争是在哪里进行的！是在中国进行的，它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如果日本不来这里，也就不会出现这种事了。弄清这个逻辑关系，对今后的日本至关重要。”虽非高谈阔论，却言简意赅。

《雁栖塞北—来自黄土高原的报告》是高见在大同地区开展绿化事业的真实记录，又是一部数据详实、颇有说服力的大同农村现状考察报告。它不仅剖析了大同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和严峻的水土流失状况，同时又从多元的视角提出了因地制宜的改善方法。比如他们从初期的失败中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不赞成把项目规模搞得过

大，为分散风险从小规模起步，待农民积累了一定经验有了自信心后再循序扩大。高见生长在贫苦农家，很了解农民，深知农民对侵害自己眼前利益的事情非常敏感，所以种植果树尽量避免使用耕地，而利用废弃的耕地、荒山野岭、沟壑谷底。其实这一做法揭示了新中国建国以来在治理黄土高原中始终未能较好地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不把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因而也就无法将群众治理生态环境的积极性长期持久地调动起来。因此，要把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既不能以牺牲生态效益换取经济效益，也不能只顾生态效益而忽视经济效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高见把项目分成长期、中期、短期并使其有机地结合起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是极为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高见认为只种树不是绿化，认为如果绿化不以阻止环境破坏和贫困形成的恶性循环为目的，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文明之前有森林，文明之后剩沙漠”，话说得平淡，却让人震撼。自然界经数百万年甚至更长的漫长时期逐渐形成的自然环境，人类可以在几百年、几十年的短时间内将其破坏，而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恢复起来却十分缓慢。20 世纪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快时期，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爆炸性的增长使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愈发突出。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使传统生活伦理中的节俭成为过去，消费背后隐藏的欲望扩展了生产的空间，促使包括后续工业化国家在内的全球性经济竞争愈演愈烈，加速了有限资源的消耗。中国 20 年来经济建设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飞跃发展，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消耗的高昂代价。我每从西藏、云南等偏远地区回到北京时，面对百货商店或超市货架琳琅满目的商品，总是感到困惑。“得到的和失去的，如同硬币的两面同时并存，但是人们容易感受到得到的一面，却很难察觉到失去的东

西。”

愿本书能为中国保护和恢复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提供借鉴，愿这种方式的民间交流为促进和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积累宝贵经验。

李建华

2005年3月6日

[作者简介]

高见邦雄 (TAKAMI KUNIO)

1948年生，日本鸟取县人。1966年入东京大学，1970年肄业。以后，从事日中民间交流活动。1992年参加创建NGO“绿色地球网络”（简称GEN）。1994年起任事务局长。每年在中国山西省的农村逗留100~120天，从事植树造林活动。1999年春开始发送电子通讯《黄土高原来信》，4年期间发行了200多期。本书的内容根据《黄土高原来信》整理而成。同时与他人合著《水与生活的环境文化》（昭和堂2003）、《水·人·自然》（有斐阁2003），呼吁中国水问题的严重性。“绿色地球网络”开展的活动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2001年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2002年获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颁发的“保卫母亲河行动国际合作奖”；大同市政府颁发的“环境绿化奖”；创建优美环境大阪府民会议颁发的“大阪环境奖·大奖”；2003年获朝日新闻社颁发的“走向明天环境奖”。

[摄影家简介]

桥本紘二 (HASHIMOTO · KOJI)

山形县人。毕业于山形县东根工业高校电子专业、东京综合摄影专科学校。日本摄影家协会会员。曾获1979年度日本摄影协会新人赏。摄影题材以农村和农业为主，作品主要发表于画报和农业杂志。

主要作品：摄影集《呼唤春天的村庄·越后松之山》、《志愿当农民》、《克里亚的群山·泰国山岳少数民族的生活》（以上由农产渔村文化协会出版）；《摄影画报·果园》（金星社）；《中国黄土高原—砂漠化的大地与人》（东方出版社）等。

[译者简介]

李建华

1954年生；1972年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学习；1975年中联部亚洲局日本处；1981年入广岛大学文学部日本近代文学研修访内学者；1987年中国驻日大使馆；1992年日本禅文化研究所；1997年开始北京东方之星综合企划。译著：《冰点》（三浦绫子）、《次郎的故事》（下村湖人）、《日本政治》（京极纯一）、《中国人的思想构造》（邱永汉）、《造型的诞生》（杉浦康平）、《烟斗随笔》（团伊玖磨）等。

王黎杰

1955年生；1972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1975年中联部亚洲局日本处；1985年中国电影家协会国际部；1988年早稻田大学日本电影史；1991年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研究室；1997年北京东方

之星综合企划。译著：《最新三维计算机图像设计》、《日本通产省史》、《录像的乐趣》、《谁搞垮了八佰伴》（加藤鑛）等。